中国国家地理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荣誉出品

2018
总第156期
10
RMB30元/HK$40元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2-8971
国内统一刊号 CN11-5247/G2
邮发代号 80-253
www.dili360.com

CHINESE HERITAGE

中華遺産

最中国的地名

专辑 下

最政治
开疆拓土 绥远安边 一切为了皇帝

最文化
儒者佛家 阴阳有道 别样山河汉字中


最传奇
天造运城 水生济南 传说地名真神奇



ISSN 1672-8971






中华遗产
再现最美的古典中国

中国国家地理 | 中華遺産



梳理华夏文明
叩击历史星空

中国国家地理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 中華遺産 | 叩击历史星空 梳理华夏文明 |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期刊

《中华遗产》杂志·月刊·每月1日出版
国际标准刊号 / ISSN 1672-8971 **国内统一刊号** / CN11-5247 / G2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丰工商广字第0051号
编辑出版 / 中华遗产杂志社 **社址** /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11号 **邮编** / 100101
总机 / （010）64865566 **网址** / www.dili360.com **会员热线** / 4006-521-360
主管 /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协办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支持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处











特别承诺 / 本刊凡出现印装差错，一律由印厂调换。
制版 /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北路3号
印刷 /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 100176 **电话** / （010）678766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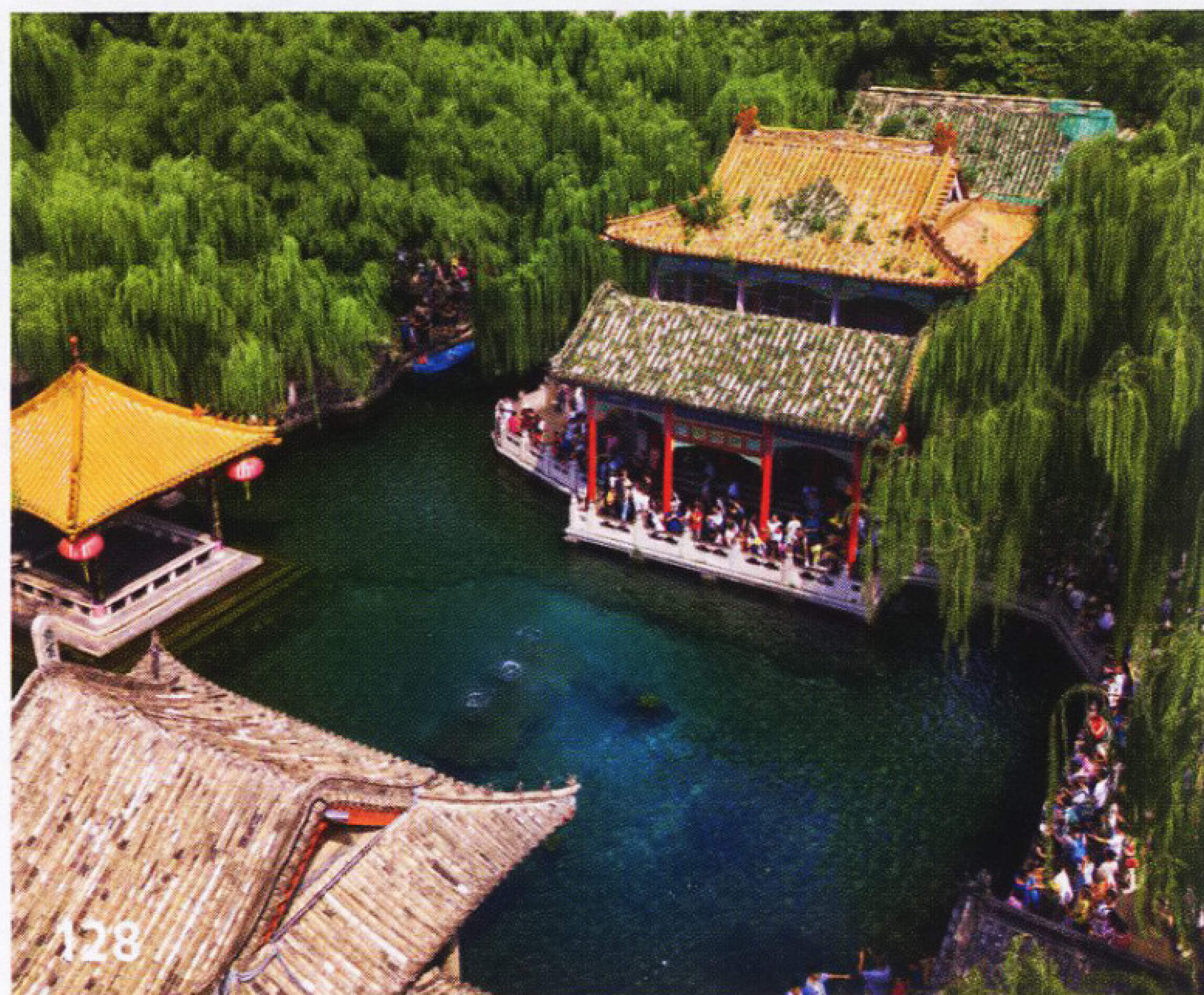

48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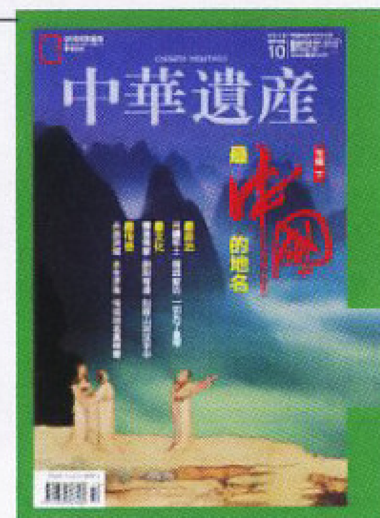
82


72


128

封面故事

在山水云海前，古人似在欣赏风景，又似在讲述地名故事。封面为广西桂林阳朔风光（供图 / 视觉中国）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徵明所绘《仿赵伯骕后赤壁图》合成。



云国之梦

撰文／黄秀芳

中国最富有诗意的地名，网上有很多提名，诸如栖霞、仙居、兰陵、姑苏，而无论哪一种版本，都少不了“云梦”。如今湖北孝感市有个云梦县，算是对历史的纪念。

“楚王云梦泽，汉帝长杨宫。”唐太宗李世民一首《出猎》诗，道出了古往今来人们对云梦的赞慕。如云似梦的大泽，烟雨迷离，烟云弥漫，确实极富诗情画意。然而，对“云梦泽”的这一诗意的想象与解释，其实是错得离谱。因为追根溯源便会发现，它也许既非云，也无梦。

让我们来看《左传·宣公四年》记载的一个故事：若敖娶䢵女为妻，生斗伯比。若敖死，斗伯比随母回䢵居住，与表妹䢵子之女私通，生下子文。“䢵夫人使弃诸梦中”，子文被老虎喂养。䢵子打猎时看见此景，吓得罢猎而归。䢵夫人如实相告，䢵子颇觉神异，遂将子文抱回，取名斗谷于菟，意为由老虎哺乳。

若敖是西周末至春秋初期楚国的国君，“䢵”呢？西晋大学者杜预做注解时说：“䢵，国名。”“䢵本又作郧，音‘云’。”斗谷于菟后来成为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令尹，为楚国的强大和争霸做出卓越贡献。这个故事的本意为夸耀令尹子文之不凡，但无意中却揭开了“云梦”的真相：“䢵夫人使弃诸梦中”的“梦”，在楚语中为“泽薮”之意，即包含有湖沼的山林原野。子文被䢵夫人弃于梦中，哪的梦？䢵国。于是谜底揭开：“云梦”原本可能叫“䢵梦”。

䢵国在何处？追寻䢵国往事，顿感历史如梦幻。

䢵来自于妘，妘又与云相关。《史记·五帝本纪》里说，黄帝以云命名官职，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对此，翦伯赞在《中国史纲》里解释道：“黄帝之族，恐怕是由几个胞族组成的一个部族，所以其中有属于一个胞族的五个氏族，是以云为图腾……”

何光岳先生在《(䢵)子国考》一文里，阐释了云之演变脉络：氏族社会时，以云为图腾的部族，在云旁加女——以“妘”作姓氏；进入父氏社会、出现封国后，在云旁加邑——以“䢵”为国名。

话说黄帝之孙有颛顼，颛顼之孙重黎为帝喾的火正官，赐姓“祝融”，重黎死后由其弟吴回世袭。《国语·郑语》说，祝融氏有八姓，妘为其一，楚之芈姓也为其一。妘、芈原来同祖。

吴回生陆终，陆终有六子，四子名会人，会人后裔的一支，在今新郑、密县一带的祝融之墟建国，在会旁加邑，是为郐国。周平王东迁时，郑桓公也随之迁于今河南新郑，与郐国相邻，为了做大，先是侵占了郐国的地盘，郑武公时，又灭了郐国。

据何光岳考证，郐国中的一支，早先因不愿臣属商朝，向南迁至今湖北郧阳县，后又向东南迁至安陆县（今云梦县一带），以族姓为国。周初受封为子爵，又去女字旁加邑，是为䢵子国。在古语里，郧与䢵同，唐《括地志》云：“安州安陆县城，本春秋时郧国城。”到此为止可见，云——妘——䢵——郧，既相关联又可通用。

妘、芈本同祖，然郧国最终被楚国所灭。楚平王二年（前527年），斗氏后人斗辛封为郧公。只是此郧已非䢵。抚养了斗子文的䢵国之“梦”，终于梦断。云梦最富诗意？确实，是史诗。

十月令

节气

寒露

天气转冷
草木渐渐凋零
古人说『寒露辞青』
饮食务以滋阴润燥为宜

霜降

『一年补透透
不如补霜降。』
霜降进补，吃柿子
赏红叶

节俗

重阳节

敬老、登高、赏菊
饮菊花酒、食重阳糕

是月词

望处雨收云断
凭阑悄悄，目送秋光
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
水风轻，蘋花渐老
月露冷，梧叶飘黄
遣情伤
故人何在，烟水茫茫
难忘，文期酒会
几孤风月，屡变星霜
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
念双燕，难凭远信
指暮天，空识归航
黯相望
断鸿声里，立尽斜阳

《玉蝴蝶》——宋·柳永



《龚野遗墨迹·十二月令山水图册之十》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藏

如果说九月还在恋恋不舍地拖着夏天的尾巴，那么一入十月，仅剩的那一丝暑热之气，便彻底与聒噪的蝉鸣一道消散殆尽。『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曾经蓊郁的山林，仿佛一夕间褪去浓妆。在画家龚贤的笔下，南京郊野的这几株老树，有的甚至残红落尽，只余空枝。左侧，茅屋空无一人；右侧，孤帆亦是形单影只。伤春悲秋素来是中国古代文人逃不开的情结，这画面上刻意营造出的空寂之感，也许便是龚贤彼时的真实心境。

龚贤（1618–1689年）
明末清初画家，“金陵八大家”之一，作品不拘古法，被后人奉为一代独创主义大师。



云中见“云中”

战国时，赵武灵王因见“群鹄游于云中”而建云中城，设云中郡，三国时废置。后来唐玄宗将今山西大同市与朔州怀仁一带改称云中郡。“云中”现在不再作为地名使用，但它美好的文字意象和“持节云中”的典故，已成为文化符号，深入人心。图为山西大同市内罕见的平流雾景观，群鸽飞舞，古城若隐若现，与大同曾使用过的“云中”地名相得益彰。

摄影／李文军

最中国的地名

专辑（下）

一地之名
其实就是一地的历史
地名
堪称中国文明的活化石
探寻地名
即可读懂中国

皇帝最大

帝制时代，皇权最重。在中国历史上，由皇帝赐名、改名的州县不在少数，有些地名历经时代变迁，至今沿用不衰。头戴冕旒的皇帝，从来都是皇权政治的象征。从一个个与皇帝有关的地名里，可以看到政治因素在地名中的重要影响力。

供图/视觉中国

一切为了皇帝

撰文／马柏童

古代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名，谁能定夺？唯有皇家。皇帝的喜怒哀乐，都能影响到地名的更替。每个宋代皇帝都有一本地名经。地名里的皇权，读了就知道。

何以是梅州？

开宝四年（971 年）二月辛未日，广州城外一片萧杀，南汉国主刘鋹一身白衣，从城门走出。他将要向已经团团围住广州城的宋军主帅潘美献上降表。负隅抵抗五个月，南汉军队节节败退，无可奈何之下，刘鋹只能选择投降。按照宋太祖早先下达的旨意，刘鋹被软禁在了宫殿内，等候发落。而潘美则详细整理了平南汉后收复的土地州县户口，写成露布文书，火速送往东京开封。不到十天时间，文书就到达了宋太祖手上。

宋太祖的疆域地图上，从此又多了六十个州，二百四十个县，十七万二百六十三户人口。当宋太祖仔细查看新收复的土地时，一个地名引起了他的注意：敬州。敬州是南汉乾和三年（945 年）所置的新州，管辖程乡县，取名为“敬”，大概是以此表示对南齐时南迁定居程乡县的先贤程旻的尊敬。但宋太祖觉得这个“敬”字格外碍眼。原因无他：宋太祖那位曾做过营州、涿州和蓟州三州刺史的祖父，就叫赵敬。

现代人可能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人名和地名都用这个字，说明“敬”字寓意好，宋太祖的祖父也算起了个好名字。但古人可不这么想。

起于春秋成于秦汉的避讳制度，要求人们应当在言谈举止和书面文字中，避开君主、圣贤和至亲的名字，即《春秋公羊传》所载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赵敬是宋太祖的祖父，属于“亲者”，宋太祖应当避讳这个“敬”字；同时，宋太祖是一朝天子，皇权的掌握者，他和他的家族，属于天下人的“尊者”，他避讳的字眼，当然全天下也要避讳。敬州已经纳入了宋太祖的疆域版图，也就意味着宋太祖需要不时处理和敬州相关的事务，祖父的名讳将被反复使用，岂非不孝？宋太祖当机立断：“敬州犯翼祖（即赵敬）讳，改名。”

敬州最终改称梅州，这个名字直到今天，仍在使用。为何是“梅”字呢？大概源于当地的物产：梅树。梅州盛产梅，现今梅州梅县潮塘村还保留有一株宋明时代的古梅树。南宋诗人杨万里曾赴任广东路，途中亲眼见过梅州的梅林，写下了一首诗：“一路谁栽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敬州”改成“梅州”，平添一份诗意，宋太祖也算无心插柳了。

链接

宋太宗赵光义避讳地名

同近音字

义州-仪州
南义州-南仪州
义宾县-宜宾县
义兴县-宜兴县
义章县-宜章县

同近义字

威义-威德
昭义-昭德
归义县-归信县
招义县-招信县
崇义-崇信
义阳-信阳
彰义-彰化
保义-保平
富义监-富顺监
义成-武成
义武-定武

改称（以山水为名）

通义县-眉山县
义川县-汉川县

除了“敬”字地名，带有宋太祖父亲名字“弘殷”字眼的地名，也逃不过改名的命运。于是弘农郡成了恒农郡，殷城县改为商城县。而他弟弟宋太宗则更进一步。公元976年十月，宋太宗刚一登基，就下达了一道命令：“官阶、州县名与御名下字同者，皆改之。”宋太宗叫赵光义，所以州县名中凡是带有“义”字的，全都要避讳。这可忙坏了有关部门：全天下带“义”字的地名那么多，每个都得想新名字，需要花费多少心思啊。或是用同音、同义字代替，或是另选新名，最终因避讳“义”字改名的州县，有二三十处。

至高无上的地位，令皇帝成为天下人避讳的对象，也使他们有权力以避讳为名，更换地名。当然，一旦改朝换代，因避讳而改的地名，也可以恢复原名。只不过因避讳而产生的地名被长期使用后，已经成了人们普遍接受的名字，换回原名的情况比较少见。

保定的姿态

皇权之大，可以令家事成为天下事，那是否做了皇帝就没有烦心事了？当然不可能。改地名改到天下无“义”字的宋太宗赵光义，就有一桩心病：契丹辽国和他们手中的燕云十六州。

宋太宗刚即位时，野心勃勃，想要继承遗志，夺回燕云十六州，征服辽国，真正一统天下。可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辽高梁河一役，宋军损失惨重，御驾亲征的宋太宗也身受箭伤，靠着一辆驴车才侥幸逃脱。这场失败深深打击了宋太宗北伐的信心，也令辽国在宋辽边境对抗中占据了主动权。宋太宗从此不但不再主动出击，还要时时担心辽国越境劫掠。只有宋辽边境线上那些地名：威虏、宁边、静戎、平戎等等，还在传达着一些太宗曾有过的雄心壮志。

宋辽问题的暂时解决，要等到宋太宗去世、真宗即位之后。景德元年（1004年）秋，辽兴宗母子大举南侵，真宗在寇准等人的支持下御驾亲征澶州城，最终促成了宋辽和议，签订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北宋政府每年送给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看似屈辱，却带来了长期和平相处的局面，是长期战乱之后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结盟之事商量已定，宋真宗回到开封府，除了派遣使节递交国书外，还有一件事要做：改地名。既然宋辽已经议和，边境线上那些充满战斗气息的地名，就必须马上更换，否则如何体现我方的诚意呢？十二月甲辰日，改名的诏书颁布：“改威虏军曰广信，静戎曰安肃，破虏曰信安，平戎曰保定，宁边曰永宁，定远曰永静，定羌曰保德，平虏城曰肃宁。”其中不乏我们熟悉的名字，比如河北保定之名，就是此时正式出现的。

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在帝制社会当中，皇帝是核心人物。除了使节来往、盟约交换外，与百姓息息相关的地名，也是皇帝展示外交成果的一种手段。从剑拔弩张、针锋相对，



到一派祥和安宁，河北边境线上的新地名，就是宋真宗宣告宋辽两国和平关系的“告百姓白皮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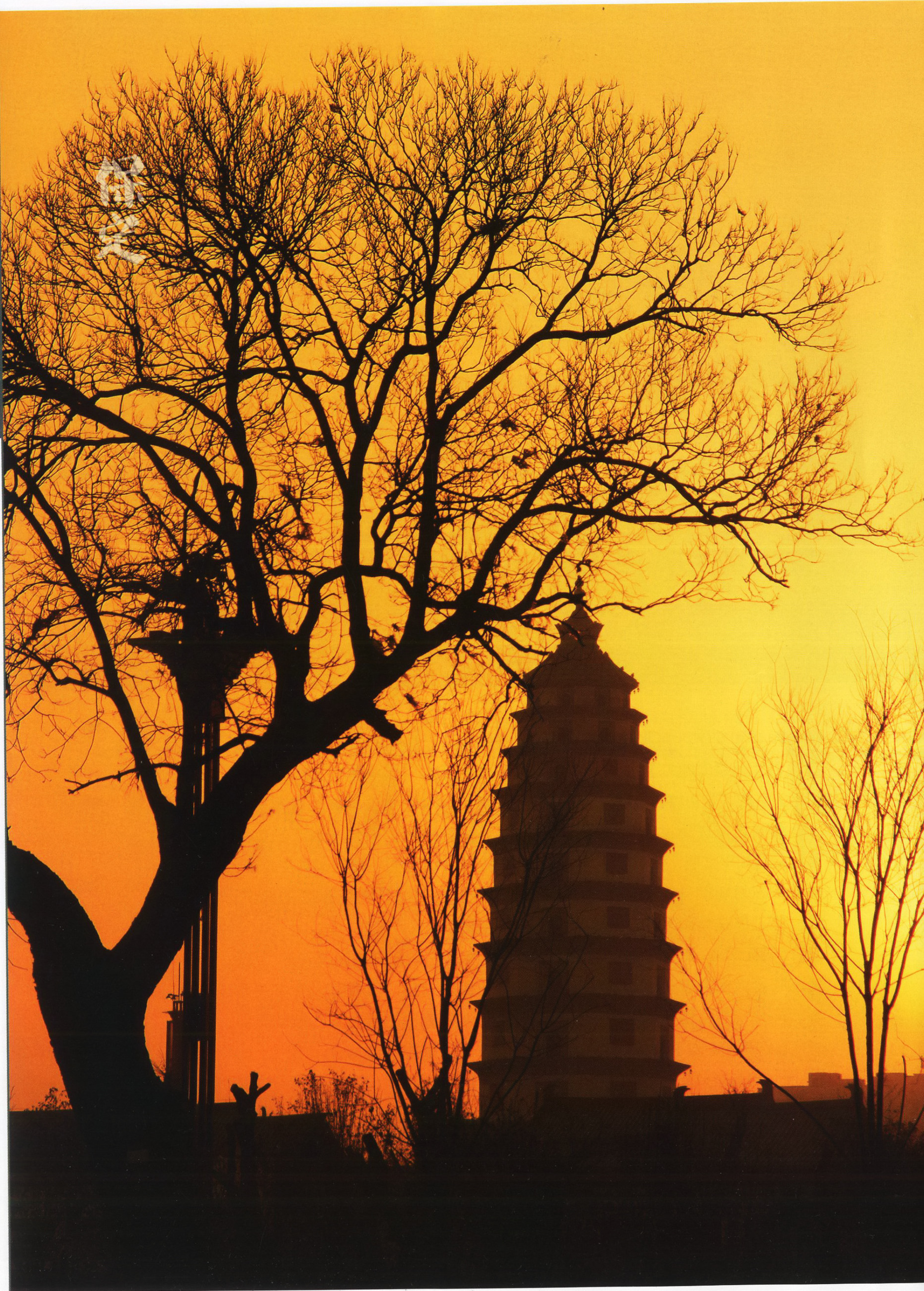
澶渊之盟在后世看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和平之盟，是宋真宗时代甚至两宋三百年间外交史上可圈可点的一笔。但在传统观念当中，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宋辽成为兄弟之国，就意味着大宋皇帝要和大辽皇帝共享“天子”之位，这对于宋真宗而言，实在有些难堪。为了挽回外交场上的“颜面”，宋真宗只得开动脑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公元1008年，宋真宗宣告天下，说自己曾梦见神人，得知上天会降下天书三篇，名曰《大中祥符》。“天书”果然出现了，它们悬挂在东京城的承天门上，倒真像是从天而降的神物。真宗大喜，当即改元为“大中祥符”。三年后，开封府辖下的浚仪县被改名为祥符县。这次改名仍旧是一封“告百姓白皮书”，只不过不是宣扬外交政策，而是进一步推动“神道设教”的把戏，显示皇权威仪。

相比父亲因避讳而改天下“义”字地名的豪气，宋真宗因外交关系而改地名的行为显得有些被动。但他还不是最委屈的那个。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南宋与金议和，南宋让出淮水到大散关以北的部分已收复国土，并向金国纳贡称臣。和议后，宋高宗也曾迫于外交压力改过两个地名：岷州改为西和州；光州改为蒋州。这次改名的原因竟

从义宾到宜宾

宜宾位于四川南部，素有“长江第一城”的美称。汉代设安南县，唐代改为义宾县，取“慕义来宾”之意。宋初，因避讳宋太宗名“光义”，改义宾为宜宾，沿用至今。上图为宜宾市内的三江交汇处，上游是金沙江，下游是长江，岷江在此与长江汇合。

摄影／黎明



贝州兵变，宋仁宗皇帝恩威并用
及时安抚，又将贝州改名恩州
以皇帝之“恩”易钱财之“贝”
不动声色间，申明了皇权的力量

是避金国国主、太子的名讳！从真宗和高宗因外交而改地名的原因上，就可以看出宋辽澶渊之盟和宋金绍兴议和这两次重大外交事件中，赵宋政权所处的不同地位。

两宋特殊的外交环境造就了体现外交关系的诸多地名，而从这些地名中可以读到的，是皇权威严下藏着的一丝无可奈何。

是恩，是严，帝王手段

在帝制时代，对皇权造成威胁的，要么是周边政权的冲击，要么是统治内部的威胁。赵宋三百年间，最大的威胁始终在外，先是契丹辽国，然后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大金，最后是风卷残云的蒙古。那疆域内呢？如秦末、隋末一般，天下英雄揭竿而起的情况虽不曾发生，但伺机而动的小规模反叛，同样让皇帝们大伤脑筋。

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初一，东京开封府发生了日食天象。在古人看来，日食乃凶兆。果然，没过多久，宋徽宗就接到了来自睦州的急报：睦州青溪县人方腊聚众作乱，杀死了当地的朝廷官员，十多天时间就已经聚众数万人。宋徽宗并没有把睦州的这场叛乱放在眼里，他只派了宦官谭稹（zhěn）一人作为朝廷统帅，前去镇压。

事实证明，宋徽宗低估了方腊，两个月的时间，方腊已经以家乡睦州和相邻的歙州为大本营，攻取了衢州和桐庐、富阳等县，直逼杭州城。能力平平的谭稹毫无作为，徽宗只好又派出心腹宦官童贯，挂帅征讨方腊。叛乱直到第二年四月才因方腊被擒而宣告结束。

叛乱平息后，宋徽宗异常愤怒。原本宣和二年初，他已经派赵良嗣出使金国，要和金国结盟，一同攻辽，实现当年太祖、太宗都未能实现的“收复燕云”大计。可方腊的内乱彻底打乱了他的“攘外”计划，“收复燕云”只能暂时押后进行。意难平的宋徽宗下发了一道圣旨：“改睦州为严州；歙州为徽州。”

怎么又是改地名？！这并非宋徽宗的突发奇想。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年底，贝州驻军因为不堪知州欺压，在信仰弥勒教的军官王则的带领下反叛。宋仁宗镇压了王则，同时安抚当地百姓，很快平息了事端。后来，仁宗给这件事留了个“纪念”：贝州改名恩州。兵变发生是因“贝”，也就是粮饷赋税而起的；事件解决则是依靠皇帝的“恩”。以“恩”易“贝”，在不动声色间，申明了皇权的力量。

那宋徽宗新改的这两个地名有何深意呢？发生了叛乱的睦州当然不再和睦，应当在当地重申皇权，

地名讲述战与和

北宋建立之初，与北方的契丹辽政权曾多次发生战争，因而河北边境线上的地名，多使用带有敌对意味的字眼。公元1004年，宋真宗与辽国签订和平协议澶渊之盟，并更改河北地区地名，以示两国间全新的外交关系。其中平戎军即更名为保定。左页图为河北保定的定州塔，曾作为北宋防御辽国的料敌塔使用。古塔和保定这个地名一起，见证了宋辽两国的战与和。
摄影/李茜



徽宗定徽州

宋徽宗平定方腊起义之后，改歙州为徽州，取“徽”字绳索之意，强调皇权对当地百姓的束缚力。如今，徽州当年改名背后的政治含义早已淡化，而成为一方地域文化的象征。风格独特的徽派民居建筑，是徽州文化的代表，位于安徽黟县东北部的宏村，是最具代表性的徽派建筑村落。上图即为徽派建筑的外墙造型。

供图/视觉中国

“严”加管理。而“歙”字同“翕（xī）”，也有和洽的意思，同样必须改名。“徽”作何解释？南宋编写的《新安志》认为“徽”是指境内的徽山和徽溪；清代《徽州府志》则解释为“徽，美也，故以为名”。这两种说法都和严州的改名思路不太一样。或许改名时，宋徽宗心里想到的，还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徽”的解释：“纠绳也。”“歙州”改成“徽州”，意味着对当地的管理，要如同绳索一般，牢牢束缚住。

恩州体现了皇权怀柔的一面：颁行利民的政策，赢得民心，巩固统治；而严州和徽州则体现皇权严酷的一面：一旦权威受到挑战，将不惜一切，用高压强制手段，维护自身利益。恩威之间，正是皇帝治理天下的手段。

重庆庆的是什么？

其实早在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就因为有人“谋反”而改了个地名。这个“谋反者”叫赵谂，父亲是归顺朝廷而被赐姓赵的西南少数民族首领。赵谂参加过科举，是一位兢兢业业的政府官员。然而有人向宋徽宗告发，说赵谂曾抨击宋哲宗绍圣年间的朝政，还私立年号，意图谋反。徽宗此时刚刚即位，立足未稳，正需要整顿朝纲，树立威信。所以他并没有详查“谋反”罪名的真实性，而是马上将赵谂下狱处死，父母妻儿流放，其他“同党”也被严刑惩处。后来，宋徽宗又发现赵谂是渝州（今重庆市）人，而“渝”字有“变”的意思，似乎预示着赵谂的“反叛”。于是他改渝州为恭州，用地名来约束人心。

恭州是宋光宗的“潜邸”

宋朝的皇帝即位以后
潜邸会从州升为府，提升政治地位
于是，恭州改名重庆府

恭州从此恭顺，应该可以保住这个新名字了吧？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的八月初七，恭州又改名了。就在这天，它成了“重庆”。

为何要改名？因为恭州是新即位的皇帝宋光宗的“潜邸”。皇帝还是皇子时会被封为王侯，王侯都有名义上的封地，也就是“潜邸”，或者叫“潜藩”。宋朝的皇帝即位以后，潜邸就会从州升为府，提高政治地位，这是皇帝的特权。既然潜邸的地位升格了，名字也得换一换，才能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来。至于取什么名字，那就要看皇帝和有关部门商量的结果了。取吉祥字眼，讨讨喜气，显然是个好办法。

宋朝皇帝给潜邸府命名时，尤其偏爱“庆”字，大概是用这个字来表现即位登基的激动心情吧。宋徽宗做过“端王”，端州（今广东肇庆市）是他的潜邸，被命名为“兴庆府”。有识之士提醒徽宗，西夏李氏王朝的都城，也叫“兴庆府”，于是徽宗又改“兴庆”为“肇庆”，取“开启吉祥喜庆”之意。经过徽宗亲笔题名的肇庆之名，沿用至今。宋高宗也命名自己的潜邸康州和蜀州为“德庆府”和“崇庆府”。

历来关于“重庆”之名，有两种说法。其一是重庆府位于顺庆府（今四川南充）和绍庆府（今重庆彭水县）之间，所以是“重”庆。但顺庆府和绍庆府都是宋理宗的潜邸，命名的时间比重庆府晚了三十多年，这个说法显然是后来人的牵强附会，只能证明宋代皇帝对“庆”字的钟爱而已。

另一种说法则看起来合理得多，也传奇得多：在这一年，皇子赵惇于正月封恭王，二月受内禅即帝位，喜事接踵而至，自诩“双重喜庆”，遂命名为“重庆”。这也错了。据《宋史》记载，赵惇封恭王在宋孝宗即位之时，封为皇太子在乾道七年（1171年）二月。即位这一年并没有“双重喜庆”发生，怎么能因此而“重庆”呢？

难道“重庆”的得名，就永远解不开了？宋光宗其实已经悄悄给了提示。禅位大典结束后，父亲宋孝宗入住了“重华宫”，而光宗的生日节，也被他命名为“重明节”。光宗即位时使用的，仍是父亲的年号。在某种意义上，此时的南宋朝廷，有两位皇帝。所有的“重”字，指的恐怕都是当时存在双重皇权这一特殊现象。“重庆”不是宋光宗自己的“双重喜庆”，而是孝宗和光宗两个人的喜庆：光宗登基，大权在握；孝宗禅位，颐养天年。

因为爱，所以景德镇

除了恭王，宋光宗还挂名任过荣州刺史，恭州改名升府了，荣州

呢？光宗并没有忘记，他给了荣州一个和自己关系更密切的新名字：绍熙府。“绍熙”是光宗皇帝为之改名时正在使用的年号，也是光宗一生中唯一的年号。

“年号纪年”是帝制时代纪年的主要方式，与“皇帝”称号紧密相关。称帝、建年号，是掌握皇权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以年号为地名的情况，也非常普遍。

宋真宗签订澶渊之盟时的年号“景德”，就曾被他拿去当作地名，赐给制瓷重镇昌南镇。这才有了今天的景德镇。

为何偏偏是“景德”？传说是因为辽国萧太后提出，如果宋廷能在三个月内进献20万件剔透晶莹的青白瓷器，便班师回朝，不再侵宋。宋真宗于是派人前往昌南镇督造青白瓷。工匠们没日没夜，两个月生产出了各式青白瓷器30万件，促成了宋辽和议。宋真宗欢喜之余，才赐年号封镇。传说故事虽然有些儿戏，但昌南镇在景德年间盛产青白瓷确是事实。

当时昌南镇所制瓷器精美，釉色已接近珍贵的玉器，被称赞为“假玉器”。而对昌南镇瓷器的征调，从唐高祖武德年间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过。北宋时烧制的青白瓷更有“冰肌玉骨”的美誉。景德年间，昌南镇以青白瓷进贡，“清如天，明如镜，

链接

重庆是因位置得名的吗？

公元1189年，恭州作为宋光宗潜邸，由州升府，改名“重庆”。皇帝潜邸升府后，多以“庆”为名，除重庆外，又有袭庆、肇庆、德庆、崇庆、隆庆、安庆、宝庆等地名。公元1227年，果州因曾为宋理宗潜邸而升为顺庆府；第二年，黔州也被升为绍庆府。重庆恰好位于顺庆与绍庆之间，因而后人附会，“重庆”是因为地理位置而得名。事实上，重庆之名，很可能是对宋孝宗禅位颐养天年、光宗登基执掌天下的双重庆祝。

绘画 / 花花酱





薄如纸，声如磬”，深受宋真宗的喜爱。于是，“景德”年号就和昌南镇的瓷器分不开了：“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宋真宗爱青白瓷，不但影响了社会风尚，还直接导致了地名更替。如果他不是皇帝，恐怕很难做到。

年号地名和皇帝的个人喜好关系颇密。试想，如果不是能“打动圣意”之地，皇帝又怎会将代表了正统地位的年号轻易相赠。

宋光宗用年号命名荣州，是否也因为当地有他挚爱之物呢？已经无可考证了。不过，南宋皇帝的潜邸府有不少直接拿年号来命名的，恐怕是因为年号代表了皇帝，也就直接证明了命名地与皇帝的紧密关系吧。只是，年号地名也因为和君主关系太过密切，当改朝换代时，很容易遭到遗弃，能像景德镇一样被永久保留下来，实属难得。

关于地名与皇帝、与中央朝廷的关系，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汉学家罗志豪曾这样写道：“命名的政治因素是十分明确的；地名传递出朝廷对地方的信息：对中华文明、朝廷恩泽的赞扬的标榜遍及整个领土，同时也形成国家维系不同区域的共通纽带。”当朝廷不再、皇帝有名无实之时，皇权对地名的影响，就没有存在的土壤了。

公元1278年，六岁的赵昺称帝，定都广州。漂浮海上的战船已载不动赵宋江山，两年后，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自尽。而小皇帝和他的流亡朝廷为广州改的新名字“翔龙府”，还有谁能记得？

年号赐予景德镇

陶瓷之都景德镇在宋初名为昌南镇，以擅长制造青白瓷器闻名。“镇”在宋代以前，是在边远地区设置的驻军点。宋代以后，在工商业比较繁荣的中小集市设“镇”管理，即市镇之镇。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昌南造御瓷进献朝廷，宋真宗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给昌南为地名，故有景德镇。景德镇遍地窑厂，制瓷工艺至今不衰，上图即为景德镇的窑厂与瓷器。

摄影／张瑞麟

责任编辑／周玥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刘扬

绥、抚、镇、远、义、德、定、宁……

那些兵戈铁马的烙印

撰文／冰雪冰

伴随着中央王朝征与战的脚步，旧地换新颜。新的地区应当怎么命名？历代统治者都有相似的考量：借地名希冀一地安宁，推行教化。

遍地有宁远

明代末年，为了抵御后金进攻，袁崇焕以山海关、宁远、锦州三城为重点，构筑了一条“关宁锦防线”。其中，宁远城是中坚所在，袁崇焕驻守于此，在宁锦之战中迫使皇太极无功而返。所谓宁远，取安宁远疆之意。图为宁远古城夜景。它今名辽宁省兴城市，改名的原因十分有趣：与山西、湖南、甘肃等地区的宁远县重名。揆诸历史，今海南三亚西北崖城隋时设宁远县，今四川茂县西唐时置宁远县，若尔盖县一带唐时置宁远县，今广西北流县唐时置宁远军，今湖南宁远县明时设宁远卫，今内蒙古凉城县清时设宁远厅，今新疆伊宁市清时筑宁远城：可谓遍地有宁远。除了湖南宁远，其他的都已废置或改名。供图／东方IC

难以安宁的宁夏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世祖忽必烈更改行政区划，将原来“西夏中兴等路行中书省”的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改为“宁夏路总管府”，后来又改设“宁夏路行中书省”。宁夏这个词汇，第一次成为了行省的名称。

宁，安宁和谐；夏，就是夏国故地。夏地安宁，饱含了忽必烈对这片土地的美好希冀。然而，寓意愈是美好，其背后的军事征战，便衬托得愈加血腥残酷。

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兴州（今宁夏银川市）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两百年内，割据西北，称霸一方，北宋、辽对其数次用兵都无可奈何。当13世纪蒙古铁骑肆伐欧亚大陆时，大夏国的末日降临了。面临战无不胜的成吉思汗大军，西夏俨然是俎上鱼肉。

但这块骨头出乎意料地难啃：自1205年成吉思汗第一次伐夏，历经二十余年，未克其功。直到1227年第六次出征，十万大军围困住西夏国都中兴府，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的帮助下，终于拿下了这座城。成吉思汗高兴吗？不，死人不会说话——在西夏国主李晛（xiàn）出城投降之



前，成吉思汗已病死在了六盘山。

六度征伐廿二年，却倒在了胜利前的最后一刻，难以平定的大夏国一定让成吉思汗抱憾终身吧。而三十几年后，这片土地再度让新任的帝国统治者头疼了起来。

公元1259年，蒙古统治者宪宗蒙哥汗骤然死于南宋合川城下，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开启对汗位的争夺，次年，抢先一步的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召开忽里台大会，即大汗位，改元中统。一个月后，阿里不哥在和林（今蒙古哈拉和林）自称大汗。忽必烈的处境有些危险：蒙哥的旧部几乎都站在了名义更正的阿里不哥一边。其中就有屯驻在今宁夏南部六盘山的哈剌不花、浑都海，是举兵反对忽必烈的主力。历经三个月，忽必烈终于平息了夏国故地上的战火。

夏地真是难以安宁啊！当初蒙古灭亡西夏后，是怎么治理的呢？其实并没有什么治理可言，地震、兵乱、屠城，城镇化为废墟，土地荒芜无人耕种……浑都海给本就严峻的局势又添了一把火：将郡县府库洗劫一空，本就稀少的居民纷纷逃匿山谷。

在平定浑都海之后，忽必烈接管了这片地区，兴修水利，招集流亡，推广文治，一系列措施使得西夏终

战争与和平

西夏王陵宁静地安卧在贺兰山下，烽火狼烟早已散去，但这里曾经发生的战事却昭示着这片土地并不宁静。从夏政权割据西北，再到蒙元的浑都海之乱，终于在元世祖忽必烈手中安定了下来，地名也因之被更改为宁夏。

供图/视觉中国





土司须改流
在被视为万历三大征的播州之役中，明王朝的军队在海龙囤激战多日，最后一任播州土司杨应龙自尽身亡，统治播州长达725年的杨氏土司宣告终结，播州从此“改土归流”。这项改土司为中央派遣流官的政策，在明清两代广为施行，一些地名随之改易，变得富有征服与教化的意味。上图为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飞龙关。
供图/视觉中国

于安宁下来。自然而然地，人们逐渐放弃了“西夏”这一旧的历史名词，改称“宁夏”。是的，这个名称其实首先使用在民间，直到至元十九年（1282年）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书，并在几年后，像一个紧箍一般，被忽必烈永久地加套在这片土地上。

倘若把目光从西北转移到在中国四面八方的“新疆”“旧疆”上，还有无数类似“宁夏”的地名。它们带有浓重征服意味的“绥、抚、镇、顺”，或者富含教化意义的“义、德、仁、昌”等字眼，宣示着中央王朝的天威。

用地名教化“新疆”

在今天云贵川三省交界处，有一个昭通市，历史上曾隶属于四川或云南，今日是云南地级市。昭通，原名乌蒙，在统治者眼中，“乌蒙者，不昭不通之至也”；而重归中央王朝统治之后，乌蒙变得又昭又通，“举前之乌暗者而昭明，后之蒙蔽者易而宣通”，因此改名昭通。

再来看一个现象，在西南地区的群山峻岭中，许多地名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比如，遵义、兴义、仁怀、兴仁、长顺、安顺……这种“刻板”的局面，又是如何形成的？

它们都和历史上著名的“改土归流”事件有关。所谓“土”，即土司，又称土官、酋，是古代中国边疆的官职，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这些地区由土官世袭管理。所谓“流”，就是中央政府派遣的流官，官员不

统治者使出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略
一方面，在战略要地设置屯堡，派军户驻守
另一方面，推崇儒教、推广教化

这其中，朗朗上口的地名起了巨大作用

固定，因时而变。

土司既是世袭制的，便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不利于中央集权。比如著名的海龙囤杨氏土司，统治播州(今属贵州遵义市)长达725年，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最后一任土司杨应龙举兵反明，迫使朝廷派遣24万大军历时114天方才平定。平播之役后，朝廷拉开了改土归流的帷幕。

局势在清代雍正四年(1726年)再度发生变化，对依旧不容小觑的西南土司势力，清廷狠狠动了刀子。是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阐述改土归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建议对不顺服朝廷的土司，政治解决为主，军事征服次之。皇帝对鄂尔泰的建言颇为赞赏，全盘接受施行。两年后，鄂尔泰进而被任命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在朝廷的兵威下，大小土司纷纷俯首。

这片刚经历动荡的土地，应该如何治理？统治者使出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略。一方面，在战略要地设置屯堡，派军户驻守，并分配土地和种子进行屯垦。另一方面，推崇儒教、推广教化，向当地人灌输礼义廉耻信的道理。这其中，朗朗上口的地名起了巨大的作用。——前面提到的昭通，便出自鄂尔泰的手笔。

据统计，清代贵州省的14个府中，有教化色彩的占了很大比重。比如新化府，取“新入王化”之意；镇远府的含义更明显，是“镇服边远地区蛮夷”的意思。而兴义府的故事更加曲折：它原名南笼府(今贵州安龙县)，直到嘉庆二年(1797年)才改称兴义府。原来，上一年贵州苗民起义，南笼府遭到围困。当地的士绅坚守不投降，一直撑到官兵解围。为了嘉奖士绅的“深明大义、众志成城”，皇帝特命改南笼为兴义。

链接

用地名教化西南

威宁
清康熙三年(1664年)平水西、乌撒，次年载乌撒卫置威宁府。取“威镇安宁之”意。1913年置威宁县。

普定
元置普定县，属普定路。据《郡县释名》：普定“取普里底定之义也”。普里为部落名。

兴义
清嘉庆三年(1798年)置兴义县。兴义之名得于清王朝镇压南笼起义之后，取“兴起忠义”之意。在这场战事中，同时改名的还有贞丰县，取“忠贞丰茂”之意。

永善
清设县。据《嘉庆永善县志》：“因当地土酋叛服靡常，变乱频繁，为形势所迫，相度地宜。建城永善，取其边境永久安平，民众平和善良之义。”

宣威
清置宣威州，1913年改县。据《云南宣威县地志》：“自鄂尔泰命将平土司之乱，宣布威德于此，遂名其县曰宣威。”一说县东有宣威岭。1994年设市。

资料来源：牛汝辰《中国地名由来词典》



黑龙江·东宁

西南临吉林省，东与俄罗斯接壤。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置绥芬厅，驻三岔口。1909年，绥芬厅升府，移治宁古塔，原治三岔口改设东宁厅，是东宁市的前身。图为东宁要塞，1935年始建于侵华日军之手，为修筑要塞，先后有17万劳工被迫参与。虽然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但东宁战役一直持续到8月30日。

辽宁·北镇（北宁）



五镇山之一的北镇医巫闾山位于此地，因此“北镇”之名更为人所知，这也是北宁今天的地名。其实，北宁只存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1995年改北镇县为北宁市，11年后便恢复北镇的旧称。此地还有一个名称，广宁，可追溯到金代升显州为广宁府。明时在此设广宁卫，曾是辽东镇总兵的驻防之地，即东北最高军事机关驻地。图为北镇庙内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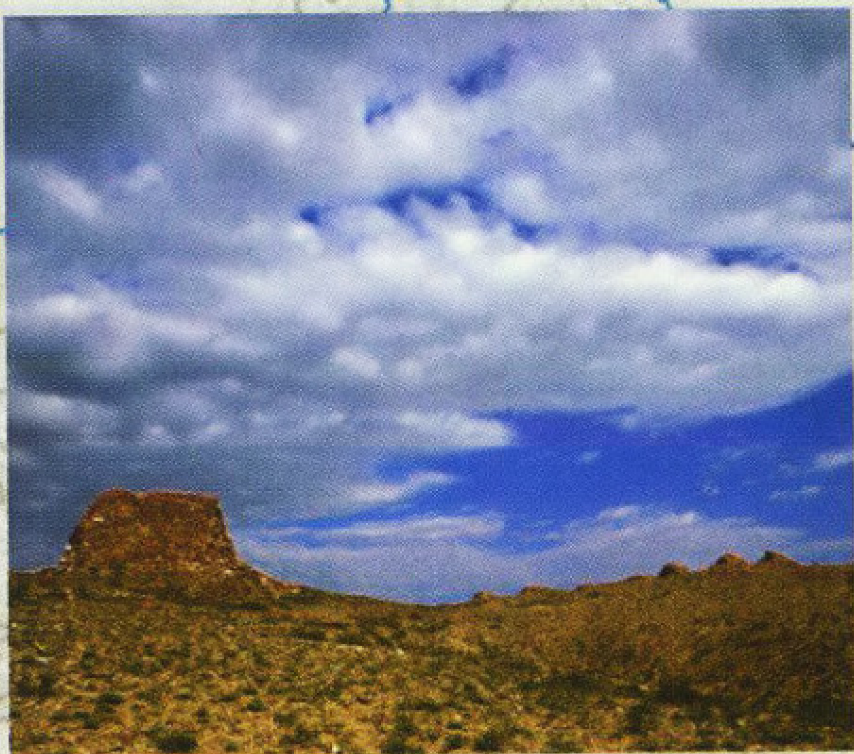
青海·西宁



西汉时置邮传驿点西平亭，已见西陲平定之意。西晋时置西平郡，属凉州，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改为西宁州。西宁地处湟水上游，是青藏高原东方门户，也是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地，古有“西海锁钥”之称。图为西宁西门文化广场。

宁夏·中宁

位于宁夏中部，驻宁安镇，隶属于中卫市。1933年，析中卫东部置中宁县，取中卫、宁安首字合称中宁。《嘉靖宁夏新志》称赞其地理位置：“后接贺兰之固，前有大河之险。左联宁夏，右通庄浪，边陲之要路也。”图为明长城遗址。



广西·南宁

简称为“邕”，正是其前身邕州的缩写。唐时改设邕州，是岭南西道的治所。元代泰定元年（1324年）为庆祝边疆绥服，改邕州路为南宁路，寓意南疆安宁。图为南宁一段清代古城墙，根系发达的大榕树在城墙上扎下了根。



东南西北中的宁

在中国一千多个县级以上的地名中，带有“宁”字的有79个，带有“安”字的有118个，或许是地名中出镜率最高的字了。倘若把乡镇街道村落一级的地名再考虑进去的话，这个数字只会更加庞大。安定宁和，不只是统治者对国家政权的要求，也是普通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颇为巧合的是，在东西南北中几个方位上，都有与宁搭配的地名。安宁，大于一切。

供图／视觉中国

我们再看看政权的神经末梢——里。“里”属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基层行政单位，贵州含有教化意义的“里”，大多数属于汉族聚居区，也有少量是汉民中夹杂的“熟苗”“熟夷”村寨。这些村寨类似于“示范样板村”，既给周围的苗民做了正面的文化示范，告诉他们何为文明，何为教化；又警示边疆汉民，保持儒家文化传统，切勿被蛮夷“苗化”。比如在都江厅，有14座带“德”字的里:福德、全德、尚德、明德，等等；还设置了9座带“仁”字的里:树仁、建仁、治仁、同仁，等等。

著名人类学者徐杰舜著有《雪球》一书，还原了华夏民族向外开拓的进程。书中作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华夏民族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就像“滚雪球”似的,逐渐扩大,延伸疆域，又具有雪球的凝聚特征,由多元走向一体。随着雪球越滚越大,新开拓的疆土变为“旧疆”,而“旧疆”进一步成为“腹地”，西南地区地名的演变，就是说明。

王莽
歇斯底里的地名改革爱好者

地名改得合适正当，就可以起正面作用，比如宁夏；倘若随意胡来，不考虑现实利弊，则往往事倍功半，甚至起反作用。史上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王莽了。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秉权执政，公元8年，进而取汉自代，易国号为“新”,史称“新莽”。王莽上台后，推行了一轮轮的币制改革、激进的土地国有政策等举措，要托古改制。其中就包括更改地名。

拜其所赐,当时全国1500余县，没有被改名的只有800多个，近半数的县名一夜之间换了新名字，得有多乱？王莽改名有一个特点，学者阎步克说:“王莽在规划制度时，……力求达到形式上的整齐和谐。”比如，王莽把豫州六个郡——南阳、河内、颍川、弘农、河东、荥阳,全部以“队”为名:分别叫前队、后队、左队、右队、兆队、祈队，合称豫州六队。“队”通“遂”,是顺遂之意,但都叫“队”,就难免有“强迫症”的作风。

上述改名，如果说还仅仅是引起混乱的话，那么王莽修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名字，则直接引爆了民族矛盾的火药桶。

其实，经过汉武帝通西域、讨匈奴、定辽东、征东瓯、开蜀道、平南越等军国大政，在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已然占据了上风。汉代边疆内外的民族关系，也从激烈碰撞走向了消融和解。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要来长安朝觐皇帝。在讨论接待礼仪时，汉宣帝就力主以诸侯王之上的礼仪对待单于，把匈奴当作体量相当的异质文明来对待。《汉书》记载，王莽上台前，汉匈边疆和平了数十年，边境线上牛羊繁殖，贸易发达。

可王莽要开创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首先就体现在对边疆地名的改动上：陇西郡改称“厌戎”，下辖狄道成了“操虏”；琅邪郡变成“填夷”;雁门郡没了雁门，成为“填狄”;

链接

细数
王莽那些虏

西汉末年，王莽上台执政，推出诸多改革。针对地名，将镇、厌、平等具有镇压意味的词汇，贯在虏、戎、狄、胡等对少数民族的蔑称前面，是王莽华夷观的具体体现，让我们看看都有哪些虏吧。

西汉县名	王莽县名
开阳	厌虏
富陵	槊虏
诸暨	疏虏
黝	愬虏
曲江	除虏
武都	循虏
令居	罕虏
扑	敷虏
删丹	贯虏
骊靬	揭虏
番和	罗虏
乾齐	测虏
乐街	截虏
成宜	艾虏
广成	平虏
交黎	禽虏
文成	言虏



台南的一变再变

荷兰——普罗民遮城
郑成功——东都承天府
郑经——东宁
清朝——台湾府
清末——台南府

定襄郡的武进呢，变身为“伐蛮”。听上去口气不小，要打遍东南西北似的。看到这你可能要问了，为啥王莽这么狂?

原来，王莽是个儒生。在儒家文化中，中央是“中国”，四面八方是“四夷”，蛮夷朝贡中央国家天经地义。更改地名，只是让它们心里有数，回复到应有的位置。东北有个地方政权叫高句丽，王莽偏偏要改成下句丽。由“高”到“下”，其含义不言而喻。

结果呢，由于实力和野心不匹配，新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全面崩坏。《汉书》记载，王莽一通胡搞，导致边疆纷纷爆发战争。王莽派去征讨匈奴的四路大军还没在边境集结完毕，长安就传来消息：王莽的人头被起义军砍下，当球踢了。

说到底，想要借地名彰显大汉天威，不是改动几个字那么简单，背后没有强大国力的支持是不行的。

台湾的纠结与反复
要不要教化?

当我读到有关台湾地名的材料时，眼前一亮:既有不屈不挠的信念，也有不便明说的顾忌。几百年的时间里，台湾的主人换了又换，从荷兰，到郑成功、郑经父子，再到清朝，转而沦入日本之手，再重回中国。几方势力的博弈，都凝固在地名和更改上，地名里征服与教化的意味，换了又换。

“台湾”，本是个自然名称，不含有什么政治意义。这个大岛与福

建省隔海相望，古来便是闽南人和土著民来往频繁的地区之一。学者陈名实在《台湾地名中的中国意识》一文中指出，在闽南人看来，台湾这地方就是露出海上的一连串沙洲岛屿，形似大鱼在海中翻腾前进时，露出水面的一点点脊背。于是，闽南人就把这些沙洲命名为“鲲鯓”，如大鱼一样浮在海面。至今台南地区还有以此命名的地名。那时，台湾的原住民是西拉雅族人，他们读“鲲鯓”的发音是Tayovan，闽南人根据读音译成汉字，有“台湾”“大员”等。当1624年荷兰人入驻台湾筑建堡垒后，闽南人就称之为台湾城或大员城。

如果说荷兰人修了奥伦治和热兰遮城，是在一步步地让地名“荷兰化”，那么，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则是让地名“中国化”。大家知道，明末清初，郑成功一直高擎“反清复明”大旗，在闽粤沿海持续抗清。后来看地盘越来越小，金厦不能长久驻守，听从幕僚建议，挥师直指台湾岛，要建立稳固的基地。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立刻便更改了地名。据记录了郑成功经营台湾经过的《从征实录》一书所载，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五月初，郑成功“改赤嵌地方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以府为承天府，县为天兴县、万年县。……改台湾为安平镇”。明京，明朝京城；东都，东部的都城。郑成功借此表示，台湾是大明王朝的疆土；天兴和万年，表达了顺成天意、疆土万年永固的意思。总之，无论“反清复明”的事业能否成功，这杆旗帜始终不能倒。

然而，谁也无力扭转明亡清兴的大局。郑成功来台湾不到一年，病逝。继任者郑经，更改了父亲难以为继的路线政策，偏安一隅。郑经下令，将“东都”改为“东宁”，又划分府治为东安、西定、宁南、镇北四坊，意图安定四方。此外，还把汉人聚居区划为24个里，如崇德、长治、开化、永定等，均是含有征服意思和儒家教化的词语。

当时明郑政权和清朝隔海对立，双方一直在谈判。有趣的是，清朝

“台湾”的反复

台湾每个历史时期的地名都有自身考量。左页图为赤嵌楼，荷兰殖民者在此修筑普罗民遮城，华人称之为赤嵌城；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为东都承天府，以示为明朝东面都城；其子改名东宁，有偏安之意；清设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着意避开政治寓意，清末改为台南府并沿用至今。下面两图分别是热兰遮城油画和安平古堡图。热兰遮城是荷兰人在台湾修筑最早的一座城，郑成功改之为安平。

供图/T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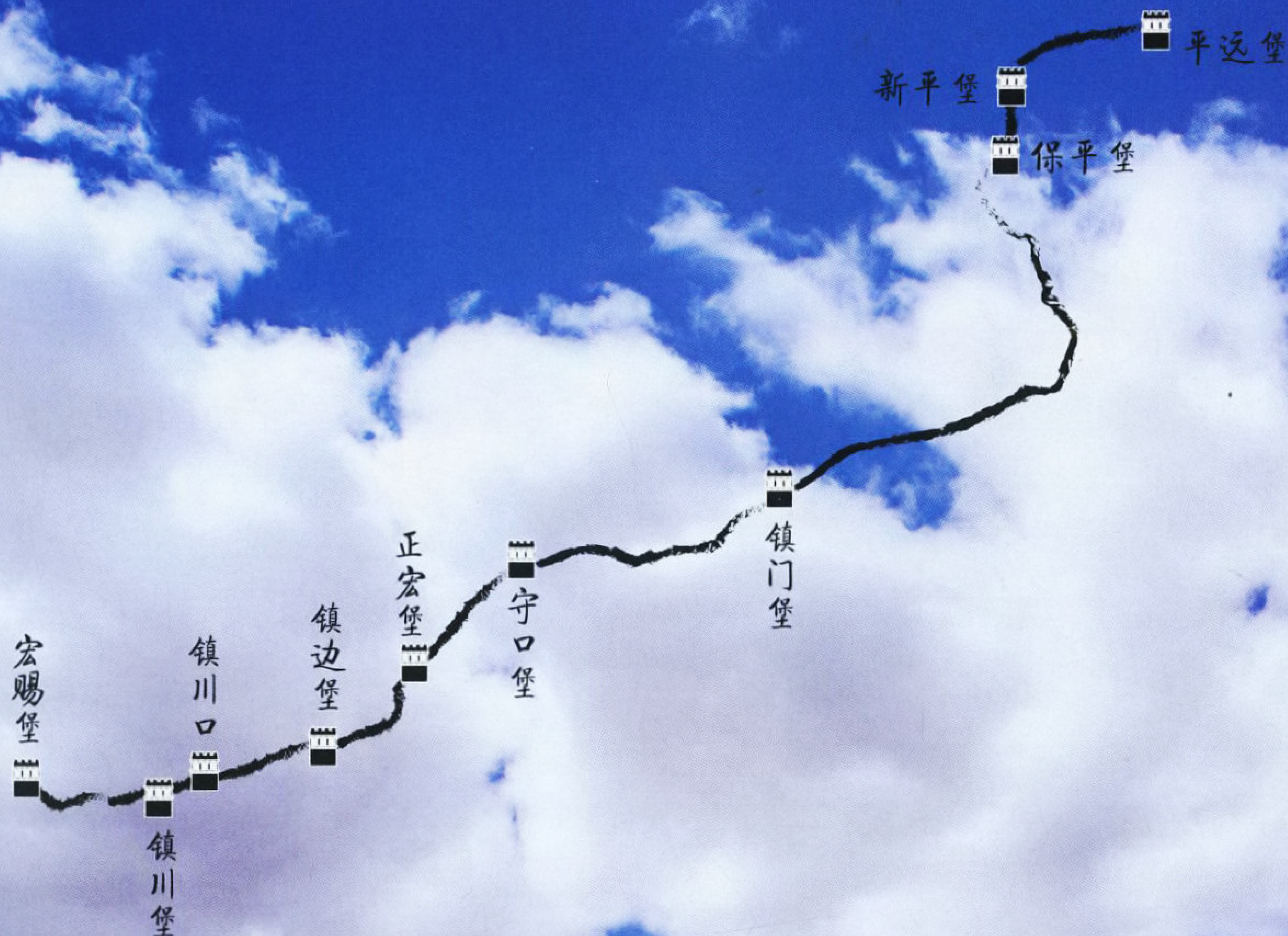


的文告中，从来没出现过“东宁”这个地名。清廷根本不承认有东宁，只有台湾。康熙皇帝说，只要郑经“果遵制剃发，高爵厚禄，朕不惜封赏。即台湾之地，亦从彼意，允其居住”。

一般来说，中央王朝征服一地，会更改并创设一些新地名，以标榜武功和德化。然而，台湾特别棘手。清廷对明朝的一切特别敏感，唯恐有人拿着“反清复明”做文章。

于是，台湾地名又变得清新自然了：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凤山、诸罗，是岛内的两座山。可见，这些地名与“绥、抚、镇、顺”“义、德、仁、昌”的传统，相背而驰。

前文写了，台湾是一条大鱼。在“山和鱼”的框架内，只能容纳这样的名称：或是闽粤移民的冠籍地，例如南靖厝，在台北县莺歌镇的南



的文告中，从来没出现过“东宁”这个地名。清廷根本不承认有东宁，只有台湾。康熙皇帝说，只要郑经“果遵制剃发，高爵厚禄，朕不惜封赏。即台湾之地，亦从彼意，允其居住”。

一般来说，中央王朝征服一地，会更改并创设一些新地名，以标榜武功和德化。然而，台湾特别棘手。清廷对明朝的一切特别敏感，唯恐有人拿着“反清复明”做文章。

于是，台湾地名又变得清新自然了：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凤山、诸罗，是岛内的两座山。可见，这些地名与“绥、抚、镇、顺”“义、德、仁、昌”的传统，相背而驰。

前文写了，台湾是一条大鱼。在“山和鱼”的框架内，只能容纳这样的名称：或是闽粤移民的冠籍地，例如南靖厝，在台北县莺歌镇的南



靖里。厝的意思，是棺材停放待葬。而南靖原在福建漳州，移民们即便来了台湾，还想着有朝一日能归葬故里。或是冠姓地名，同姓聚族而居并加上本族姓氏形成的地名。比如说台南的谢厝寮，迄今谢姓仍占半数;六甲乡的三姓寮，就是陈、黄、吴三姓移民所建。

可这浓浓的中国意识和乡土情结，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之后被打断了，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岛内大区域地名的“大字”全部更名为“町”，日本移民聚居区则直接起了日本名字，如吉野、吉安、田中、日升等。直到1945年台湾光复后，又是一个“复中国化”的过程。台北近郊有座草山，蒋介石特意把它改成“阳明山”，既安放了偶像，又宣传了中国传统文化；台北有四条主干道，光复后也回归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951年5月16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和《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相当数量的边疆地名再次被更改。比如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而广西的镇南关，为了睦邻友好考虑，就更名为睦南关、友谊关。只要是含有“绥”“化”“平”“镇”“宣”等彰显中央王朝军事征服的字眼，几乎全部被更改了。更遑论山西北部晋蒙交界处的长城军堡中的“胡”“虏”，今日所见，已是杀虎堡、镇鲁堡了。

这其中还闹了个笑话。云南有个宣威县，被认为是“宣扬大汉天威”，就改成了榕峰县。然而，这里特产火腿，海内外都认“宣威火腿”这块招牌。改成“榕峰火腿”，火腿卖不出去，影响了出口。于是，到了1959年，“榕峰”下架，“宣威”再生。

烽烟消散，被更改的地名呢？像一块块烙印，有的磨灭了，有的痕迹难消。

长城上的守卫

山西北部晋蒙交界处，沿着长城设置的一系列明代军堡，地名富含平定边疆的意味，诸如保平、镇边、平远之类。左图为保平堡（bǔ）东门遗址，其上地图展示了大同市东北部的部分长城与军堡。再向西，可看到所谓的灭胡九堡（杀胡、残胡、破胡等）和靖虏五堡（威虏、灭虏、宁虏等），剑拔弩张之势尤重。到今天因带有歧视意思的蔑称，已改胡为虎，改虏为鲁。

摄影/朱子浩

责任编辑/安洋
图片编辑/陈敬哲
版式设计/刘扬

新生的故土

图为天山伊犁草原春景。天山呈东西走向，在中国境内绵延1700公里，面积占新疆全境约三分之一。2000多年前，汉宣帝在位时已将天山南北道纳入大汉王朝的羽翼之下，开始了对西域的实际掌控。从汉时“西域”到清时“新疆”，这片故土在疆域的一次次收缩延扩中，完成新生。

供图/东方IC

新疆
是新的疆土还是故土新归?

撰文／巴晓峰

人们在最初认识一种事物的时候，往往习惯于“顾名思义”，透过名称揣测内涵，于是便有了所谓“望文生义”的误判。对“新疆”这个地名的理解便属此例。

新疆，这个占中国国土面积约六分之一的地方，曾经差点儿就成为“第二个外蒙古”。

1944年11月，在苏俄的暗中支持下，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爆发伊宁事变，成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要把新疆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国。乱局之下，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吴忠信，认为新疆面积太大、民族复杂，又有外国势力插手，很难实现统一管理，于是提出将该地分为天山以北、天山以南和昆仑山以北三个地区分别建省。无独有偶，蒋介石侍从室的高参唐纵，也在递交给蒋的意见书中，提议将新疆分为六个省，分省治理。蒋介石最终采纳了这些意见，并命令赴新疆接替吴忠信的张治中着手调查实施。谁料，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二战后苏联调整了对华政策，希望能和平解决伊宁事变引发的“三区问题”。1946年7月1日，张治中与三区代表达成协议，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分省计划就此搁置。

后来，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一段，说自己一度想把“新疆省”改成“天山省”，原因是“新疆人民认为顾名思义，新疆是中国新开辟的疆土，因而具有强烈的反感”。回想1945年前后的时局，不难发现，张治中其实很清楚，他所说的“新疆人民”，只是部分别有用心的极端分裂分子，这些人以省名为借口，妄图用“东突厥斯坦”取代“新疆”，以达到分裂中国的政治目的。不过，后来发生的事也证实了，新疆的问题，并非简单改个“天山省”的名字就能轻易解决。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新疆在建省之前，中国史书一直将这块土地称为“西域”。“西域”幅员如何？怎么变成了“新疆省”？“西域”与“新疆”可以等同吗？想搞明白这些问题，需要认识一些人，理清一些事。

高原乐土
帕米尔高原林立的雪山，造就了丰沛的冰川融水，也孕育了水草丰茂、农牧皆宜的河谷地带。那里是新疆塔吉克族（见下图）和柯尔克孜族繁衍生息的乐土。
摄影／刘湘晨



“西域”的第一次出现

2100年前，蜀人司马长卿因仰慕蔺相如完璧归赵的凛然正气，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司马相如”。更名后的他，除留下千古名作《子虚赋》《上林赋》及《凤求凰》外，还有一篇《喻巴蜀檄》，檄文中提及“西域”，据著名历史学家田卫疆考证，这是“西域”一词在中国古书中的第一次现身。

檄，是古代官府用来征召或声讨的一种文书。中国人打仗讲究师出有名，战前的舆论宣传一定要做到位，才能凸显己方“正义之师”的形象。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番阳令唐蒙为开通夜郎及僰中的道路，擅自诛杀抗命的少数民族首领，引发巴蜀骚乱。武帝派司马相如前去安抚民

怨，于是就有了这篇堪称完美的政府晓喻文案——《喻巴蜀檄》。

檄文先是宣扬了大汉皇帝的赫赫军功，接着告诉巴蜀人：皇上本可以武力征讨你们，现在之所以没有发兵，是因为体恤百姓。唐蒙做的是不对，但这是他私人的行为，而非皇上的旨意。不过，亲爱的百姓们啊，你们本来已经应征，现在又擅自逃跑，这样做也是不对的，说明咱巴蜀的社会风气还不太淳朴，大伙儿还得接受教育……如此这般，既顾全了皇帝的面子，又指出了官吏的过失，还开导了百姓，一举稳定了西南局势。

《喻巴蜀檄》在宣扬武帝军功时提到了“西域”,原文是这样写的:“陛下即位，存抚天下，集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这个“西域”具体指的是哪儿？司马相如没有说。一百多年后，班固在《汉书·西域传》里给出了答案：“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五十余。”“西域三十六国”的泛称，就此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史。

汉宣帝在位时，天山南北皆被纳入大汉羽翼之下，西域也有了中央政府任命的第一任行政长官——郑吉。此后,随着中原王朝的盛衰更迭，“西域”的地理范畴,一度从“三十六国”扩展到“五十余国”，再西延至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后又收缩回到“西域三十六国”及乌孙、匈奴故地。但不论如何变化,可以肯定的是，自汉以后，今天新疆所在的位置就已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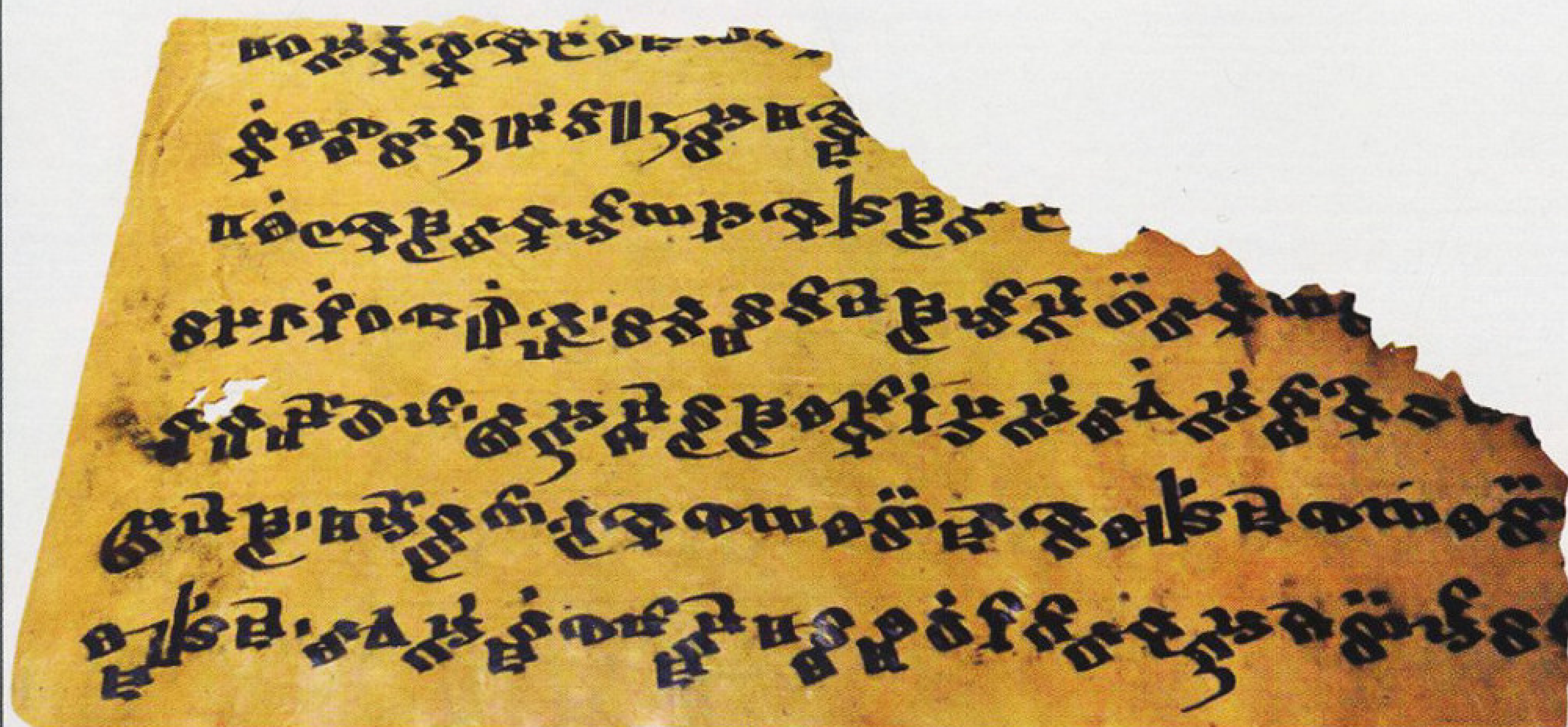
唐时“西域”的东界
帕米尔高原横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新疆西部，在汉唐被称为“葱岭”，据说因多野葱或山崖葱翠而得名。唐朝人所说的“西域”，大体在葱岭以西、波斯以东、印度河以北、铁门关以南，地域较今天的新疆向西大大延伸。图为帕米尔高原上开阔的冲积平原。
摄影／高嵩

云贵川的“新疆”与霍青桐的“新疆”

“新疆”，从字面上看，即“新辟疆土”之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词曾被清政府用于称呼贵州、云南、四川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譬如《清世宗实录》就记载有：

“乌蒙新疆”：雍正八年（1730年）七月，“乌蒙系改土新疆……新经改流，诸事尚未就绪。”“乌蒙”指今云南昭通一带，与川贵相接，是彝族分布区；

“黔东南新疆”:雍正十年（1732年）四月，“新疆辽阔，直通楚、粤，



❶



❷

西域遗珍

唐代设“西域十六都督州府”，名义上将西域一切降服的国家、部落都纳入唐朝官职体系之内。包括波斯、吐火罗、粟特在内的西域诸国，纷纷遣史来唐朝贡，狮子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贡物。这种异兽非中土所产，其形象时常出现在与西域有关的器物上。图1为新疆焉耆县七个星遗址出土的吐火罗文残页。图2、3分别是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的狮纹栽绒地毯和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庭古城出土的石狮。

摄影／刘玉生

兼有内地旧汛，非古州一镇所能统辖。”古州为今贵州榕江，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聚居区；

……

云贵川一带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元明及清前期，中央政府对当地实行土司制。雍正时开始在西南普遍推行“改土归流”，即废除世袭土司（土官），委派有任期的官员（流官）进行管理。

经此一遭，那些新归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区内的土地，就被称为“新疆”。不过，本文想说的“新疆”，在西北。

元朝灭亡后，由于明廷兵力弗及，蒙古察合台后裔王族在西域建立了东察合台汗国，明政府通过羁縻控制，实现对西域的管理。清朝立国之初，即同察合台汗后裔取得联系，哈密、吐鲁番等地臣服清朝，并派使臣前往内地朝贡。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 年），西蒙古准噶尔部贵族噶尔丹率众推翻了东察合台汗国，天山南北就此皆处在准噶尔部统治之下。野心大盛的噶尔丹几次三番肆意挑衅，欲同清政府分庭抗礼。康雍乾三帝多次派兵讨伐，康熙更曾亲率大军于乌兰布通大败噶尔丹，重挫对方的嚣张气焰。不料，噶尔丹之乱尚未完全平息，南疆回部（注：清朝称维吾尔人为回人）大小和卓叛乱又起。

从本质上讲，这两起叛乱都是部落贵族野心膨胀引起的国家分裂。大小和卓是伊斯兰教白山派“圣裔”（指穆罕穆德的子孙）玛罕穆特的两个儿子。噶尔丹侵占新疆时，曾扶持白山派势力，以维护其对南疆的统治。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平定噶尔丹后，朝廷继续让大小和卓管理天山南麓事务，希望借助他们的社会影响来安定统治。没想到，二人竟集众数十万起兵反清，一时间控制了天山南路的大部分地区。

金庸在小说《书剑恩仇录》里，写到了一位行事爽利、武艺超绝的奇女子——霍青桐。黑水河一战，她以少胜多，大胜清军，成为回部英雄。历史上，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城外



❸



的“黑水河”畔，的确发生过一次大战。那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骁勇善战的满洲正黄旗人乌雅·兆惠被任命为定边将军，出征南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兆惠在是年十月初率军进抵叶尔羌河畔。此河又名“喀喇乌苏”，“喀喇”是黑色之意，“乌苏”是水，兆惠驻军之地就叫黑水营。清军因前锋进军太快，后勤给养跟不上。小和卓霍集占探知这一消息后，放出风声说，叶尔羌城南山下有人放牧。兆

粟特人的手卷
粟特是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一个西域古国。粟特人沿丝路到中国经商，留下了许多遗迹遗物。图为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粟特文摩尼教经卷抄本。
摄影/刘玉生



大清粮仓
哈密的巴里坤是古丝绸之路北新道进入新疆的第一重镇，堪称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桥头堡。清康熙年间，朝廷出兵讨伐侵扰哈密的西蒙古准噶尔部，进驻巴尔库尔（今巴里坤）。为满足驻军兵粮所需，在此地屯田耕种。乾隆收复新疆后，于1773年修建总仓容48000京石的常平仓，屯垦储粮。现存粮仓两排八座二十四间，坚固如新。
供图/搜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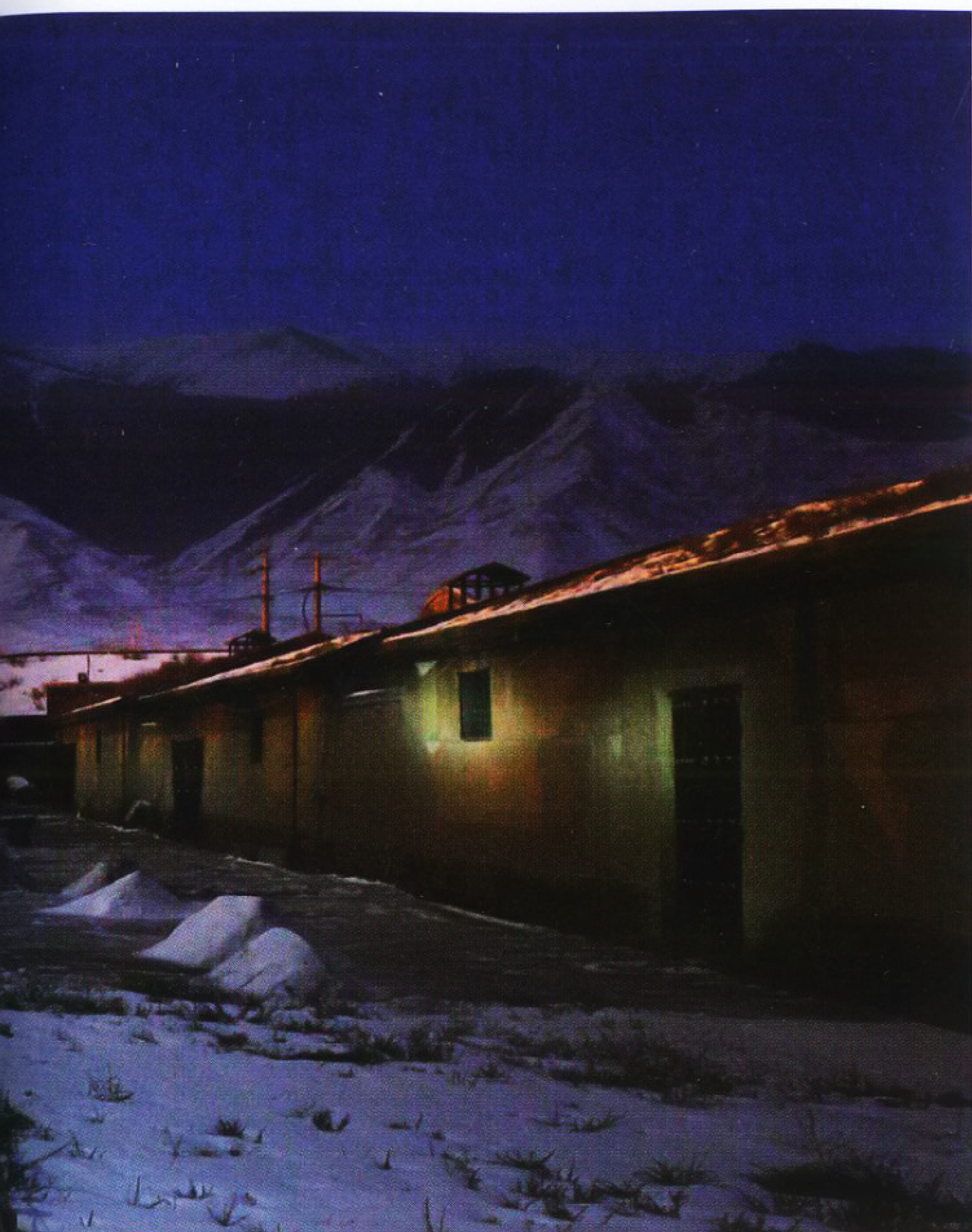
惠闻声，决定渡过叶尔羌河去劫夺羊群。没成想清军刚从河桥上过去四百多人，桥突然就塌了。霍集占趁机伏兵四出，将清军团团围住。兆惠在黑水营被围近三个月，才盼来了援军——定边右副将军富德。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兆惠和富德两军会师，最终取得黑水营之战的胜利，此后又连续攻克叶尔羌、和阗、喀什等地，彻底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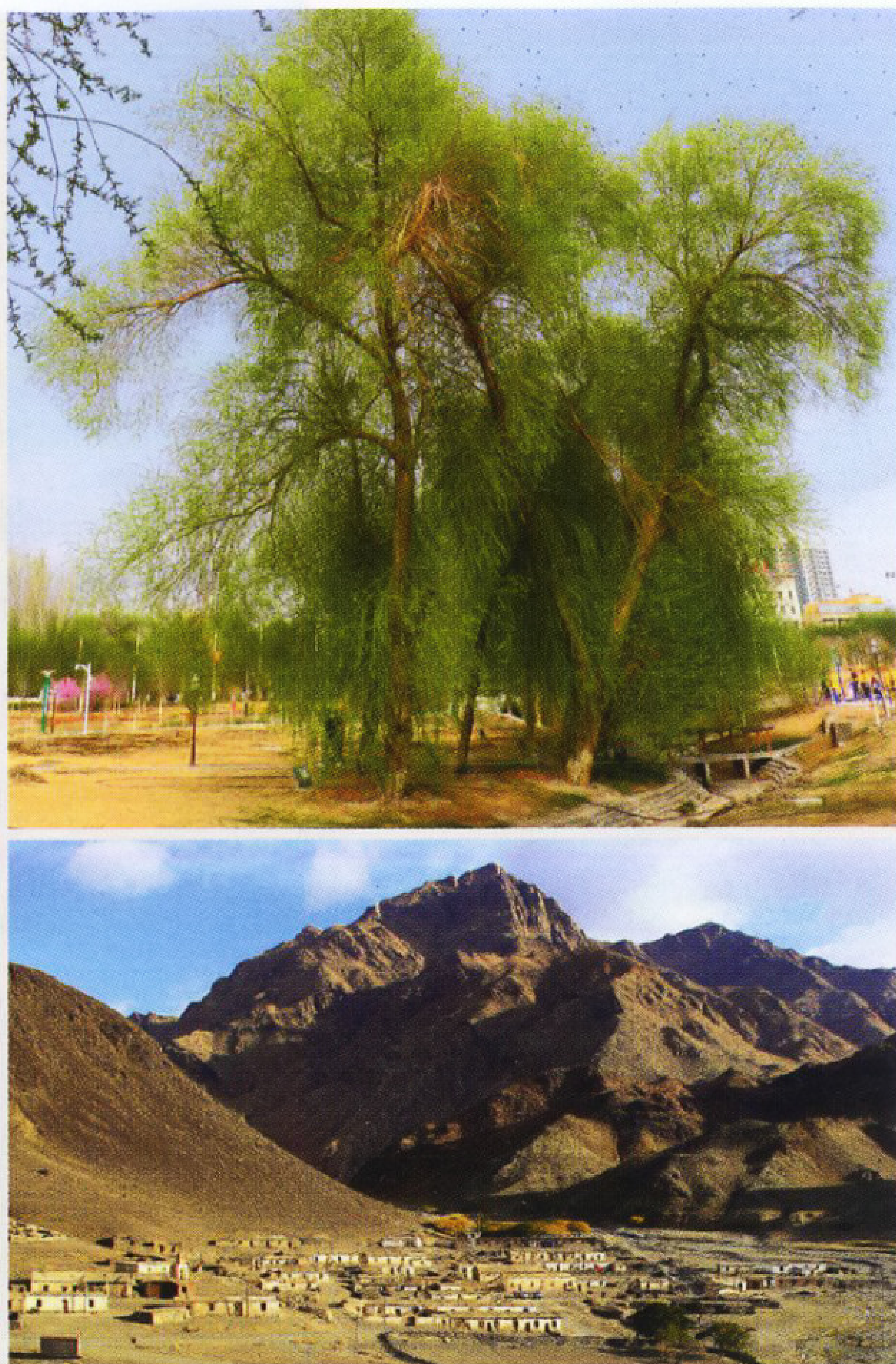
不得不佩服金庸先生的春秋笔法，《书剑恩仇录》需要以霍青桐的大胜来折射民族气节，因此就有了回部"黑水河之战"前三个月的胜利，而之后清军的反攻就这样被他刻意削略掉了。其实，正是从黑水营之战开始，兆惠将军实现了他平乱的目标，乾隆皇帝也完成了毕生引以为傲的一大武功，将天山南北重新归入大清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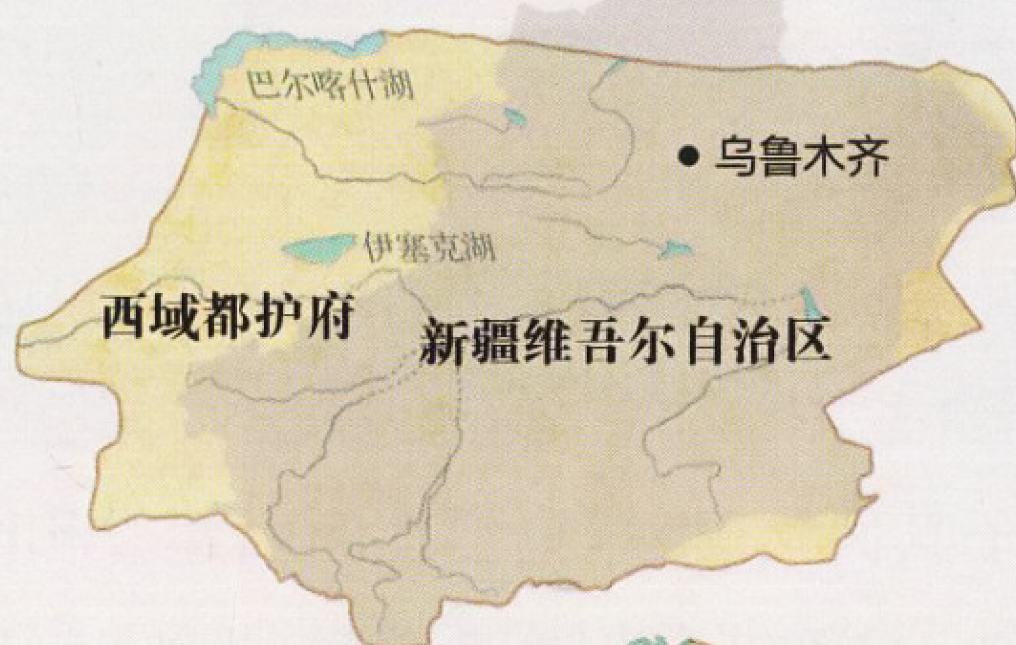
春风得意的乾隆，言语间不时出现"新疆"一词。《清高宗实录》记载："然现在新疆垦种……西陲勘定，回部悉平，朕之初念岂务为好大喜功，今亦不过辑其旧部，复其本业而已。"又云："新疆效用武职人数……遇有辟展（今新疆鄯善）等处差务，陆续委用。"可见，乾隆所说的"新疆"，本意与雍正是相似的。只不过和他爹比起来，乾隆就只有这一块"新辟疆土"，加上他好大喜功、务求十全十美的性子，朝廷内外着意宣扬，"新疆"就变成了帝王功劳簿上浓墨重彩的一页，并在后来渐渐成为指代明确的专有地名。

龚自珍和左宗棠的夙愿

需要说明的是，从"西域"到"新疆"，中间有过一段过渡。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政府设伊犁将军时，今额尔齐斯河、斋桑湖以南到帕米尔、包括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仍延循旧例称"西域"。不管是乾隆官修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还是道光年间的《西域水道记》，抑或晚清学者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朱逢甲的《西







春风不度玉门关？

晚清重臣左宗棠自1866年任甘陕总督，后又督办新疆军务。为运输军备和繁荣经济，他下令从陕西潼关，经甘肃陇东、陇中、河西走廊，到新疆哈密、天山一线，修建3000多里长的甘新驿运大道，并令筑路军队沿途栽植杨柳，严加管护，为清廷在西北的统治树立了永久的纪念碑。后人为弘扬左公栽榆插柳的美德，称这些柳树为“左公柳”。左图分别为新疆哈密市西河坝文化健身广场里的左公柳和哈密市柳树沟乡的快乐克村。供图／东方IC

域设行省议》，官私文书均称这一地区为“西域”或“西域新疆”。朝野动议在“西域”设置“行省”，是清后期西北形势急剧变化的结果，最早提出这一建议的，就是龚自珍。

龚自珍祖父龚鉴（1694-1739年）早在雍正年间就曾主张屯田西北，龚自珍又师从刘逢禄研习春秋公羊学，探寻经世致用的微言大义，这其中就隐含着“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认同。而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清王朝从边疆一统的盛世，转向万马齐喑的“衰世”之际。多方因素汇集下，怀有经世抱负的龚自珍，对干戈迭起的西北边疆一直十分留意。“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漫感》一诗吐露出他“绝域从军”的无望，他只好寄情于边疆史地研究，尤其着意于西北边疆问题。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秋，大和卓波罗尼都的后人张格尔，借浩罕兵入侵南疆，负责管理新疆的将军、大臣对回部多有欺压，导致不少回部民众协从叛乱，使刚刚绥靖的新

汉宣帝·西域

唐高宗·西域



清嘉庆·西域



“西域”是哪里？

“西域”所指代的地域范围，在中国历史上几经变化。西汉时，由中央王朝设立的西域都护府，直接管辖昆仑山以北、天山南北、帕米尔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到了唐代，“西域”西延至帕米尔高原（葱岭）以西地区，当时瓜州以西、葱岭以东不再是中原王朝的邻邦和民族政权的集合体，而是李唐王朝的一部分。后来，元朝人对“西域”的理解与此基本一致。明朝没有足够的能力经略西北，清代“西域”又收缩到汉代的大致范畴。这个地名所指代的范围大小，与中央王朝的国力、影响力密切相关。

参考资料：曾海霞《历史时期中原与西域的界标及其意象变迁研究》

龚自珍反对放弃新疆
对清廷“羁縻”管控新疆的安边方略也不满意
他第一个提出要在西域建省
在新疆建立和内地一样的行政管理体系

疆再起烽火。龚自珍此时正任内阁中书一职，为谋求新疆的长治久安，他写就《西域置行省议》一篇，提出要在西域建省，即使新疆悬远难守，也不宜放弃。

龚自珍是第一个提出要在西域建省的人。因清代习惯将天山以北称“准疆”，将天山以南称“回疆”，故龚自珍提议要建“准回省”。他反对放弃新疆，对朝廷“羁縻”管控新疆的安边方略也不满意，主张在乾隆平乱基础上进一步“疆其土，子其民”，相信只要在新疆建立和内地一样的行政管理体系，建省、移民实边、屯田、发展教育，就能把新疆变得和内地一样稳定且具有内聚力。只可惜，这一提案在当时并未激起多少浪花。

龚自珍之后，咸同年间，西域形势越来越不乐观。同治三年（1864年），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入侵我新疆，并于同治六年（1867年）悍然成立伪政权“哲德沙尔汗国”。与此同时，沙俄也开始插手新疆事务，侵占伊犁九城，“设官置戍，开路通商，晓示伊犁永归俄辖”。如此，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疆域，正面临着从大清版图上消失的危险。

《同治朝筹办洋务始末》记载，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重海防而轻塞防，提议放弃新疆，甚至认为乾隆年间勘定新疆是错误之举：“倾全国之力，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危，已为不值……况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

对此，湘军出身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坚决反对，他忧心忡忡地写下一纸奏书，力陈新疆之重：

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权衡之下，慈禧最终于光绪元年（1875年）六月，任命64岁高龄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左宗棠率六万征西大军开赴新疆，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

起初，沙俄诡称占领伊犁是替清政府“代为收复，权宜驻守”，没想到清军果真收复了新疆各地。左宗棠就以沙俄有诺在先为由，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伊犁问题。然而，俄国不但拒不交还伊犁，还陈兵耀武，以示威胁。赴俄谈判的大臣崇厚，竟在对方的恫吓下签订条约，答应割让霍尔

责任编辑／郭婷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刘扬



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并向俄方偿付兵费500万卢布。

消息传来，朝野哗然。左宗棠呕血上书，请求再战新疆。清廷命其统筹西北军务，做好军事上收复伊犁的准备。1880年5月，在从肃州出发前往哈密的途中，左宗棠抬棺上阵，向全军昭示决心："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俄军此前在俄土战争中大伤元气，慑于左氏兵威，担心战争一旦开打捞不到便宜，于是双方再次谈判。一年后终将伊犁归还中国，把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一再上书，向朝廷提出新疆建省的议案。先是光绪三年（1877年）六月，再是四年（1878年）十月、八年（1882年）九月……他在奏折里明确主张将所建之省命名为"新疆省"，因为"新疆地段较远，他族逼处，故土新归，治内治外，事同草创，非规模早定，废坠无自而兴"。

战争、谈判、朝野纷争，令左宗棠的提议被一拖再拖。清廷最终达成一项折中方案——新疆建省，但巡抚由甘肃巡抚兼任。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跟随左宗棠出征新疆的刘锦棠被任命为"甘肃新疆巡抚"，驻节乌鲁木齐，新疆省正式宣告成立。自此，清政府可以更好地在这块土地上行使国家主权，安抚归拢百姓，以完整的行政体制确保领土不失。

这是嘉道以来仁人志士的梦想，是从龚自珍到左宗棠的夙愿。故土新归，终成现实。

融合的缩影

新疆塔什库尔干曾经是古代东西方交流的必经之地，被认为是古丝绸之路东段的终点和西段的起点。古希腊文化、古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里交汇，形成了该地区独特的人文风貌。图中，塔什库尔干妇女将民族服饰与现代流行结合的着装习惯，即是这种文化融合在当下的缩影。

摄影 / 张新民

那个叫康定的地方

撰文／郭晔旻

一首《康定情歌》，让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康定为世人所熟知。然而，地处川藏之间的康定，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而不是一个儿女情长的浪漫之地。

最优秀的人来自康?

提到康定，人们很自然会联想到“健康安定”的美好祝福，但实际上，康定的“康”源自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康区，在藏语中是边地的意思。藏人习惯于将广大藏区划分为卫藏、安多、康区三部分，清代的《安多政教史》就有“卫藏法区、安多马区、康人区”的描述，藏谚则将这一描述生动概括为：“最好的宗教来自卫藏，最好的马来自安多，最优秀的人来自康。”

地处康区东部边缘的康定，属高山峡谷地形，悬崖峭壁、深谷幽幽。城区的东北部是郭达山，东南为跑马山，城西绵延着子耳坡山，属折多山余脉。折多河发源于折多山，自西南穿城而过，在城东郭达山麓与雅拉河汇合，折向东南，最终流入大渡河。简而言之，康定处在一个三山环抱、二水汇流之地。正因如此，古代藏族先民才将这里称为打折多，也就是打河（雅拉河）和折河（折多河）汇合处之意。

早先的打折多只是一块默默无闻的草场，每逢夏季，藏民便在这水草丰美的地方放牧。宋朝以前几乎无人居住，真正令其进入历史视野的是川藏间的茶马互市。康藏高原海拔高，气压低，气候干燥，当地居民“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藏区不产茶，因而全赖川茶供应，所以早在唐宋时期，川藏之间的茶马互市就开始了。主要的茶马贸易线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邛崃等茶叶产地为起点，经康定，往康区、西藏和青海等地，称“南路边茶”，而打折多就是南路边茶进藏的第一站。来往的商人和马帮在此搭帐休息，至元明始有少数人定居下来。

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打折多作为贸易线上重要的中转站，各行各业皆因茶而兴。逐渐兴旺起来的打折多，开始被朝廷关注，元廷在这里设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土司。到了明代初期，汉文文献中开始出现“打煎炉”的名称，《明实录》中即有记载，“故元四川分省左丞瓦喇蒙遣理问高惟善等，自西番打煎炉、长河西来朝，上故元所授银印”——高惟善代表前朝四川省左丞瓦喇蒙，从打煎炉、长河西出发，向新皇帝贡上了元廷所授的银官印，数年后高惟善给朝廷的报告也曾提到“打煎炉原易马处”。这里的“打煎炉”，

名词解释·土司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于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其形式是册封各族首领以世袭的官职，让他们统治本族民众。按等级可将土司官职分为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武职和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文职。



这张三维地图上勾勒出的线路，为茶马古道川藏线与滇藏线。其中川藏线南道开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它东起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芒康、昌都，最终抵达拉萨。清代的驻藏大臣及官兵入藏一般都沿此道，所以又称“川藏官道”。川藏线北道由康定，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习惯上被称为“川藏商道”，是今317国道的组成部分。两道汇合于昌都，后又分作两路，至拉萨汇合。可见康定为古代由蜀入藏的必经之地，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
从图中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两条东西走向的路线，被褶皱紧密的横断山脉重重阻隔。无论是古代还是今日，入藏的道路都是迂回而艰难的。
制图／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就是对藏语地名打折多的对音转写。

那么，“打煎炉”是什么时候变成“打箭炉”的呢？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刑部奏疏中有“打箭炉地方”的记载，说明至迟到康熙十九年已改“煎”为“箭”。虽然《明史》里已经有打箭炉的记载，但这部二十四史中的收官之作，要到乾隆四年（1739年）张廷玉最后定稿，进呈刊刻才算完成。因此，明代是否已经出现了“打箭炉”这个地名，着实是要打个问号的。

“箭”从何处来

“打箭炉”与“打煎炉”，虽一字之差，但却有本质的不同。“打煎炉”为打折多的对音转写，那么“打箭炉”呢？

清光绪《打箭厅志》记载，此地“相传汉武侯南征遣将郭达，安炉造箭之地”。这就是说，打箭炉的起源被认为与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有关，孔明“五月渡泸”南征孟获时，曾派遣部将郭达在此安炉造箭。

当然，这一说法与史实相悖，诸葛亮出兵路线，乃是取道宜宾渡大渡河南下，不可能会选择这样一个既不在行军线上，又不是南征后方的荒野空谷安炉打箭。但是传来传去，最后却连康熙皇帝都相信了这一说法，他在《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里写道：“打箭炉未详所始，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故名。元设长河西宣慰等司，明因之。凡藏番入贡及市茶

自康熙年间以来

作为康藏高原的东门户与川藏交通联系的主要枢纽
打箭炉很快成为汉藏杂处、百货完备的小都会
集康区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文化中心于一地



郭达将军的箭
跑马山下，郭达将军的塑像弯弓向天。在汉人“郭达造箭”之说出现后，康巴藏人继续发扬了这一神话，进一步将郭达塑造为当地铸铁工艺的始祖，认为是郭达教会了当地百姓使用铁制农具及其他先进的农耕技术。
摄影／姜曦

者，皆取道焉。”既然九五之尊御笔认同了诸葛亮“安炉打箭”的说法，此后清代的《雅州府志》《打箭炉志略》以及《打箭厅志》也就相沿成习，越传越盛了。

在当地的康巴藏民口中，还流传着打箭炉来由的另一传说：三国之前，成都是藏人居住地。诸葛亮来到成都，与藏王商议借“一箭之地”，藏王思忖一箭射及之地并无多少，便一口答应下来。谁料诸葛亮却密遣部将郭达连夜将箭带到百里之外的地方。到了射箭之日，这边一箭射出去，事先安排好的人就在林中拾箭毁掉。诚实的藏王带着藏民一路寻找，到了今天的雅安仍寻不到这支箭，只好拖着牦牛尾巴翻越二郎山，最后到了打箭炉，才在东郊山顶将箭寻获，于是汉藏双方，遂以打箭炉分界。后来藏王得知上当，遂出兵追杀郭达。郭达无路可走，逃上东郊山，藏王下令放火烧山，郭死于火中，当地人便称这座山为郭达山，而那支箭至今仍插在山上……这个传说看似与“郭达造箭”说不同，但从“诸葛亮”“郭达”“箭”等元素看，却又与前者相互交织在一起。

自康熙年间以来，作为康藏高原的东门户与川藏交通联系的主要枢纽，打箭炉很快成为汉藏杂处、百货





茶马古道上的背夫
康定城东有一组栩栩如生的茶马古道雕塑群。旧时人们就是这样，沿着折多河河谷地带，进入藏区（上右 摄影／邱邦俊）。供应康定的茶叶均生长于140英里外的雅州府（治所在今雅安市），这些茶叶由人力背往康定，大概需要20天左右，之后再用牦牛或骡马运往西藏。上左照片中的背夫，随身携带一根T形拐杖，当地人称作“打杵子”，休息时可以顶在茶包下（供图／FOTOE）。

完备的小都会，集康区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文化中心于一地。雍正七年（1729年）设打箭炉厅（此为中央设置的地方行政单位，长官为同知），次年清廷在此修筑城墙，人们开始简称打箭炉为“炉城”。与打箭炉名字经历了由藏语地名谐音、雅化，进而典故化的过程一样，打箭炉城内的一些小地名，也带上了多元杂糅的色彩。“公主桥”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传说这座桥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唐代的文成公主入藏，而历史上的文成公主进藏是取道青藏路，并未路过此地。

实际上，“公主桥”倒是应该从藏语音译为“贡曲桥”，它是一座坐落在“贡曲岗”下，横跨“贡曲河”，连接打箭炉城区和南郊的石拱桥。在清代的早期史籍里，这座桥还被音译为“贡诸桥”或是“工竹桥”。只是到了晚近时期，“贡诸桥”才变成了与汉语发音近似的“公主桥”，又附会出文成公主入藏的美丽传说。

康区终于安定

从“打折多”到“打煎炉”再到“打箭炉”，地名的演变轨迹十分清晰。相比之下，从“打箭炉”演变为现今的“康定”，就显得有些突兀了，这与晚清时期康藏地区疾风骤雨般的政局不无关系。

清代的康区，名义上归于四川省辖下，实际上既不同于四川的行省制，也不同于西藏的政教合一

小知识

地名的雅化与俗化

地名雅化是人们为提高地名的文化含量和审美价值，采取近音、谐音，或引据典故、诗词的方式，选用美词来为已有地名重新命名的现象。地名有雅化，却也有俗化。如果说地名雅化是地名演变中的主流现象，代表着精英阶层的文化品位。那么地名的俗化则是平民文化的“反套路”。据民国《京师坊巷志》记载，北京的分司厅胡同俗名“粉子亭胡同”，大沟巷俗称“打狗巷”，演乐胡同俗名“眼药胡同”，翔凤胡同或作“墙缝胡同”。这些都是普通民众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对地名的重新理解、记忆与演绎。

制，而是众多土司统治之下的土司制。清代在康区设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使等官职，共计有一百多名土司。多数土司是清王朝屡次平叛或用兵藏区过程中逐步建立的，彼此之间没有统属关系，西藏地方无权管辖，相对四川当局也有很大的独立性。

由于边地各土司所属之土地、人民政事均归各土司直接管辖，根本不容清廷设在打箭炉的同知——地区长官置喙，川边地区逐渐处在统而不治的状态。有清一代，朝廷也常为康区土司叛乱所困，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瞻对（今新龙县）土司，清政府就前后大规模用兵多达八次。到了晚清时期，川边地区又爆发了震惊朝野的巴塘事件。巴塘民众因对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的筹边措施（开垦康人心目中的“神山”）不满而发起骚乱，先后袭杀了凤全及其随从五十多人，并杀害法国传教士二人，杀害及殴伤教民多人，烧毁巴塘、盐井、亚海贡三处天主教堂。

堂堂大清朝廷命官竟被地方势力肆意杀害，这在藏区史无前例。局势本已相当紧张，又牵涉到洋人的性命，遂给了他国介入的口实。就连本来与此事无甚关系的英国驻华公使，也照会清廷，要求“竭力襄助，以免滋蔓”。鉴于英军刚于1903-1904年入侵西藏，英国人外交辞令中的“该处距缅界不甚遥远”一句，引起清廷的高度警惕。于是，当时还是四川省内一位三品道员的赵尔丰，受命出征平叛。他在打箭炉储足三个月的军粮后，即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由打箭炉出关向巴塘进军，从此开始了他经营川边七年的戎马生涯。

赵尔丰为了这趟战事，专门募集了五营新军，称“边军”。边军兵员都是蜀中各地丁壮，又装备了“九子洋枪”，战斗力很强，平叛战事因而呈摧枯拉朽之势。不出一月，即攻克巴塘，半年之内便“歼灭巨寇，底定全边”。清廷趁势提出对整个康区实行改土归流，仿宁夏、青海之例，设置川滇边务大臣。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清廷正式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位同封疆大吏。这位川滇边务大臣于次年七月上《巴里塘改土归流请设道府州县折》，全面废除土司制度，宣布“无论汉人、蛮人，皆为大皇上百姓”，重绘了康区政治地图。其中，原本就在清廷掌控下的打箭炉厅，升格“康定府”，除原打箭炉厅地之外，又兼辖一厅（理化厅）两县（稻成县、河口县）。康定之名，由此而始，沿用至今。“康”即指康区，“定”者意为该区平定、安定。新地名和众多边疆地名一样，带有浓厚的开疆拓土、祈求安宁的含义。至此，藏语地名打折多完成了它的雅化与汉化历程。

今天的康定，作为川藏南线的必经地，吸引着八方游客慕名而来。跑马山下，郭达将军的雕像弯弓向天，在他身后，美丽的雅拉河和折多河在此汇流，相拥东去，仍旧低喃着这座小城的古老名字。

二水汇流地

穿城而过的折多河与雅拉河在郭达山麓汇聚，再向东奔流汇入大渡河。康定老城区沿河呈带状分布，夜幕降临，灯光将湍急的折多河映衬得宛如飘动的光带。

摄影/姜曦

责任编辑/张舒羽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刘扬


路安樂寶

被进口的地名

撰文／阿笛

近代中国的老上海，曾拥有许多洋范儿十足的名字。它们是西潮冲击的产儿，是带有殖民色彩的烙印。它们从何而来，又为何几乎一夜间消失殆尽？

“霞飞路”是中国风？

今人印象中的老上海风情，大概也包括一些耳熟能详的路名。比如繁华的淮海中路，过去叫霞飞路。霞飞，是取自“落霞与孤鹜齐飞”吗？

错。这个“霞飞”，是一战初期的法军总指挥，一位喜欢留着两撇八字胡的法国将军。霞飞路之前还有个名字，叫做宝昌路，听着似乎是中国人喜欢用的吉祥字眼。不过，还是错。“宝昌”，同样是一位法国人的名字，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位重要人物，曾连任多届董事、总董。

所以，看似中国风十足的地名，骨子里流淌的，却是西洋的血脉。而翻开老上海的地图，这样的地名俯拾即是，尤其是在租界及其周边的区域，什么戈登路、窦乐安路、哈同路、赫德路……其背后是斑驳的岁月，沉重的历史。

是中国名，还是洋人路？

其实，在给上海租界命名时，英国人曾想入乡随俗，以中国名冠名中国路。1865年，英美租界（即公共租界）当局正式出台了一个道路命名的新规定——在原英租界内，南北向道路以中国各省之名来命名，东西向道路以中国主要城市之名来命名。

英美人如此“尊重”中国的主权，其实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因为英美租界是一个英美为主、多国参与的租界，所以在为界内道路命名时，若仅以哪一个国家的人名或地名来命名，都容易引起纠纷。

据记载，为了公平起见，工部局几经讨论和权衡后，才提出了这个折中方案——以中国各省市地名命名。

至此，原本有些混乱和随意的命名方式有了统一的原则和规范。一些道路纷纷应新规改名，如南北向道路中，界路更名河南路，石路更名福建路，东西向道路中，花园弄改名南京路，领事馆路改名北京路等。

不过看似尊重中国主权的新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殖民者的优越感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此后英美租界当局新建的租界道路和越界道路，尽管也有以中国各省

洋进士获得“冠名权”

近代教育家叶圣陶与小报童对话的雕塑旁，有一块“窦乐安路”的路牌，这是上海文化街多伦路原来的路名。英国传教士窦乐安，曾为中国兴办大学，并主持出版了许多西方教科书，被光绪皇帝授予“进士”称号。为表彰其功，公共租界遂把这条1912年修筑的租界越界道路，命名为“窦乐安路”。

摄影／陶钧

市名命名的，但更多的，还是以英美人名来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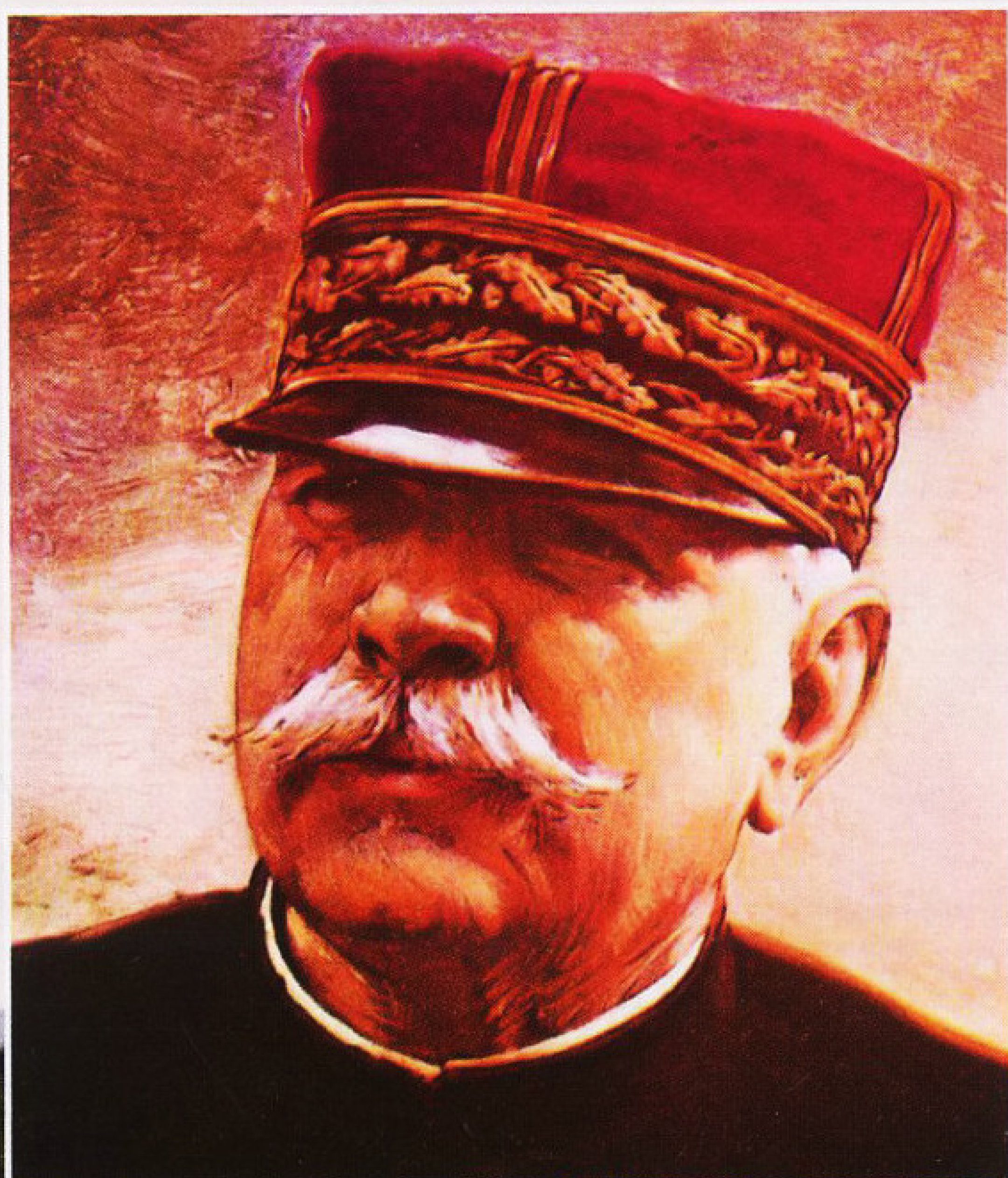
在诸多以外国人名命名的道路中，最高调的可能要算“赫德路”了。在近代中国，上海、北京、香港等地都有以“赫德”为名的道路。著名近代史专家陈旭麓先生曾说：“研究中国近代史，当读懂三个人，一个满人、一个汉人、一个洋人，即慈禧、李鸿章和赫德。”在罗伯特·赫德（1835-1911）76年的生命中，有50多年生活在中国，其中近半个世纪（1863-1911年）都在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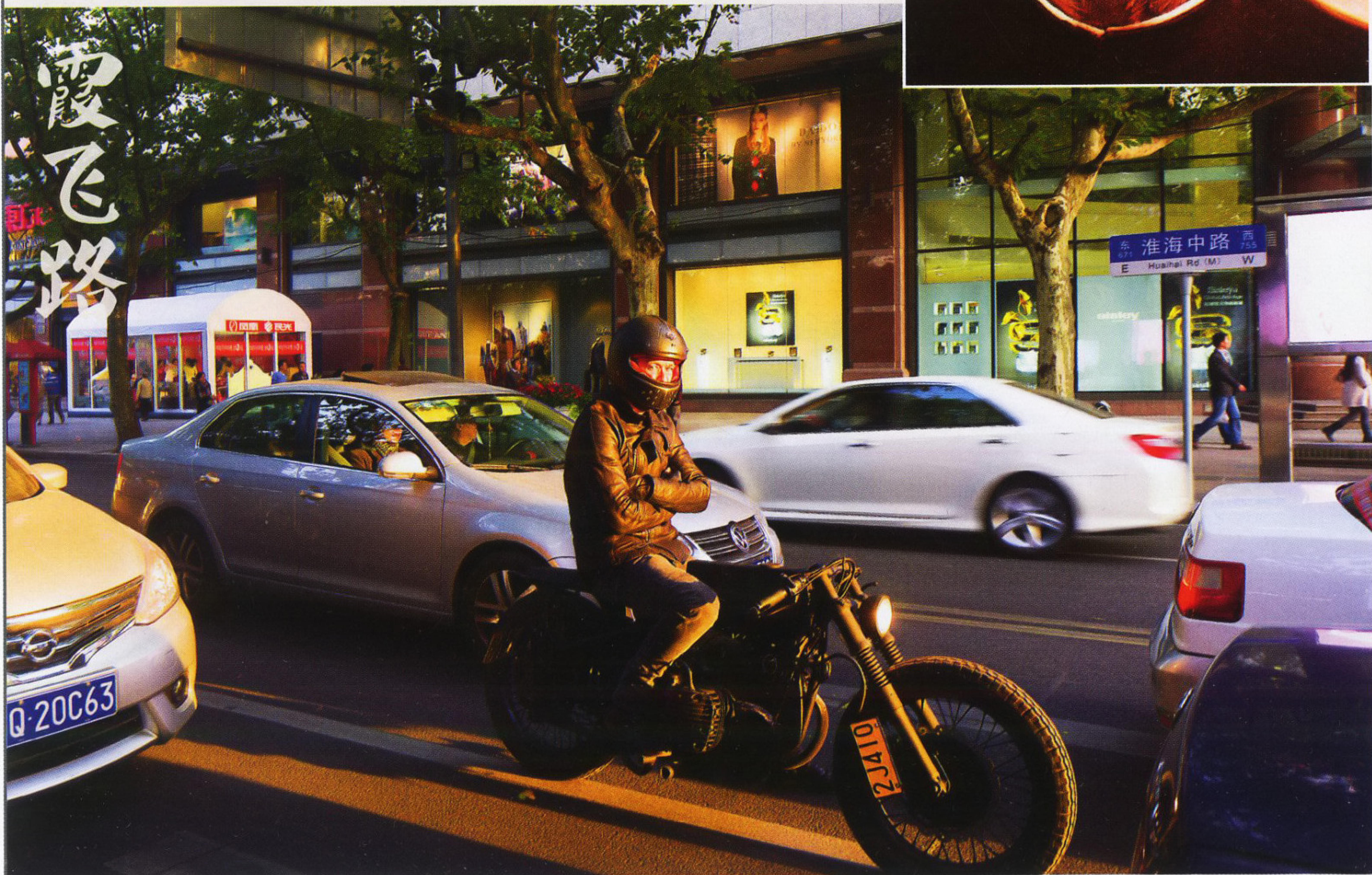
上海的赫德路（今常德路），位于今天的静安区，始筑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全长2800多米。20世纪初为了纪念赫德而改名。上海乃赫德一飞冲天之地。1861年起，他开始作为李泰国（1833-1898）的代理，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职务，短短两年之后即成功“转正”。他把先进技术和现代规章制度引进海关，让当时的海关一跃成为帝国的明星机构。总税务司署上海办事处曾位于今上海新闸路、常德路一带，因此常德路曾被选作上海纪念赫德的道路。

北京的赫德路，在今天的台基

向霞飞将军“致敬”

下图是上海的淮海中路，过去曾是法租界中的霞飞路（摄影／陶钧）。作为老上海时尚之路的霞飞路，是以一战初期法军总指挥约瑟夫·霞飞将军命名的。右图即霞飞将军之像（供图／FOTOE）。由他领导的第一次马恩河战役，成功打退德军进攻，消除了对巴黎的威胁。







赫德路





厂头条，与台基厂大街垂直相交。1865年，随着海关总税务司署迁到北京，赫德又在帝都生活了40余年。除了海关事业外，这位西洋客卿还积极参与中国的内政、外交，甚至海军建设，活跃在晚清的自强运动中。可以说，在中国痛苦而曲折的近代化过程中，赫德是有贡献的。当然，在中英有冲突时，他又往往以牺牲中国利益来维护英国的利益。

像赫德一样，凭借在中国的影响力而获得“冠名权”的英美人大有人在。比如上海的戈登路（今江宁路）、哈同路（今铜仁路）、威妥玛路（今怀德路），他们分别是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军的戈登、在上海叱咤风云的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哈同、发明用罗马字母标注汉语发音系统的“威妥玛注音”的威妥玛。

不过相对来讲，英美租界毕竟还有以中国各省市命名的路名。而法国人则“自我”得多，法租界所修的道路，几乎清一色采用本国人名。据学者薛理勇在《上海路名地名拾趣》一书中研究，这源于法国人的一次“闹独立”。

1860年，当太平军向上海逼近时，英、法、美租界提出合并以对付太平军的建议。不过到了1863年，法租界却不跟英美人玩了，自立门户成立了“公董局”。法租界既然是法国人自己的地盘，自然不用考虑其他国家的感受，可以放手采用法国色彩的地名了。比

上海、北京都有“赫德路”

图1是英国人罗伯特·赫德（供图/FOTOE），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半个世纪（1863-1911年），可谓是影响近代中国最大的外国人之一，因此中国境内曾有多条以“赫德”命名的道路。图2为上海常德路（摄影/陶钧），图3为北京台基厂头条（摄影/宋普），都曾以“赫德路”为名。

如喇格纳路（今崇德路）的喇格纳，是1843年的法国特使，1844年与清政府签订中法《黄埔条约》；赵主教路（今五原路）中的赵主教，是近代开禁以后的第一任主教，曾把教区房产赠给法国政府作领事馆，对法租界的发展颇有贡献；雷米路（今永康路）的雷米，是最早来上海的法国商人，曾用资金和房产资助法租界的建设……这样以法国在华名人命名的路名，多不胜举。

西方伟人的崇拜

带有外国人名字的上海租界路名，成为十里洋场的一道特有“景观”。总的来说，各国驻华公使、驻沪领事，租界工部局、公董局董事或总董，来华的商人、传教士，在中国表现突出的其他政治、军事人物等，这些为本国在华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往往能获得上海道路的命名权。对于这些西方人来说，能命名上海的一条马路当然是一种荣誉。这无疑将激励更多的洋人前仆后继，为本国的在华事业多做贡献。

也有与中国没有多大关系的人物，获得了此项“殊荣”，比如前文提到的霞飞路。

1915年6月21日，法租界所修的宝昌路改名霞飞路。这时候，法国的约瑟夫·霞飞将军，正在万里之外的欧洲与德国人作战。就在前一年，由他领导的第一次马恩河战役成功打退德军进攻，消除了对巴黎的威胁。于是这位外号“迟钝将军”的领袖，成为拯救时局的大英雄。遥远东方上海的一条马路，

“幸存”的洋地名

上世纪40年代，上海的大部分洋地名都改为“国姓”，但依旧有少数几个洋地名“幸存”下来。下图是静安区的海防路，以越南海防市命名；右页图是金桥的长岛路，美国、日本、韩国均有“长岛”，此路应以其中一个命名。

摄影/陶钧



也改以他的名字命名。1922年，霞飞将军曾来访上海。据说当他得知有条马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时，高兴不已，亲手种下一棵“和平树”。

这种大搞西方名人崇拜的路名还有许多。比如福煦路（今延安中路、金陵西路）、贝当路（今衡山路）的福煦、贝当与霞飞一样，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将领。再如上海的林肯路（今天山路），就是以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著名总统为名。



最露骨的大概要属“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是工部局1912年填筑柴长浜后所修的新路。这已经不是欧美人名这么简单，它的英文名，叫做Great Western Road，即“伟大的西方”之意，可谓是西方优越感的一次赤裸裸的展示。

上海，还是印度？

能够命名道路的，除了“人”，还有“地”，比如上海著名的杨树浦。

如果身处20世纪初的上海杨树浦地区，大概会有一种身在南亚的错觉。这里的马路，大量以印度等国的地名命名，比如孟买路、加尔各答路、马德拉斯路、浦那路……

这是英国人的“手笔”。

1899年，英美租界成功实现了史上最大规模几乎也是最后一次的扩张。其中向东扩张的方向，从虹口港越过杨树浦直达周家嘴。于是租界当局大规模规划和建设了杨树浦地区的道路体系，从1899年至1915年间多达几十条。

这么多新道路要如何命名？答案就是后来人们看到的样子——大量南亚地名闪亮登场。有人说，这是出于对日不落帝国庞大殖民体系的炫耀，也有人说，这仅仅是因为工程师曾在印度、南洋一带生活过。

其实地名并不限于南亚，也有中亚阿富汗的地名，比如卡勃尔路（今凉州路），即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命名；也有东亚朝鲜半岛的地名，比如齐物浦路（今江浦路），齐物浦即是今天韩国仁川的旧名；另外还有些泰国、印尼等地的地名。杨树浦一带，开始弥漫着浓郁的殖民气息。

不过这种局面并未维持太久，1915年后，杨树浦地区的道路陆续改以中国地名命名，比如康朴尔路改名桂阳路、勒克诺尔路改名宁武路。当然，这并非列强的“良心发现”，而仅仅是因为工部局意识到，中国人对这些地名感到十分陌

1943年，上海进行了全市大规模的改名运动
所有洋地名
几乎清一色改为中国地名。而这样一次张扬主权的改名行动
竟来自投靠了日本人的汪伪政权

生，使用起来很不习惯而已。

真正带有主权意味的改名运动，要待到1943年。

汪伪政权为路名争主权?

1943年，上海进行了全市大规模的改名运动。所有洋地名，几乎清一色改为中国地名。而这样一次张扬主权的改名行动，竟来自投靠了日本人的汪伪政权。

日本人是冲着英美人等而来的。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就占领了上海的华界。不过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和英美的对抗才完全公开化。于是在日本操纵下，汪伪上海市政府宣布“接收”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收回”租界后，为了彻底清除英美残余势力的影响，汪伪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大规模更改原租界地名。以欧美人名命名的路名全改了，比如赫德路改为常德路，霞飞路改为泰山路，爱多亚（即爱德华七世、英国国王）路改为大上海路……除了日本外，以其他国家地名命名的道路也几乎全部更名，如哥伦比亚路改成番禺路，百老汇路改成大名路等等。还有那条露骨的大西路，也被改为长安路。

总之，全上海马路似乎祛除了“洋味儿”，变成光明正大的中国地名。

有趣的是，日本人这一“良苦用心”，反倒实现了近80年前英美租界当局的命名原则——以中国各省市地名命名上海道路。两年后，随着抗战的胜利，国民党重新执政。但新的上海市政府并未“因人废言”，而是保留了绝大多数汪伪政权更改的路名。于是这一命名原则从此被固定下来，塑造着上海地名



的重要特色，直至今天。

国际范儿卷土重来?

曾经洋味儿十足的租界地名，统统恢复“国姓”。无论当年实施此政策之初心如何，结果却是符合民意的。不过上海曾经多如牛毛的洋地名，就真的全部消失了吗？当然不是。比如以越南海防市命名的



静安区海防路，路名至今未变。还有金桥的长岛路，不知是来自美国的长岛，日本的长岛，还是韩国的长岛，总之，都是“外姓”。不过这残留的一丝“洋味儿”，却不再挟裹着西方压迫性的威势和影响，而是在历经了时代的跌宕变幻后，默然见证，无关宠辱。

但是，旧的洋名去了，新洋名却闪亮登场。比如在外高桥保税区内，就有一批洋味十足的地名：意威路、美盛路、加太路、日京路、泰谷路、巴圣路等，虽不是直接来自外国地名，却容易让人联想到意大利威尼斯、美国华盛顿、加拿大渥太华、日本东京、泰国曼谷、巴西圣保罗等。这当然不是巧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成立。所谓保税区，就是要集进出口加工、国际贸易等功能于一体，可谓是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经济区域之一。正是为了展示这个地方的开放度与国际化，外高桥的一部分道路才采用了这种组合式的地名，即由一个国家与该国的一个著名城市组合而成。不过这类由中国人主动命名的洋地名，不再受到哪几个强势国家的影响，而是涉及到欧洲、北美、拉美、亚洲、大洋洲等地的重要国家，显得更加公平和包容。

这样的洋风地名，不再带有屈辱的殖民烙印，反倒是一种信心和气度的展现了。

外高桥的新洋名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有一批特别的“洋地名”，以某一国加该国某一城市的组合来命名，以彰显这里的国际化与开放度。左页图的法赛路，是法国+马赛；上图中的希雅路，是希腊+雅典；而日樱北路，是日本+樱花，则是由国名加上该国最著名的花卉了。

摄影／陶钧

责任编辑／马赛屏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杨东海



和风“静岗町”

上海之外，近代中国境内还曾涌现过许多洋地名，它们位于青岛、天津、东北地区、香港等深受列强影响的地方。此图是青岛市的中心商业街中山路的南段，曾叫做“静岗町”。这个和风十足的地名，源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青岛的控制。

摄影／姜鹏


圣爱尔美术馆
美食
广场

胡同

“条”里有乾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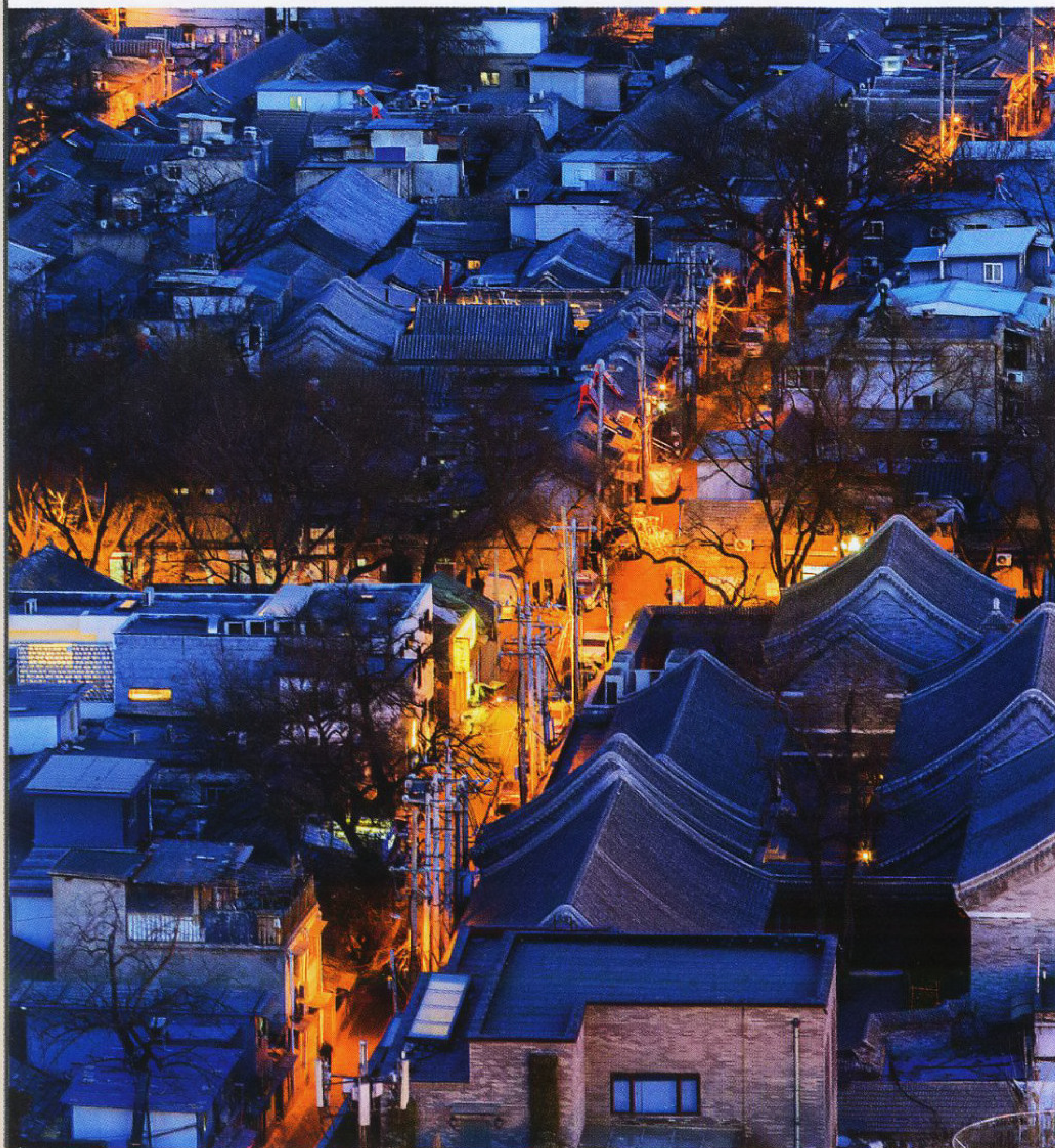
撰文／向衡

老北京的城市布局整齐方正，有序如棋盘，而北京的街巷−胡同，同样体现了这一特征。整齐、有序正是历朝统治者对治下的希望。

井井有“条”的北京胡同

图为北京妙应寺白塔西面的宫门口头条、宫门口二条、宫门口三条胡同。明宣德八年（1433年）此处建成朝天宫，天启六年（1626年）毁于火。人们在其废墟上构屋成巷。现在宫门口头条至五条胡同，即由此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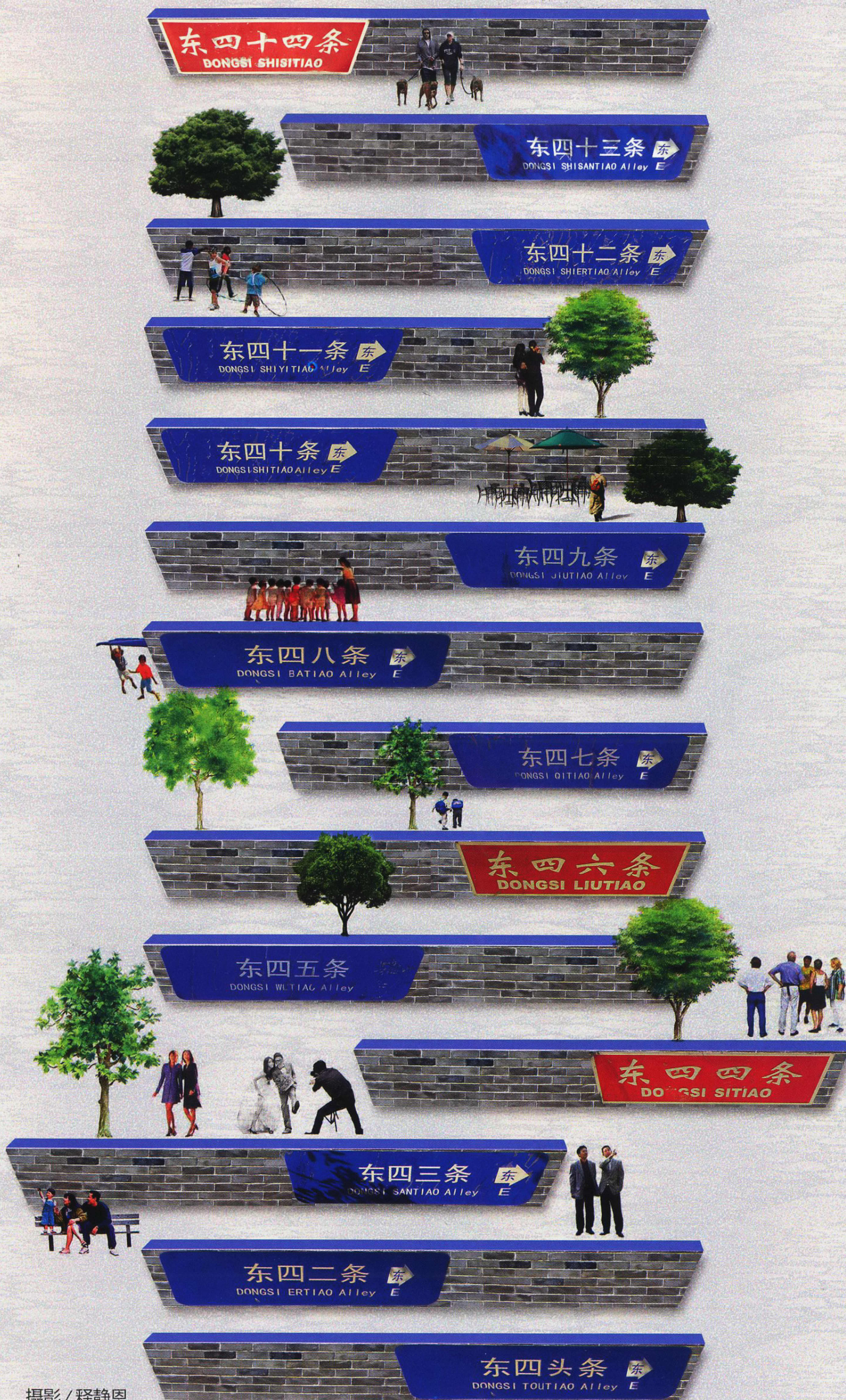
供图／视觉中国



北京的内城，在元代就已建成，这项巨大工程的总设计师是汉人刘秉忠，他依据《周礼·考工记》中的营造理念，将大都（元首都）规划得极有规律。可以这么说，现代北京城方正规矩的模样，在元大都时期就初露端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对大都的街巷赞誉有加，他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这样写道，“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当时，连接各城门的主干道大街多为南北走向，枝干小路“胡同”则沿着大街平行排列，呈东西走向，且每条胡同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同。这就如同一段音乐中的主旋律，在京城内反复奏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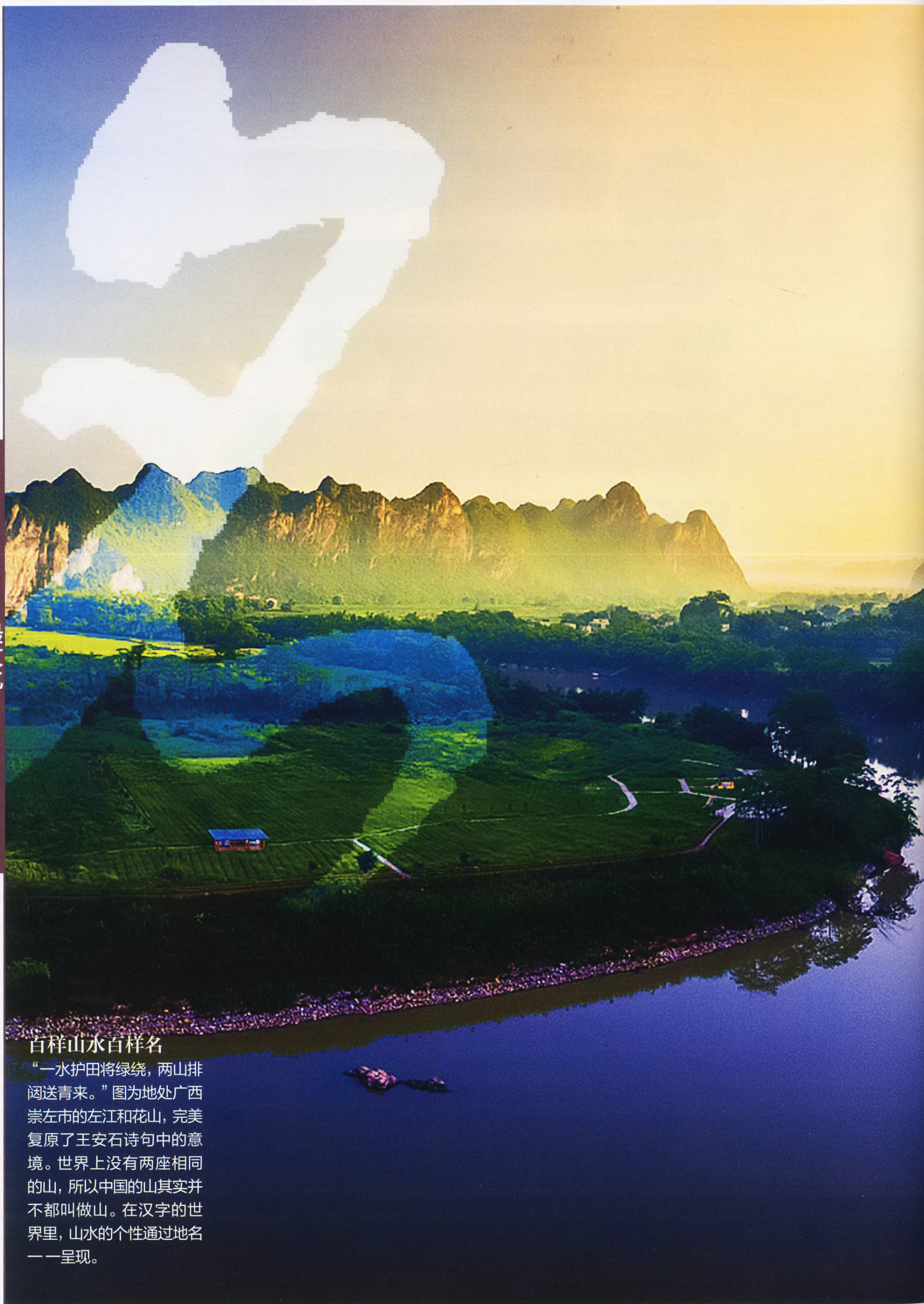
明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重新营建北京城，嘉靖年间又扩建了外城。当时的人们将并列相邻的胡同，按顺序编次，命名为“某条”。随着此类情况增多，又在“某条”前冠以地名，以示区分，诸如廊房头条、长巷头条。清代开始，使用方位结合数词命名法，比如上头条、中头条、下头条。胡同名的数词化和系统化，体现出对当时某片区街道格局的整体规划。

这类街巷中，以东四胡同群历史最为悠久（东四为地名，是东四牌楼的简称，位于东城区，因有四座牌楼得名）。明代时东四只有头条至四条胡同，清光绪年间增加至十二条，1965 年又增至十四条。这种整齐有序的城市肌理，一直保留到今天，目前为止，东四十四条是北京街巷地名中的最高数码。



摄影／释静恩

责任编辑／张舒羽
图片编辑／陈敬哲
版式设计／刘扬



百样山水百样名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图为地处广西崇左市的左江和花山，完美复原了王安石诗句中的意境。世界上没有两座相同的山，所以中国的山其实并不都叫做山。在汉字的世界里，山水的个性通过地名一一呈现。

汉字里的别样山河

撰文／梁石　供图／视觉中国

祖先发明的汉字非常严谨，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名字。不仅精细地命名了花草虫鱼，也同样严谨地定义了中国的山河、湖泊、岛屿。

你爬的不是山，是崮

从小喜欢爬山，而且总结出一条心得：还没爬过的山，从名字就能大致推测它的形貌。比如后缀为“岩”的，必是岩石山高耸陡峭，一定要准备好登山鞋；“台”，则山势高而平缓，适合漫步；“岭”，有路直达山顶，也许还能遇到人家。

这条策略十试九灵，直到我在山东遇到了“崮”。没查字典之前，我实在想象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山。字典中说，这种山四周陡削、山顶平缓，形似桌子，在地貌学上称为“方山”。

崮遍布山东中南部的沂蒙山区，多达数百座，著名的有“沂蒙七十二崮”。这种崮群的大规模集中分布，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这么多崮是怎么来的？传说它们原本是玉皇大帝插在这里的72根擎天柱，后来海龙王的龙子龙孙们经常顺着柱子爬到天庭去骚扰宫女，玉皇大帝一怒之下挥剑斩断了这些天柱，于是留下了72个柱桩。



传说自不足信。据地质学家考察，这种奇特的山势成型于67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这里的地壳经历了强烈的抬升和切割运动，地层沿着断层上下错动，形成了无数地垒式的断块山。再经过漫长的侵蚀、崩塌、风化，逐渐演变为今天山顶平坦、周围峭壁如削的形貌。古人大概不知道这些原理，但他们也不愿把这些奇特的大石柱马马虎虎地称为山，于是发明了一个专用的名称：崮。

七十二崮，崮崮有名。有的根据崮的形态，得名靴子崮、狮子崮、奶子崮、香炉崮、元宝崮等，有的源于历史典故，得名孟良崮、晏婴崮、抱犊崮、纪王崮等。孟良崮，因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与张灵甫国民党军的大战而闻名于世，但这个地名的由来，却与他们无关。原来，北宋时期的杨家将麾下有两员大将——孟良和焦赞，二人常常一起出场，这就是俗话常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孟良崮的由来，传说是因为孟良曾在此地屯兵。（从地名看，孟良的作战范围很广，他留传下来的地名还有河北高碑店孟良营、河北定州孟良河、重庆奉节孟良梯等。）

崮，因其地形易守难攻，如同一个天然形成的“山寨”，因此在历史上常常被用于军事据地。20世纪初，枣庄山亭人孙美珠、孙美瑶兄弟效仿梁山好汉，在抱犊崮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多达三千余



人，号称“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1922 年 8 月，哥哥孙美珠在与北洋军阀的战斗中丧生，孙美瑶为了报仇，于次年干了一票大案。1923 年 5 月 6 日，孙美瑶劫持了一列由南京浦口开往天津的豪华蓝钢皮快车，将一干乘客虏至抱犊崮崮顶，其中有袁世凯的女婿杨琪山，还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外国乘客 39 人。事件一出，轰动了国内外传媒，史称“临城劫车案”，又称“民国第一案”。约一个月后，孙美瑶像梁山好汉一样接受了“招安”，匪军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了旅长。受尽折磨的人质悉数释放，抱犊崮恢复了平静。

我爬了一次抱犊崮，陡峭的山壁间，只有沿着岩缝攀上一条窄路才能登顶，抱石扶崖，令人头晕目眩。而在劫车案发生的年代，山壁上没有路，只有一些嵌入石壁的木桩，攀爬者必须抓紧木桩，一旦松手就坠入深渊。可以想象，被困在崮顶的人质，真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尽管有这样一段阴暗的历史，抱犊崮却是一个充满田园气息的地名。何谓“抱犊”？相传曾经有一个农夫（一说是东晋道学家葛洪）想要上崮顶耕种，但耕牛不上去，他只好抱上一只小牛犊，等养大后再让它耕田。故事似乎隐含了农耕时代的人们开拓耕地的努力，但林立此间的崮，确实大多都不宜耕种，更别说居住。对于农民来说，这些

沂蒙“崮”乡

左页图为山东枣庄市抱犊崮，展现了“崮”的典型地貌特征：山顶平缓，四周陡峭，峭壁以下逐渐平缓。上图为临沂市神佛崮，远处崮崮相连，形成了一条天然的长城。沂蒙地区崮群的数量之多、分布之集中，为世界罕见，它们也为当地造成了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历史事件和传说。



山的家族

山的形状千姿百态，山的名称也五花八门。上图为典型的嶂——高险直立、形似屏障者为嶂，图为河北太行山嶂石岩地貌。下图依次为岳——山形高大为岳，图为西岳华山；岩——石峰高峻为岩，图为浙江仙居观音岩（供图／微图）；崖——山边陡立为崖，图为山西陵川县锡崖。

崮就像“不成一事”的牡丹，美而无用。

唯一的例外是纪王崮。在七十二崮中，纪王崮的崮顶面积最大，接近 4 平方公里，相传春秋时期的纪国亡国后，国君迁居至此，是为地名由来。此后，陆续有人来这里避乱、隐居，清朝末年，一户石姓人家迁至崮顶，如今已繁衍成了一个远离尘嚣的小村落。纪王崮的一大胜景，是可以俯瞰大大小小的十多个崮，崮崮相连，如同连接天地的阶梯，美轮美奂。再回头看崮顶的村居，宛如悬在半空的天上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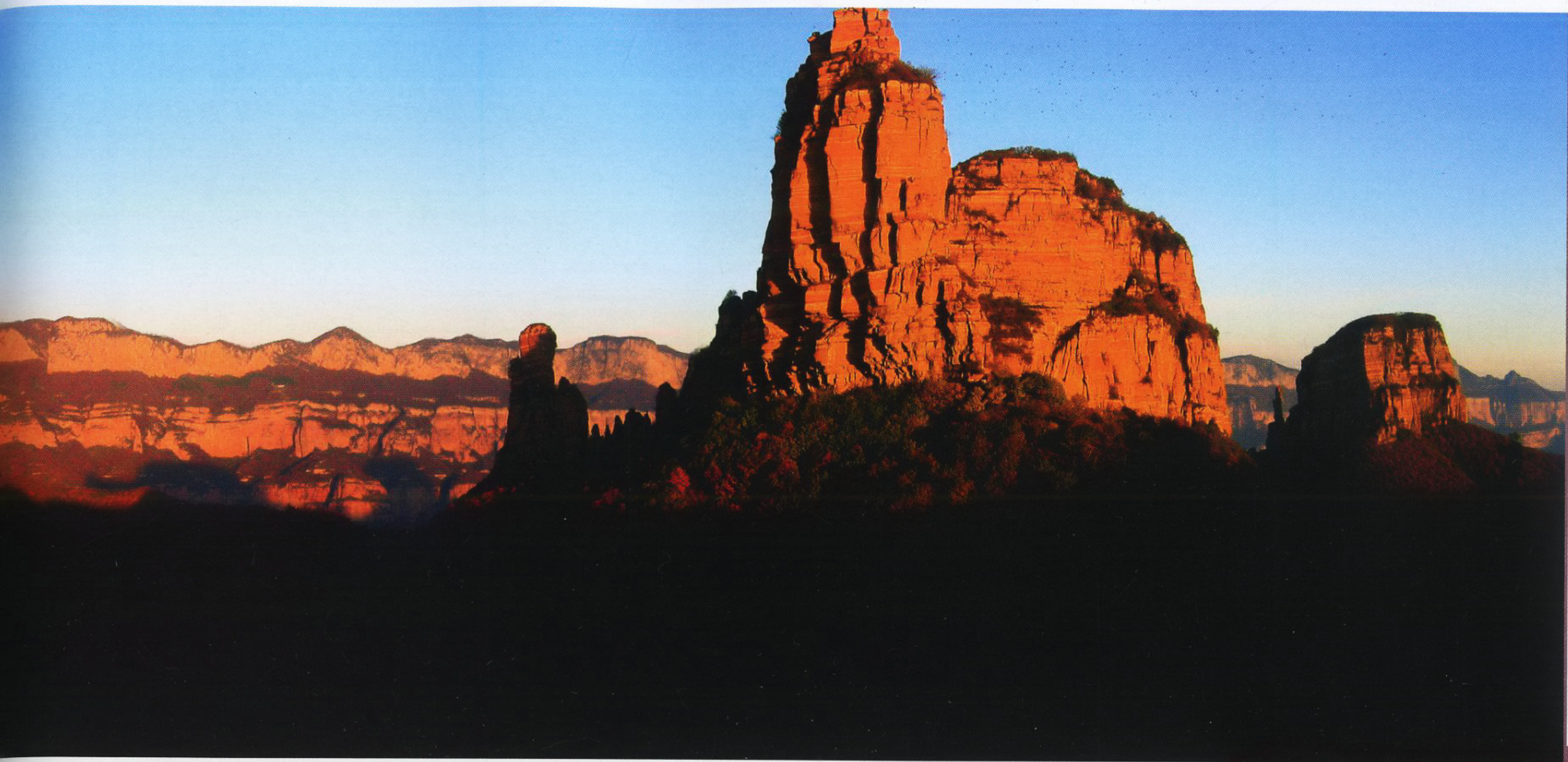


爬过各种各样的山，却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崮是山，又不是山。

渎，天生要强的水沟

水没有形状，却被大地和人力塑造出千差万别的造型：江，是浩浩汤汤的；涧，是琳琅有声的；渎，是氤氲缱绻的……

渎，一个字就把我带到了江南。太湖是江南的心脏，古有进出河道 260 多条，它们就像血管，把四方的溪流湖荡都串联起来。这些河道却不叫河，叫渎、溇、港，太湖西北有荆溪百渎，西南有苕溪七十四溇，东南有震泽七十二港。



渎流经之处，宜兴城东、太湖沿岸许多村名、小地名中，几乎都带有一个渎字。最有意思的，是太湖七十二渎。我以为“七十二”是一个概数，但到了宜兴，当地人真的能报出一大串渎：准渎、蒋渎、彭渎、汤渎、毛渎、葛渎、漳渎、赵渎、官渎、涺泗渎、良心渎……这一带的土质很特别，白天干爽如香灰，用手一搓就散，拔出萝卜都不带泥。到了晚上，七十二渎的水气又让土壤潮湿黏密，当地人称之为夜潮地。夜潮地长出来的萝卜，甜脆如香梨。宜兴、无锡的许多食客，买萝卜时都要问一句：“是不是渎上的？”

到底什么是渎？西汉文学家贾谊的《吊屈原赋》中有一句：“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渎，就是一种小水渠，连鱼都养不大。但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的词典《尔雅》，又将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并称为四渎，在这里，渎的释义是超级大河。渎怎么能忽小忽大？有鉴于此，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出来打了个圆场：“小大皆得称渎。”

大小都能称渎，太没个性了。渎与普通的水渠到底有何不同呢？《说文解字》给出了另一条线索：“渎，沟也，一曰邑中沟。”也就是城里的水沟。这似乎表明，渎原指的是一种人工开凿的水渠。

中国最大的一条渎，莫过于现在江苏省境内的山阳渎了。山阳渎开凿于春秋末年，接通长江与淮河，是中国最古老的运河之一。经过隋文帝、隋炀帝父子的修整，成为了大运河中的一段。其后，山阳渎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从唐代中期到明代后期的约八百年时间里，山阳渎水流湍急，极少淤塞，几乎没有治理的记录（明万历年间有过一次治理），堪称人类工程史上的奇迹。

由此看来，渎比普通的沟渠都要强劲有力，死水是不能称为渎的。东汉经学著作《白虎通》中还有一种解释：“渎者，浊也，中国垢浊，发源东注海，其功著大，故称渎。”渎是

链接

地名中的“山”

岑——小而高的山
陵——大土山
台——高而平的山
峰——高而尖的山头
岫——峰峦
岗——高起的土坡
峪——山，或山谷
岘——小而高的山岭（xiàn）
屺——无草木的山（qǐ）
垴——小山丘（nǎo）



我想，江南之所以成为水乡，不仅是因为水多，更因这流动不息的力量和灵气。

把云梦泽改成云梦湖怎么样？

云梦泽，是古代江汉平原上的湖泊群的总称。如果来一场“最美中国地名”的评选，云梦泽一定榜上有名。但这三个字的组合，却不是某个天才诗人的妙手偶得，而是源自古代的楚方言。

明代刘伯温的《郁离子》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春秋时期，楚王在云梦泽打猎，他让掌管山泽的虞人把禽兽都哄赶出来，以便射杀。禽兽都出来了，飞的飞，跑的跑，鹿窜过楚王的左边，麋跑过楚王的右边，楚王刚拉开弓要射，一只天

河的家族

上图为广州市猎德涌（摄影/陈冲），涌（chōng）意为河汊，作为地名多见于广东。右图依次为苏州木渎（渎指小水渠，在江南地名中非常常见。也有大河之意，古人将长江、黄河、淮河、济水称为四渎）；湖南张家界金鞭溪（溪一般指山里的小河沟，也泛指河道较窄、流速较快的小河流）。右页图为四川阿坝金川（川多指较大的河流）。

一种强大的“排污渠”，中国的污浊之物，都通过渎排入大海。同一时期的《风俗通》也说：“渎者，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

原来，激浊扬清、畅通无阻，这才是渎的真谛。在江南地区，以渎为名的河流不计其数，有的能行艨艟巨舰，有的只是在家门前悠悠荡荡，但不论大小，水流从不停歇。苏州的木渎古镇，相传开凿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专宠越国美女西施，为她营建馆娃宫、姑苏台。木材从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来，一时间竟堵塞了港渎，木渎之名由此而来。木渎畅流了两千多年，船只货物往来不绝，最终在沿岸兴起了一座商贸发达、人文荟萃的名镇。





金川

鹅略过头顶，展开的双翅如同低垂的云彩。楚王箭在弦上，不知道该射哪个好。这时，神箭手养由基上前说："我射箭时，放一片叶子在百步之外，十发箭十发中。如果在那里放上十片树叶，那么能不能射中，我就没有把握了。"

由此可知，云梦泽是楚王的专属狩猎区，先秦的《左传》、《国语》等文献对此也有记载。梦，在楚方言里是"湖泽"的意思，云梦就是云泽。后来，加上了更普及的通名"泽"，变成了云梦泽。云梦泽与洞庭湖原为一体，由于长江的泥沙沉积，长江以北变得山林、沼泽、湖泊密布，而长江以南还保持着浩瀚的水面，即今天的洞庭湖。也许是因为云梦泽这个名字深得古代经史学家的喜爱，汉晋以后的文献将云梦泽的范围越说越大，洞庭湖也被包括在内。所以，洞庭湖也逐渐被称为云梦泽。

大泽生妖精。在楚文化的浪漫气质熏染下，云梦泽神秘广阔的水下世界，触发了人们无穷的想象力。在古代的小说里，云梦泽是妖精最多的湖泊之一。

《山海经》中讲到，云梦泽居住着一条名为修蛇的上古巨蛇，它头部青色、身体黝黑，喜欢活吞大象，过三年才把骨架吐出来。据说，帝尧在位时，十个太阳并出，修蛇等怪兽也出来危害人民。神箭手后

链接

地名中的"河"

圳——田边水沟
浜——小河沟
江——大河
涧——山间流水的沟
渠——人工开凿的河沟
沟——人工挖掘的水道
汊——河流的分岔



《尚书》中的九泽位置示意图

先秦地理著作《尚书·禹贡》，列举了上古的地理认知中最重要的九个大泽。从地理位置上看，云梦泽位于楚文化区，且离中原最远，因此在传说、神话中也最富神秘色彩。经过千百年的沧桑巨变，九大泽中的雷夏泽、大野泽、菏泽、荥泽，现已大部分或完全淤涸。

参考资料：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湖的家族

上图为福建莆田木兰陂，是北宋时期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至今仍在发挥灌溉功能。陂原指池塘、湖泊，也常用于人造水坝的名称，如春秋时期修建的芍陂，汉代修建的鸿隙陂。右页图为浙江温州大龙湫，湫原指水潭，由于大龙湫被普遍用于称呼这条瀑布，于是这个水潭又被称为龙湫潭。

羿奉命射落了九个太阳，然后捎带手来到云梦斩断了大蛇。尸体横在地上，变成了今天的巴陵山（位于湖南岳阳，下临洞庭湖）。

这个神话故事可能不是凭空编造的。上古时期，云梦地区居住的是苗蛮部落，他们中的一些人崇拜大蛇。后羿作为东夷族的首领，在这里斩断修蛇，可能反映了东夷对苗蛮的一次军事攻击。战争结束后，带着对云梦大泽的强烈印象，交战过程逐渐被流传为一个神话，而战败者也被描述成了大泽里的怪兽巨蛇。

此后，唐传奇、元杂剧、明清小说等神怪作品，纷纷选择云梦泽作为故事的发生地，比较著名的有唐传奇《柳毅传》，清代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中的《汪士秀》等。云梦泽，俨然成了中国水怪的一处活动中心。此外，道教也来这里抢占地盘，将湖中的君山，列为有地仙居住的“天下第十一福地”。关于山中神仙出没、藏有仙药的记载，历代不绝。

为什么神仙鬼怪都对云梦泽青睐有加？除了楚文化的余绪外，大概也因为历代写作者对云梦泽这三个字的钟情。泽是一个古老的地理通名，比湖、泊、潭、池的“规格”都要高。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尚书》，罗列了当时的地理认知中天下的九个大泽，这些古老的大泽，积淀成了千百年的情结，也埋藏了最多的神秘。云梦泽作为九泽之一，而且水域面积数一数二，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自不待言。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的诗句，充满了烟波浩渺的画面感。改成“气蒸云梦湖”，意境就差远了。泽就是泽，谁也比不上它的浩大。



海中山，不一般

展开一张大比例尺的中国地图，沿着海岸线细看海岛，就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名。比如鬼搬人、扎老鼠顶、老虎嘴头、马屁股、大马灯、小鼻子……

也许因为传统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而海岸线位于传统文明的最边缘，海边人无拘无束，所以给地方取名也比内陆自由奔放得多。一些稍微“规矩”点的地名，也会带上一个通名，比如 ×× 岛、×× 岙、×× 礁、×× 洲、×× 坨等。有的通名寓意某种地理特征，但彼此之间没有绝对的限定，很多时候海岛名称就是约定俗成。

看似随意的命名，有时却大有深意。我最感兴趣的海岛名是“山”，这类海岛非常普遍，如岱山、乌柱山、虫山、南山等。我纳闷的是，为什么古人还要把海岛叫做山呢？岛就是岛，山就是山，山特指的是陆地上的地貌，而高出海面者自有岛、屿等专用名称，本不该混用。就像陆地上的一座山，如果反过来被叫做岛，岂不怪哉？

我想起了“沧海桑田”这个词。它源于东晋葛洪的《神仙传》，故事是这样的：东汉桓帝时期，神仙王远下凡，设宴招待了另一个神仙麻姑。两人浅笑轻谈，麻姑说：“自从上次会面以来，我已经看着东海三次变成桑田。刚才路过蓬莱，海水又比往常浅了些，难道它又要变成陆地了吗？”王远笑道：“圣人们都说东海正在下降，我看那里不

链接

地名中的“湖”

坑——蓄水的堰塘
泡——小湖
淀——浅水的湖泊
池——多指人工挖的水塘
泊——同湖
洼——小水坑
塘——面积不大的水池
潭——深水池
湫——水潭
氹——小坑，水塘（dàng）
汵——汇聚大水的洼地（kuǎng）



岛的家族

屿一般指较小的岛，上图为浙江温州江心屿，连同福建厦门鼓浪屿、福建东山县东门屿、台湾台东县兰屿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屿。

久又将扬起尘土了。”

据现代地理学家研究，在距今15000年的大理冰期，东海的海平面下降，海床裸露，如今的舟山群岛、台湾海峡都与大陆连成一片。而在过去的180万年时间里，这种情况至少出现了7次。如此剧变下，东海的海岛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山，这与麻姑所见惊人的一致。仙人不是造物主，只是生存的时间比凡人长久。古人似乎在告诉我们，只要活得够久，谁都能看到海陆变迁。

在《神仙传》完成七百多年后的北宋时期，科学家沈括在太行山山崖中发现了嵌有螺蚌壳的石子，进而推测太行山是远古时期的海滨。这进一步证实了古人对海陆变迁的科学认知。由此可见，古人在把海中的岛屿命名为“山”的时候，有可能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基于某种对海陆变迁的现实认知。

另一座有趣的海中山，是“昆仑”。看宋代《梦粱录》中的古人出海远航，有“去怕七洲，回怕昆仑”的说法（“七洲”指七洲洋，位于今海南省东北部，以航程凶险著称），明代《三宝太监西洋记》中也有“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

责任编辑／陈伟峰
图片编辑／陈敬哲
版式设计／刘扬



船莫存”的谶语。这里的昆仑，分明是指海上的某个岛屿。

日本汉学家武田雅哉认为，海上的昆仑山不是一座，而是一群。其分布范围，包括中南半岛南部、马来群岛以至非洲东海岸。（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从东南亚、非洲带回的奴隶被称为“昆仑奴”。）古人为什么要把那些遥远的海岛称为昆仑山呢？

原来，在古人的地理观念中，大地是方形的，四周环绕着海水。昆仑山位于大地的西端，理论上只要沿着南海一路往西，然后折而向北，便能由海路到达。一代又一代的航海家们按图索骥，深信昆仑山就在前方，于是把到达的海岛命名为昆仑。武田雅哉提出了大胆的猜测：在中国古代的航海家们看来，海上的昆仑和陆路所能到达的昆仑山，实指同一座山。也就是说，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到了昆仑山！

在今天看来，这当然是一种误解，但如果此说成立，我们还是不得不佩服古人的冒险和探索精神。山，是海岛地名中很常见又最特殊的一类，但这简单的一个字，古人却不是随便起的。

链接

地名中的“岛”

汀——水中小洲
坨——海中沙洲
沚——水中的小块陆地
坝——沙洲
洲——水中的陆地
沙——泥沙堆积成的水中陆地
渚——水中小块陆地
礁——海洋、大江里接近水面的岩石

一阴一阳之谓道

撰文／堇青

中国县市级的地名中，“撞名”几率最高的字是什么？很可能是“阳”字，它代表山之南，水之北，日光所照之地。对中国人来说，这不仅是简单的地理方位认知，也镌刻着古人的智慧，以及传统文化的印记。



山水相依

一缕阳光投射在古城安阳易园内，一幅“土为阳，水为阴”的太极图，勾勒出美妙的图画。古人的生存依赖自然，也会将生活托寄于山水。和安阳这个地名一样，众多古地名中的阴阳，都蕴含着古人独特的方位观。

摄影／张文峰

“南”“北”那些事

中国大多数古城的宿命里，都有一条河流存在，它们或旖旎地依偎着城池，或温柔地穿城而过。在古城安阳的怀抱里，也静静流淌着一条河，人们说它是安阳的母亲河，有的人叫它的古称——洹河（洹水），还有人依安阳地名而称它“安阳河”，但就是这第二个名字引起了学者的争论。

这还要从古人取地名的一项原则说起：如果一座城镇居山之南，或居水之北，则称“阳”；如果该城镇居山之北，或居水之南则称“阴”，这可以理解为以一山或一水作为参照物，按照城镇所处的方位来取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公式：地名由两字构成，前一个字指某山某水，或某种特点，后一个字则用“阴”或“阳”表示它的位置。如此诞生的中国地名有很多，比如洛水之北的洛阳、衡山之南的衡阳，又比如淮河之南的淮阴、华山之北的华阴。

可如此一来，“安阳”就不对了。安阳的老城区地处洹河南岸，如依“水南为阴”的原则，这座城市更应该被叫做“洹阴”。合理的解释就是，洹河并不是安阳赖以得名的“真命天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安阳河”的称谓有些名不副实。

翻开安阳的历史就会发现，成就这一地名的，果然另有其“河”，那就是安阳城以南的古淇水。《诗经·卫风·氓》里曾提到过淇水——“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子渡淇水而归，水面浩浩汤汤，打湿了车的帷幔。所以这应该不是一条小河。



战国末期，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春天，淇水附近打了一场颇为重要的战役，被记载在《史记·秦本纪》一文中。秦将王龁（hé），其人曾在著名的长平之战中当过白起的副将，此次他奉命攻打赵国的首都邯郸，但未能攻克。更悲催的是，王龁遭到了合纵抗秦的各国联军的反攻，损失惨重，只能撤退至秦军增援部队所在的汾城（今山西襄汾一带）。他



转而攻打了汾城，攻城的结果《史记》中没有写明。接下来，王龁终于迎来了久败之后的一场小胜仗——攻克魏国的城邑“宁新中”。这应该让王龁大大松了一口气。

“……拔宁新中，宁新中更名安阳”，这是说王龁得手后，“宁新中”被改名为“安阳”。明代大学问家崔铣在《彰德府志》中，以“淇北”来注释安阳。明清《彰德府志》、民国《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等书都记载，秦将“宁新中”更名为安阳，“安”与“宁”的意思相近，因其地处淇水之北，所以为“阳”。或许秦军是希望借这次更名，使淇水之阳安定，博一个好彩头，并且建立一个己方的根据地。

如今的淇河，距离安阳市有数十公里，距离上的关系似乎远了些，其中另有玄机。战国末期的古安阳邑，在今天的安阳市东南约20公里处，

旬阳：天生太极城

从远处俯瞰陕西省旬阳县县城，群峰叠翠，峰高谷低，沟壑分明，绿水绕城，阴阳回旋，人称“太极城”。更奇妙的是，旬阳城所处的位置，恰好宛如一条“阳鱼”，游弋在山南、水北之处。这也是旬阳地名中“阳”的来历。
供图/东方IC

陕西的地级市咸阳，渭水穿南，嵕山亘北，山水俱阳
咸字意为“全”，故称咸阳。这个名字取得极好，也取得极早
在秦国还未问鼎天下时，就将其占用了
这使得很多同样处于山水俱阳之地的城市，只得另觅别名



羽阳千岁
这是一块出土于陕西宝鸡陈仓故城的瓦当，上书四个扇形的篆字“羽阳千岁”。此瓦属于战国时期的秦国宫室——羽阳宫。今宝鸡市区北坡一带古称羽阳山，为羽阳宫旧址所在。羽阳宫之“羽”为渭河，民间称“羽河”。羽阳宫和众多中国古地名一样，取其居于山之阳、水之阳的吉祥位置。
供图/FOTOE

今汤阴县一带。而淇水也曾改道过，古淇水则比如今的位置更靠北一些。换言之，古淇水和古安阳才是一对。

另一个证据是，当时苏秦为赵国游说，召六国国君歃血会盟、促成合纵抗秦的地点乃是“洹水之滨”，该地当时牢牢地掌握在联军手中，所以安阳之“阳”不可能指的是洹河。

是南是北？此河还是彼河？可以从一个“阳”字里求解。想不到地名里的一字之辨，竟能串联起两千多年前的地理和历史。这也因为“安阳”的名字，没有违背古人取地名的原则吧。还有一个佐证的例子，是湖北武汉三镇之一的汉阳区，依取名公式，它应在汉水之北，但实际却在汉水以南，经过考证也是汉水改道的结果。

事实上，以山水阴阳来定立地名的原则，乃是中国地名最为重要的命名原则之一，既传统又方便。不仅如此，这一原则还包含着古人与天地自然的相处之道。

在那阳光明媚的地方

假如推选中国地名中的最美汉字，一定非“阳”字莫属，你注意过它的使用频率吗？有人曾对现今省会、地级市和区县级地名进行统计，带“阳”字的地名多达117个。其中两个省会城市为贵阳、沈阳，地级市有南阳、岳阳、资阳、辽阳、揭阳等19个，再小一级的阳字地名更多达96个。而且，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老古董”，有的甚至沉淀了几千年。

最老牌的带“阳”字的古城，当属传说中的夏都“阳城”。《史记·夏本纪》把夏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来记载，文中写道：禹为舜服丧三年结束后，辞去帝位以避让舜之子商均，想把帝位传给他，自己去了阳城。结果，天下诸侯都去阳城朝见禹。这个阳城在哪里呢？南朝宋时期裴骃撰写的《史记集解》中，采信了汉代刘熙的看法，认为其为“颍川阳城”，很可能就是今河南登封市告成镇一带的古城，按照地方志记载，告成镇名称即为阳城，唐女皇武则天于公元696年登嵩山、封中岳，取大功告成之意，遂改阳城为“告成”。

站在古人的角度，告成镇不愧“阳”城的称号，山川可以为凭。巍巍嵩山耸立于北方，涓涓颍河横贯其南，可谓双阳之地。这是巧合吗？还是四千年前的人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山水观？此地还有另外一条线索。

在告成镇南方，颍河（上游）的南岸，还耸立有一座山峰，名为“箕山”，东西绵延，隔颍河与嵩山相望。《孟子·万章》提到了箕山：“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



链接

阴阳地名 山水为凭

在海量的中国地名中，阴阳地名是个大家族。这些地名首先体现的是古人对于自然的观察。阳光可以直射的位置为阳，反之为阴。这既是方位观，也是思想观。在命名地名时，如果居于阳面的地方，常叫做阳，居于阴面的地方，则叫阴。考察中国的带阴阳的古地名，大多符合这一原则。其中的原理如上所示。

制图／刘扬



向阳而生

山意高远，白云出岫，阳光和煦……在一片山川盛景中，屹立着一座空中楼阁，这是浙江温州雁荡山上的观音洞九层楼阁。它居于山的阳面，构思巧妙，人作天成，深洞为阴，高楼为阳，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于“阴阳”的极致追求。
摄影／邓庆生

禹之子于箕山之阴。”禹要让位于帮他治水有功的伯益，但益也不愿接受，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

箕山之阴，应该就是箕山的北麓。文中没有用南北来表示方位，而是选择了“阴”，这与阳城之“阳”遥遥相对，十分耐人寻味。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阴、阳的本字。“阳”在甲骨文中常见，画的是个太阳的形状，再加个T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个会意字，T形为“示”，似乎想表达祭祀太阳的样子，但本质上描绘的还是自然景象（天象）。到了金文中，由“日”和“T”组成的阳字，出现了修饰笔画，结果越来越趋近于“昜（yáng）”。昜字由“日”“一”“勿”组成，“勿”有飞扬、强大之貌，“昜”就好像一轮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光芒四射。

再看“阴”。甲骨文中的“阴”字十分少见，以至于学者们一度以为那时还没有“阴”，但后来发现卜辞中有“戊戌卜，其阴？瞾已启，不见云”的句子出现，这个“阴”字，主体是“云”，当太阳被云层遮蔽，就阴了，字左边有代表小丘的线条符号。这或许表示先人对于“阴”的直观印象——物体被云遮盖造成了阴。在部分“阳”字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左侧也添加有类似的符号，这很可能在后世发展为阴阳二字的偏旁——“阜（阝）”。阳成了“陽”，阴则成了“陰”。

汉代《说文解字》将阴阳二字都归为“阜”部，阜即为山丘。至于阴阳二字的字意，也与山联系在一起。今人不能不承认，这很贴切，也很科

被呼来喝去的襄王，丢尽了周王室的颜面。写史的儒家无可奈何
结果使用了一个地名——河阳，来为周天子遮羞
晋文公行事颠倒，但尊卑秩序是不能混乱的
所以《春秋》才这样记载啊

学。中国处于地球的北半球，高山兀立，日光只能斜射到山的南面，山南受光的山坡即为“阳面”。“阴”的右边由“云”演变为“侌（yīn）”，侌表示正在环转团聚的雾气，用以解释北坡的“背光”现象，而背光的北坡即为“阴面”。

先人靠着细腻的观察与强大的概括能力，打造出“阴”“阳”二字，同时也把这种认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选择城池的位置，以及为城池命名。《管子》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不能太高，容易受水旱之苦，也不能太低，否则就要耗费人力修缮河道。这位先哲说出了古人择地造城的思路。

中国建筑大多坐北朝南，为的即是更好地“采光向阳”。一座城池也是一样，很少紧靠大山的北麓而建，大都与山隔开相当的距离，正如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所解释的：“盖面势在背，自难立国邑耳”，所以带“阴”的地名少之又少。

站在山的角度说阴阳，很好理解，而河的两岸为什么也有阴阳的区别？这是因为河流大多流淌于峡谷当中，被两山夹峙，其北侧应为山的南坡，山南为“阳”，所以水北也是“阳”；其南侧则为山的北麓，山北为阴，所以水南也是“阴”。另外，如果河岸被河流下切，阳光可以照射到的是北岸，南岸则背向阳光，这也造成了两岸存在阴阳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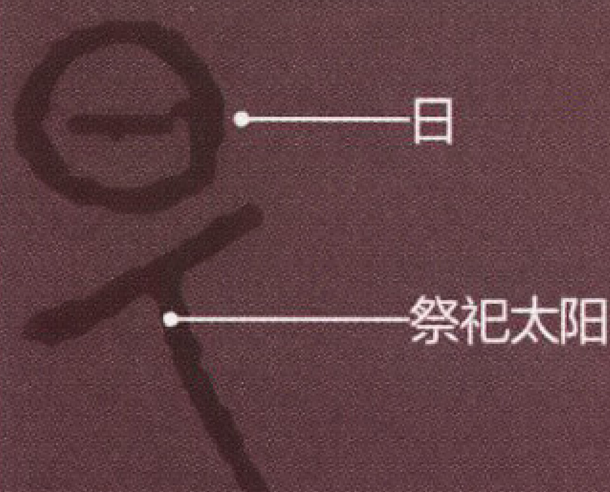
选在河的两岸造城有区别吗？有。中国境内地势西高东低，所以河流多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恰与地球自转同向。江河之水在右（东向）偏转力作用下，往往对右岸冲刷甚于左岸，在漫长的岁月里，造成右岸（南岸“阴”）的陡峭，左岸（北岸“阳”）的平缓。左岸更易建城，而右岸更容易遭遇水患。

子曰：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可见，中国人性好山水。可贵的是，原始初民通过阴阳二字，准确建立了对大自然二元对立的认识。如今带阴阳二字的地名，就是最好的印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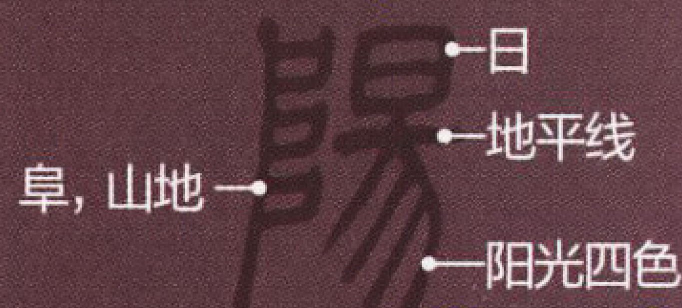
阴阳地名小心机

古人扎堆起“阳”名，这其中有“阴”地不宜建城的原因，但更多是由于中国人喜“阳”不喜“阴”。例如山东的省会济南，在济水之南，但并不称“济阴”。又如古都开封，地处黄河南岸，并未取名“河阴”。春秋时期，郑庄公在今开封城南朱仙镇附近修筑储粮仓城，取“启拓封疆”之意，定名启封。汉初因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将启封更名为“开封”，寓意吉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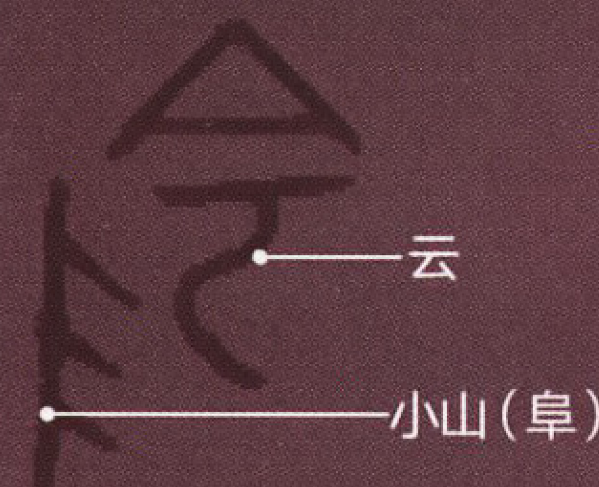
即使是对那些带有“阳”字的地名，古人同样极为挑剔和讲究。陕西



甲骨文 阳



小篆 阳



金文 阴



小篆 阴

链接

古字里的阴阳密码

商周时期的先民，是如何认知阴阳的？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和金文，成为重要的解锁密码。甲骨文中的“阳”字，可以看到明亮的太阳冉冉升起，人们对它充满崇敬。演变到金文和小篆，“阳”字则表示被太阳照耀的山坡。从“阴”的金文中可以看到乌云笼罩着小山，演变到小篆，“阴”字则表示云气（今+云）笼罩着山的背阴处。由此可见，古人对于阴阳的概念都与宇宙气象、自然山河相关。

的地级市咸阳，位于八百里秦川腹地，渭水穿南，嵕（zōng）山亘北，山水俱阳。咸的字意为“全”，故称咸阳。这个名字取得极好，也取得极早，在秦国还未问鼎天下时，就将其占用了，这使得很多同样处于山水俱阳之地的城市，只得另觅别名。有些地名取起来煞费苦心，最典型的是洛阳。

洛阳是块风水宝地，北有邙山，南有洛水，双阳之地，山川形胜，历朝历代都是皇帝的心头好，而洛阳的名字也十分纠结。洛河古名雒（luò）水，所以战国时，被取名“雒阳”，雒代表“天命之玄鸟”，但也通炮烙之“烙”，从火；秦时，五行之说渐起，秦始皇按“五德终始”进行推理，认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应为水德，因此改雒阳为洛阳，“洛”从水；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东汉尚火德，复名雒阳；三国时魏的德运为土，认为“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遂复改为洛阳。后世沿用至今，唯明朝光宗朱常洛为讳“洛”字，改“洛”为“雒”，清以后仍称洛阳。如此折腾，只为皇帝一人。

除了求个吉利，斟酌这些带“阳”字的地名，还牵扯到社会政治的因素。

儒家经典《春秋》中，记载了一个已消失的地名——河阳，大约在今河南孟县西一带。书中匆匆一笔写道：“天王守（狩）于河阳。”意为当时的周天子襄王到河阳巡狩，履行上级对下级的视察和巡视，并接受诸侯们的朝觐。这看起来没什么不对，但为其作注的《春秋左氏传》里，却记载了孔子对此事的态度，他大不以为然地说：以臣召君，违背古礼，不可以被效法。

《竹书纪年》可能对这件事描述得更准确——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诸侯中领头的人物是晋文公，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与楚国的城濮之战，施计打败对手，成为中原霸主。为了稳定自己的地位，展现晋国的强大，晋文公采纳大臣赵衰的建议，决定想办法把周天子“请”到晋国的地盘上会见诸侯。由于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叛乱时，晋文公曾出兵勤王，凭着这个“交情”，襄王不好推托，晋国的目的达到了。

被呼来喝去的襄王，丢尽了周王室的颜面。写史的儒家无可奈何，结果使用了一个地名——河阳，来为周天子遮羞。另一本注解春秋的名作《谷梁传》对此作出解释：水北为阳，山南为阳。会盟地叫“温”，也属于河北。将这一片地方称之为“河阳”，是为天子避讳，是尊重天子。晋文公行事颠倒，但尊卑秩序是不能混乱的，所以《春秋》才这样记载啊。

“河阳”的话题，说起来太沉重，而且并不光彩，不管这个地方到底在哪儿，这个名字后来都名不见经传。与之相比，不怎么受待见的“阴”字，用作几处地名以后，反而流传了千年。最有名气的是华阴。

华阴在西岳华山之北，其北又临渭水，于山于水都属“阴”。战国时的魏国丝毫没有避讳这个“阴”字，为其取名“华阴邑”。华阴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被誉为“三秦要道，八省通衢”，古时，中原通往西北必经此地。而且华山的登山之路恰在山北，

责任编辑／刘睿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刘扬



所以华阴也越来越繁荣，这就叫“背靠大山好乘凉”吧。

南方还有座历史文化名城叫“湘阴”，属湖南岳阳市，在南朝宋时得名。按照明嘉靖《湘阴县志》等当地志书中的记载，湘阴的名字并不特殊——取自“地居湘水（湘江）之南”。但明嘉靖《长沙府志》和清康熙、乾隆《湘阴县志》，在注解中又详加说明：“湘”有“相”“合”的意思，湘（阴）以水名邑，有潇、蒸、沅三水环流……也就是说湘阴来自“三湘之水”的合名。

从河阳、洛阳、安阳到华阴，这些含有“阴阳”的地名都在中原地区，河南以“阴阳”命名的地名，无论从数量还是时间上，都为全国之冠。事实上，阴阳地名就是以中原为起点，向四周扩散而去，最终大江南北都认可了这种命名方式，最有力的证明是地处贵山之南的“贵阳”。不过，正如湘阴一样，南方山川河流密布，地形变化多端，这也使得阴阳地名必须“因地制宜”，似乎也不那么合乎标准了。

套用《易经》中的一句话——“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阴一阳”并不复杂，但却总是运动着、变化着、发展着……不变的，是至简的大道，也就是中国人对于自然天地的探索精神和认知智慧。从数不胜数的阴阳地名中，能读出来的道理很简单，历史却很丰厚。

华阴：西岳作靠山

华阴市因地处西岳华山之北，而得名“阴”。它未避讳地名中的“阴”字，而华山果然成为它的“风水靠山”。华阴自古便有“山川形胜、甲于关中”的美誉。图为华阴境内的西岳庙，南距华山仅5公里，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祭祀华山神的专用场所。
摄影/视觉中国


崇
德
Chongde

儒者走过之地

撰文／李行

千百年来，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儒者，将忠、孝、仁、义写在了中华大地上。

最文化

宝岛的儒学积淀
图为台湾花莲县的崇德火车站。沿着海岸线环岛旅行，会遇到很多富有儒学色彩的地名，比如嘉义、文贤、仁和、仁德、崇德、归仁、善化等。仅是在台北，忠孝、仁爱、信义这三条主干道也让人印象深刻。从这些地名中，可以看到台湾岛良好的儒学传承。
摄影／泓伊

儒生王守仁的奇幻漂流

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浙江余姚的大户王家，迎来了一个新生儿。王家是儒学世家，先祖自大明朝开国以来，历代皆以治《礼》、《易》、《春秋》等学问闻名于世。婴儿的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孙儿取名“守仁”。

王守仁十岁那年，父亲王华状元及第。王家从未有过这样的喜事，远近亲友都来拜贺，交谈间不免对守仁寄予厚望：作为状元的儿子，将来即便考不中状元，也得考个像样的功名，承续家声。王守仁却不以为然，有一次与塾师讨论经典时，口出惊人之语：“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先生听了差点喷出一口老血，耐着性子问他：“那你想干什么？”王守仁淡定地说：“读书做圣贤。”

的确，孔子考过状元吗？孟子考过状元吗？功名是虚，像圣贤一样立德、立言、立功，才是实实在在的。读书考功名，最多只能把名字留在史册里，而这个小男孩的志向，是把自己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华大地上。

当时大概没有人能料到，这个孩子的志向真的实现了。王守仁创



造了一个记录：为后世留下最多地名的儒学大师。

王守仁更为今人所熟悉的名号是王阳明，国内称“阳明”的地名如今非常多见，如浙江、江西、贵州等省份都有阳明路，台北市有阳明山、阳明大学，连日本也有以阳明为名的园林。这么多的地名，都是后人为了纪念王阳明而起，只有一处例外——浙江会稽山阳明洞。据清代《会稽县志》记载，王守仁初入仕途时，曾一度因病告归，在会稽山阳明洞侧结庐“默坐三年，了悟心性”，因而自号阳明子，后世尊称为阳明先生。所以，王阳明的名号，源于阳明洞。

王阳明为何受到如此尊崇？

不朽之人，必有彪悍的人生。明正德元年（1506年），担任兵部主事的王守仁得罪了权倾朝野的太监刘瑾，官阶一撸到底，被贬为贵州龙场（今属贵州省修文县）驿丞——相当于县招待所的所长。贵州是明朝的蛮荒之地，而群山中的龙场，更是蛮荒中的蛮荒，蛇虫猖獗、瘴疠流行，语言不通，条件十分艰苦。别说做圣贤，能活着就不错了。这种境地，大概只有曾被贬至海南岛儋州的苏轼可以相比。

王阳明到达贵州龙场后，一下子从“官二代”变成了苦力，不仅亲自种地、砍柴、担水、做饭，还要照顾生病的随从，比苏轼还惨。不过，王阳明“读书做圣贤”的志向未曾动摇，这从他为自己居处的命名中可见一斑。龙场驿破旧得没法住人，王阳明只好蜗居在附近小山上的一座溶洞里，随后又在洞旁的荆棘丛中搭建了一座极其简陋的茅棚。这个见者伤心的山洞，却有一个“后现代”的名字——玩易窝，因为王阳明喜欢在洞里埋头玩味《易经》，并且颇有心得。

经此大难，王阳明认为自己对于荣辱得失都已超脱，只有生死一念还未看透，这也是修身成圣的最后一关。于是他在玩易窝下面找了一个石罅，称之为“石椁”（石制外棺，这里代指墓穴），对着它苦苦冥思：如果圣贤遇到这样的绝境，会怎么办？如果我在这里死了，就以这个石椁为墓，直接把我埋进去吧。

在这种积极求进的心态中，王阳明的居住条件逐步改善。不久，王阳明移居龙岗山腰的另一个山洞，比玩易窝宽敞明亮了许多。也许是想起了家乡，他将这个山洞更名为“阳明小洞天”，并为之作诗曰：“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岂不桑梓



孔子得名于尼山

左页图为山东曲阜尼山（供图／视觉中国），这里是孔子的出生地。史载孔子的父母“私祷尼丘山以祈焉，生孔子”。史学家钱穆认为，孔子之所以名丘、字仲尼，就是源自这座“尼丘山”。上图为后人复原的会稽山阳明洞（供图／东方IC），青年时期的王守仁曾在此筑室读书，自号阳明子，后以王阳明的名号为世人熟知。



阳明的步履
王阳明的脚步，遍及江西、贵州、两广等省份，所到之处平盗匪、施教化，也留下了很多地名。上图为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王阳明遭贬时曾在此居住。右页图为不远处的君子亭，是王阳明在此居住期间命名的，亭子下方有蒋介石游阳明洞时题写的“知行合一”四个字。
摄影/曹经建

怀，素位聊无悔。”只要内心从容安定，何处不可为家？

和苏轼一样，王阳明精通佛、道，但骨子里还是儒家。儒者都是“操心”的命，有一份割舍不去的经世精神。于是他在龙岗山顶办起了书院，根据当地风俗教导少数民族乡民，很得民众拥戴。当地的土司也对他非常崇敬，经常给他送米、肉、鸡鸭，馈赠金帛鞍马。

人在哪里不重要，做什么才重要。即便身陷地狱，也要奋力把地狱变成天堂。此刻，王阳明想起了至圣先师孔子。《论语·子罕》中说，孔子有一天忽然想居住到偏远的“九夷”，有人说，那里太简陋，怎么办？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后来终究没有搬到“九夷”，王阳明却在龙场“混”得风生水起。当地乡民见山洞阴湿寒冷，主动在洞口附近为他建了一座茅屋，又在洞口上方建了一座小亭，周围植以绿竹。根据孔子的箴言，王阳明将茅屋命名为何陋轩，又将亭子命名为君子亭。

儒学大师王阳明的归来

谪居贵州的王阳明，受尽艰苦而愈挫愈勇，心境也更加开阔起来。正德三年（1508年）的一个深夜，王阳明终于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史称“龙场悟道”，是为心学的发端。他在龙场、贵阳聚徒讲学，讲授“知行合一”之学。这是贵州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当地民众纷纷前来观听，远在江西、湖南的学子也慕名前来听课，多时达上百人。

贵州从此人文蔚起，这个曾经连峰际天、鸟飞不到的文化沙漠，一时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龙场的玩易窝、龙岗书院，贵阳的文明书院，都成了儒生心目中的圣地。（三百多年后的清嘉庆年间，贵阳人

为了纪念王阳明的文化开拓之功，还在城东扶风山修建了阳明祠。）

好消息接踵而来。第二年，王阳明谪戍期满，回调庐陵（今江西吉安），刘瑾也于次年被处死。到了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阳明已经升任南京鸿胪寺卿（主管朝会、祭祀等礼仪）。

这时，南方传来战报，江西南部地区盗贼势力扩大，攻城略府，地方官军已无法剿平。有意思的是，朝廷放着满朝武将不用，而是起用了能力出众的王阳明。

王阳明当仁不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儒家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如今正是立功报国的好机会，岂能错过。很快，满朝文武都惊呆了：平日里文质彬彬的王阳明，到了战场上忽然好像换了一个人，用兵奇谲诡诈，从来不按套路出牌。奸恶凶狠的盗贼这下遇到了克星，短短一年时间内，为患十年的盗贼被悉数荡平。

攻城容易守城难。为了防止流寇复聚，变强贼之穴为礼义之区，王阳明向朝廷请求在盗贼的老巢设立县治，以安邦抚民。王阳明吸取了在贵州施行教化的经验，认为平息盗匪的根本还在于礼教，因此县名至关重要，关系到一方百姓的自我认定。王阳明斟酌再三，决定名为崇义，以示推崇教化，崇尚礼义。而且此地原系上犹县崇义里，因地名县，顺应民意。此外，王阳明在剿匪所到的福建南部、广东北部也奏请设立新县，分别命名为平和、

以儒家核心价值观为地名之 忠



忠县

战国时期巴国内乱，巴王请求楚国派兵帮助平乱，并许以两座城池作为酬谢。内乱平息后，巴国将军巴曼子不愿故国分裂，也不愿失信于楚，于是毅然拔剑自刎以谢楚王，巴国因此得以保全。后来，唐太宗李世民感念巴曼子"刎首留城"之壮举，特为巴曼子所守之土赐名忠州。民国二年改忠州为忠县至今。

忠山

位于泸州，古称堡子山、宝山、泸峰山。三国时期，蜀国南部蛮族叛乱，诸葛亮亲自带兵南征，期间上演了七擒孟获的故事。诸葛亮曾驻兵于此山，北宋时期，山顶建有三忠祠，祀诸葛亮及其子诸葛瞻、孙诸葛尚。明崇祯年间，泸州人为了纪念诸葛亮，把宝山改名为忠山。



修文·君子亭



阳明的遗泽
上图为贵阳市扶风山阳明祠。王阳明离开贵州三百多年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对贵州的文化开拓之功，于清朝嘉庆年间修建了这座祠。
摄影/曹经建

和平，内含儒家“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

去过广西南宁的人，也许会记得城中的青秀山也有一个阳明洞。相传，这是王阳明泊舟于此时所刻。王阳明为何会远行至此？原来，嘉靖六年（1527年），广西少数民族首领卢苏、王受造反，两广总督不能平定，朝廷不得已再请年老的王阳明出山。在南方诸省人的心目中，王阳明是神一般的存在，因此卢苏、王受一听说王阳明要来，立即就投降了。这是王阳明去世的前一年，次年冬天，他病逝于赣南的一条船里。王阳明是历史上罕有的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儒学大师，为后世树立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儒者典范。

从丰镐房走出来的“大儒”

1975年，《历史研究》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蒋介石是祸国殃民的大儒》的文章，作者为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和北京师范大学党史系、历史系大批判组。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充满了阶级斗争式的激烈言辞，但“大儒”的说法，却不是空穴来风。

1887年10月31日，蒋介石出生在浙江奉化的一个盐商家庭，与王阳明的家乡余姚仅一山之隔。“奉化”何意？据南宋《宝庆四明志》、明代《宁波府志》等方志记载，奉化人“受性刚直，任气尚义”，“性易抵冒，好斗讼”，最是难管。据南宋奉化文人陈著的说法，赋予“奉化”之名，就是希望此地人“乐于奉承王化”。

蒋介石似乎天生就与儒家有缘。当地的习俗要为祖房立名，且力求古雅，蒋介石的父辈有三兄弟，其祖房分别名为夏房、商房、周房。蒋介石的父亲行三，恰属周房。蒋父去世后，蒋氏兄弟分家，又须各立房名。族中长辈根据西周

西周的两座都城——丰邑和镐京
是孔子魂牵梦萦的地方
蒋介石似乎天生与儒家有缘

他的祖居就叫丰镐房

的两座都城——丰邑和镐京，将蒋介石一房名为丰房，其弟蒋瑞青一房为镐房。因蒋瑞青未成年而早夭，蒋介石承袭镐房，合称丰镐房。

丰镐房，有浓厚的儒学气息。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的毕生志愿，就是恢复至善至美的周礼，而丰镐二都，是令他魂牵梦萦的地方。蒋介石在丰镐房长大，也毫不意外地接受了最传统的儒学教育。

他最崇拜的儒学先师，是王阳明。那种知行合一、治平天下的经世精神，强烈地吸引着这个乱世中的少年。1932年，蒋介石对青年演讲“中国的立国精神”，回忆起他在日本留学时亲眼看见:“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在轮渡上，凡是在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传习录》。许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精义。特别是他的海陆军官，对于阳明哲学，更是手不释卷的在那里拳拳服膺。”蒋介石震撼不已，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成为强国的原因之一，就是得力于中国的儒学，尤其是阳明心学。因此，他加倍发奋阅读儒家著作，甚至一度导致双目成疾。他的心中种下了一个牢固的观念:儒学，可以救中国。

崇礼、尚义，中国的希望

1931年，蒋介石已掌握了全国最高的实权。他亲自坐镇江西，指挥“剿匪”。联想到王阳明在江西的卓越战功，蒋介石在安排军事围剿的同时，也极力鼓吹“革命必先革心”:要改变中国，必须从改变民众的心志开始。为了教育广大民众，蒋介石一度兼任过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

用什么教育国民?当然是儒学。在蒋介石看来，儒学是“几千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大动脉”，要救国，必先“昭苏国魂”，唤醒“全民族历史文化之传统的根本精神”。眼下，这也是对抗“共匪”和马列思想的可

以儒家核心价值观为地名之 孝



孝堂山
传说汉代孝子郭巨，家境贫寒，衣食短缺，而老母亲总是把食物省下来给孙儿。为了让母亲不受饥饿，郭巨决定埋掉自己的儿子，不料挖坑时挖出了一罐黄金。此山原名巫山，因山顶建有郭巨的墓祠，得名孝堂山。

孝义市
唐代孝子郑兴，自幼勤勉侍奉父母，但家境贫寒，其父又早丧。其母久病不愈，想喝肉丸汤，郑兴无钱买肉，于是割下自己的肉煮汤奉母。此事传开后，孝行闻于朝廷，此地遂改名孝义。





蒋介石家的儒学氛围
上图为蒋介石的出生地玉泰盐铺，以及蒋介石故居丰镐房的中堂“报本堂”。右页图为奉化溪口蒋氏故居外景，以及1949年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离开大陆前，最后一次在奉化老家祭祖的影像（供图 / FOTOE）。蒋氏故居的房名、牌匾、对联，透露出浓厚的儒学色彩，蒋介石便是从小在这里熟读四书五经，接受了严格的儒学教育。
供图 / 视觉中国

用武器。为此，1934年，国民党中央通过了一个“尊孔祀圣决议”，通令全国的学校每年都要举行“孔诞纪念大典”，号召学生们“尊孔读经”。

就在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逐渐成为亡国灭种的大患。1931年，日本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在3个多月时间里强占了东北全境，进而突破长城。兵锋所指，华北危殆，中华民族危殆。

临危之际，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奉命赴任察哈尔省主席，在此整军练兵，准备抗日。1934年春，宋哲元和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巡视治下各县，路经商都县、张北县。张北城东的丛山里藏着一座古镇，此地在元朝便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定边城，正是历代中原王朝与北方强敌激烈争夺的要地。但这里距张北县城一百余里，且张北县境过于广大，行政管理颇为不便。宋哲元回省后，即将张北县的二、四区划出，同时将商都县的二区和三、五区六乡十六村划出，新置为两个县。

两县甫一成立，便逢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县名当如何拟定？这一年，全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蒋介石亲自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什么是新生活？就是以“礼义廉耻”作为民众衣食住行、思想道德和行为的准则，革除旧习，教化人心。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民族的兴亡尽在于此。

运动传播到华北，宋哲元作为省主席表态积极响应，要求治下各县长“为民表率，应行八德，以作

倡导”。这不全是向蒋介石表忠的政治作秀，宋哲元心里明白，以自己在察哈尔的兵力，恐怕迟早抵挡不住日军南下。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也许最终还是要依靠国民精神的觉醒，唤起全民族无所畏惧地为国尽全忠、为家尽大孝。于是，他在“礼义廉耻”中取前两个字，为新设的两个县命名为崇礼、尚义。礼义，是中华文明战胜外来侵略的终极武器。

蒋介石对《中庸》推崇备至，称其为“我国古代哲学之精义”。恰好《中庸》中也有“敦厚而崇礼”之句，想必崇礼这个县名很得蒋介石的认同。或许蒋介石也联想到了王阳明在赣南命名的崇义，二者意义相近。面对日寇铁蹄，蒋介石一定无比强烈地期望像王阳明一样力挽狂澜、旗开得胜，立下不朽之功。

以儒家核心价值观为地名之 仁



仁怀市

北宋时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压力下，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亲善政策，县名“仁怀”就是这一历史的反映，寓意仁德、怀柔。

铜仁市

相传元朝时，有渔人潜入江底捞出三尊铜人，时人以之为祥瑞，遂以“铜人”为府名。后人依据儒家思想中“人者，仁也，渐人之化”的说法，改为铜仁。





台北·阳明山

跨越海峡的阳明元素

上图为台北阳明山，山下就是繁华的台北市。这里原名草山，蒋介石退居台湾后，嫌草山有“落草为寇”之意，遂改为阳明山，以示中华文脉的传承。蒋介石以阳明学的继承者自诩，他对儒学终其一生的追随，在阳明山留下了一个深深的注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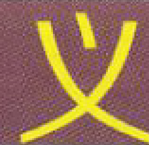
供图 / TPG

再见，阳明山

蒋介石以阳明学的继承者自诩，似乎对赣南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1937年，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长子蒋经国从苏联回到中国，两年后，被派到赣南主政。这时的赣南，就像王阳明江西平乱前一样动荡不安，一幅“化外之地”的景象，方世藻的《“赣南新政”概述》有详细描述：“各军阀占山为王，各霸一方……地方土豪劣绅，封建头目，高墙壁垒，拥兵自据……烟民的数量超过6位数，赣州城赌场规模不亚于澳门。许多地方民匪难分，难童、游民无处安身。”

蒋介石的这个安排很有深意。如果爱子能和王阳明一样，在一方任上剿平盗匪、教化民风，那么对于国民党的形象，以及蒋经国的个人威信，都大有帮助。这次磨炼对蒋经国的影响很深，数十年后，蒋经国用赣南最穷的一个县——万安县的地名，给孙子取名为蒋万安，意在让后辈记住这段艰苦岁月，记住勿忘在莒。



以儒家核心价值观为地名之



安义县

明正德年间，朝廷因此地“地广民顽，境壤旁接，依山据峒”，不时有人啸聚山林，故割此地五乡置县。以“安义”为名，以期地方安宁、人民通达礼义。

巩义市

相传有一户人家，有三个孩子，勤俭持家多年，宅院里有一棵茂密的紫荆树。后来，父母过世，三兄弟闹起了分家，准备把紫荆树也砍成三段分掉。紫荆树似乎通人性，一夜之间竟枯死了。三兄弟羞愧得无地自容，在树下大哭了三天三夜。紫荆树感其孝义，又死而复生。三兄弟从此和睦相处，再也不提分家。此地遂得名“孝义”。1964年，原巩县将县治迁至孝义镇，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巩县，取巩县、孝义之意设立巩义市。

可惜，王阳明的辉煌没有重演。1949年，蒋介石败走台湾。

这一刻，蒋介石会不会反思，他所信仰的儒学失败了？应该没有。去台之前，蒋介石曾三次参谒阳明洞。退居台湾后，蒋介石又嫌台北草山有“落草为寇”之意，将其改名为阳明山。此外，一些学习和开会的场所，也根据《传习录》命名为传习馆。蒋介石对儒学的追随，铭刻在了台北的地图上。

蒋介石参研、反思阳明心学，一直持续到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令人唏嘘的是，恰恰就是在阳明山，他遭受了生命中最后的沉重一击。1969年，蒋介石参加完军事会议，和宋美龄一同乘车回阳明山。忽然，一辆军车迎面飞驰而来，蒋介石的座车司机慌乱中误把油门当刹车，猛然撞上了前面的引导车。蒋介石的心脏受到了重创，身体从此大坏。他对“行政院长”严家淦说，阳明山的车祸“减我阳寿二十年”。

从奉化丰镐房到台北阳明山，蒋介石的人生大起大落，却不如他的偶像王阳明那样圆满。只有阳明山巍然挺立，向四百多年前的儒学大师表达着永恒的敬意。1973年，蒋介石病重，留下遗言:“我死后，将灵柩暂厝慈湖，那儿风景好，很像我们奉化老家。”

责任编辑／陈伟峰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杨东海


牧唱遺風
佛山
貞觀二年

佛山：佛城佛事

撰文／李若瑄　摄影／招力行 等

广东佛山，与汉口、朱仙、景德，并称中国四大镇，又与北京、汉口、苏州并称天下四大聚。自古至今，中国各地直接以“佛”字命名的地级市，唯有佛山一处。佛山又名禅城，这座名城到底有着怎样的佛缘呢？

佛山初地

从“佛”而来

在佛山最古老的佛寺——塔坡寺里，可以看到青灰色的砖墙上，镶嵌着刻有“佛山、贞观二年”字样的石榜，它标志着“佛山”这一地名肇始自唐代。两旁又有“佛山初地”、“牧唱遗风”的石匾，诉说着佛山前世今生的沧桑故事。

“佛”与寺
——未有佛山，先有塔坡

如今说起佛山，包括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五区，而史上号称天下四大名镇之一的佛山，范围大抵在今日禅城区祖庙街道至普君街道一带，不过弹丸之地，佛山悠久的历史却都隐在其中。

要了解佛山，必须去找一座名叫“塔坡”的古寺。相传，塔坡古寺是佛山第一座佛教寺庙，按《佛山忠义乡志》载，塔坡古寺肇迹于东晋隆安二年（398年），延续于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间长度比佛山被称为“佛山”的历史更长。事实上，佛山之名正源自塔坡古寺，民谚曰:“未有佛山，先有塔坡。”

塔坡虽然如此重要，却连佛山人都说不清它的所在。公交车普君新城站附近有片热闹的现代商圈，从那里拐入一条无名小巷，画风立变——在老旧安静的社区中，不时出现门上挂着香斗、燃着线香的人家，以及批八字、卖祭祀用品的铺子，看见一道装饰着黑白花纹的青砖山墙，塔坡寺就到了。

塔坡寺的文字记录只可追溯到清代，此前几乎都是口头传说。这是由于佛山特殊的发展史，尽管汉晋时期此地就有人居住，但人烟零落，无人关注，佛山真正成墟成镇是宋代以后的事情，清前的方志文献寥寥无几。

清代《佛山志》《佛山忠义乡志》和光绪年间立的《重修佛山塔坡古庙碑记》，都提及了塔坡寺来历，它们都一致采信了这样的传说:“塔坡寺在耆老铺塔坡冈上，东晋时有西域僧到此结茅讲经，隆安二年三藏法师达昆耶舍尊者因讲经始建经堂。”

达昆耶舍尊者何许人也？今人推断考证，他就是南朝《高僧传》里的昙摩耶舍，佛教史上极少数同时精通“经、律、论”的三藏法师。他于东晋隆安二年（398年）自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地区）浮海而来，在当时称为“季华乡”的佛山一带登岸，选择了一处人烟相对稠密的山冈——塔坡搭寮讲经，成为第一个在佛山传播佛法的高僧。这是一条早期佛教罕见的传播路线。佛山的“佛缘”也就此开始。

佛山河网交织、翠峰兀立，山水形胜，昙摩耶舍留连于佛山和广州一带长达十余年。在搭建了塔坡寺后，又在广州城创建了王园寺（今光孝寺），招收信众，翻译经文。之后才离开岭南前往长安，并受到后秦文桓帝姚兴的殷勤款待。



塔坡公公

这尊慈祥的“塔坡公”被供奉在塔坡寺内，他是塔坡冈一带的土地公公。人们相信此地有灵，才能保存佛山的千年根脉。每年农历六月六，当地都要举办“塔坡（公）诞”，行“祭水礼”，以思佛山之源。

塔坡毕竟不算繁华，昙摩耶舍离去后，他留下的经堂终因年久失修而倒塌。唐代贞观二年（628年），传说塔坡山冈上放起了金光。有人以为有宝，上山挖掘，结果挖出三尊铜佛和一方碣石，上面赫然刻着“塔坡寺佛”四字，并有一副对联：胜地骤开，一千年前青山我是佛；莲花极顶，五百载后说法起何人。

这是佛法显灵吗？至少时人相信如此。他们重建了经堂——塔坡寺，又在寺旁掘井勒石以为纪念，巨石上书“佛山”二字，“佛山”之名即由此而得，塔坡寺所在地塔坡冈也被后人称为“佛山初地”。

如今，去塔坡寺可以搜索导航——京果街2号，如此这般充满现实意味和世俗色彩，也让古老的传说更加渺茫不可捉。塔坡寺其实极为袖珍朴素，坐西向东，青砖砌筑。隔着一条窄巷，一口老井正对着寺门，即是那口开凿于唐代的水井。千百年来，放射金光的三尊铜佛已经不知所踪，殿堂新供三尊佛像。在佛像的右侧，还有一个略低的独立神案，案上供的是拄着拐杖、仙风道骨的“塔坡公”，一个本地信仰体系中的神灵，大约相当于土地公公。不知道人们是不是在感谢他当年捧出佛像的“献宝之功”。

据说，此庙虽小，但很有灵性。看守寺庙的人说：“看到北墙边那棵细叶榕了吧，它的种子从来没有落到过屋顶上，屋顶上从不生杂草。很多高僧大师来佛山，都会到塔坡寺看一看……”



塔坡古迹
“千年古镇源塔坡”，塔坡寺面积仅约四十平方米，袖珍小寺屡毁屡建。如今殿内仍供奉着三尊金光灿灿的佛像，来纪念当年掘地现佛、地吐宝光的传说。

“佛”与城
——兴衰沉浮神同步

塔坡寺香火悠悠，自唐而宋，佛山由南海县管辖。在香港的博物馆里收藏有佛山的民间木版年画，从纸张、染料还是画面的服饰来看，应为宋代之物。版画这种艺术，要有旺盛的需求才能催生出来，可见当时的佛山已是繁荣的小镇。

花无百日红。身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与李世民不同，他要建设极度强化的中央集权国家，因而制定了一系列诸如禁海令和设立僧录司限制佛教的政策，甚至规定各府州县只能有一座大寺观。佛山因为它的级别，就

链接

与“佛”有关的地名

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与发展，也为中国贡献了很多地名，深深影响了当地人的心态与风俗。除大量使用寺庙等佛教建筑名称以外，还有直接以佛、菩萨等命名的地名，举例如下。

市级

- **广东省佛山市**
  因出土佛像而名
- **上海市普陀区**
  因纪念迎请玉佛至上海的普陀山慧根和尚而得名

县级

-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普陀为梵文的音译，即观世音，相传菩萨曾在此现身
- **陕西省汉中市佛坪县**
  因附近有名为佛爷坪的平坝而名
- **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
  因附近观音山而得名

乡镇级

-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佛昙镇**
  因附近有清潭映现佛头状天然岩石的景象而名
- **浙江省金华市佛堂镇**
  因当地昔日有数间供奉神佛的佛堂而得名
- **甘肃省陇南市佛崖镇**
  因当地有“佛入崖”传说而名
- **辽宁省东港市菩萨庙镇**
  因镇内菩萨庙得名。

街道级

- **南京市江宁区佛城西路**
  附近的牛首山又名仙窟山，南朝高僧曾在这里修炼成佛

很容易成为整改的目标，其域内所有佛寺都是政令中被废止的对象，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塔坡寺被官方拆毁了。这场灭顶之灾，让塔坡寺销声匿迹了236年。

如今塔坡寺的一面墙壁上，嵌有两方石块，一块刻着“佛山初地”，另一块刻着“牧唱遗风”。当年塔坡寺被毁弃，连带塔坡冈也人气凋零，一度荒芜，杂草丛生，成为周边居民放牛场所，牧童每日在此放牛互相吹笛，久之居然成为一道胜景，时人称“塔坡牧唱”，名列佛山八景之一。清代《佛山忠义乡志》中，可以找到不少以“塔坡牧唱”为主题的诗作，其中清代新会士人谭澄有诗云:“塔坡冈上现毫光，嘉名肇锡荣此乡。塔坡寺改余芳草，澹烟疏雨行人道。”佛山之佛，佛山之名，佛山之城，佛山沧桑的历程尽书于一诗。

正是这一缕情怀的牵挂，让塔坡寺得以在明代天启七年（1627年）重生。明初制定的佛教政策渐渐废弛，佛山乡民自发重建塔坡寺。新的塔坡寺选址于医灵铺万寿巷（现新风路佛山市委党校所在地），更名为经堂古寺，隔着时空与东晋昙摩耶舍的经堂遥遥呼应。而原先塔坡寺旧址，则建造了一座祭祀道教东岳大帝的小庙，称为塔坡庙。2013年塔坡庙重修时，又将其恢复为塔坡寺。如今的塔坡寺虽然是佛教建筑，但外观却是广府地区道教建筑的样式，也是一奇。

佛山得名于唐，兴盛于宋，崛起则是在明清之际。佛山在变，这座城市的历史恰好与佛门的兴衰高度吻合。

“佛”与人
——文武双全的佛门

塔坡寺重建数十年之后，明代走到尽头。明清易代之际，“佛”为佛山带来了新的荣光。

广东作为抵抗清军的最后主战场，吸引了一批不愿仕清的遗民来此出家避仕，更有身怀武艺的少林寺僧人和弟子进入广佛地区组织抗清队伍；清军定岭南之后，坐镇广州的平南王尚可喜崇尚佛教，佛山就此成为南派武术的发源地，涌现出一大批有国际影响的武术家和武术组织，谁没听说过黄飞鸿、叶问和李小龙？谁不知道洪拳、咏春拳呢？他们都属于佛山，佛山也是中国唯一的武术之城。明末外来武术进入佛山，常带着反清复明的使命，所以武术流派的创立，往往伴随着帮会组织的成立，发展到清末，还成为反清不可小觑的势力。

佛山与清朝的关系很纠结。这座城市虽有反骨，但在清代还是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城市如此，佛教也是如此。康熙年间，明末文人士子投身寺庵，让佛寺的面貌为之一新。“岭南三君”之一，诗人屈大均，就是众多曾出家为僧的文人中的一个。佛教在佛山的社会地位，因此一路走高。

岭南七子之一的程可则，在清顺治九年（1652年）取得会试第一的成绩，却被以“背戾经旨”为由除名，内心苦闷之际，高僧天然和尚作《复程周量中翰》一文，以佛教的“苦谛”、“集谛”和“道谛”对他进行开导，告诉他通过修行断除痛苦，得到

解脱。这段儒释两派的交往，被传为佳话。儒释合流让岭南文人士绅成为佛教的坚定支持者，佛山也变得更有文化了。

其实，佛山出身乡堡，经济虽日渐发达，但文化上总是相对落后，明代才开始有社学教育，明清之前甚至没有本地文献记录，但进入清代却有了长足发展，不但留下大量诗文传世，还出现许多记录佛山地区法律、政令、行业、营造等内容的碑刻，更以乡镇之大，先后编纂了三部地方志——乾隆、道光和民国版本的《佛山忠义乡志》，是地域单位最小的方志，在中国方志史上十分少见。

佛门文武双全，赢得了佛山百姓的尊崇。光绪三年（1877年），佛山地方士绅代表的世俗社会与佛教界通力合作，再修经堂古寺（新塔坡寺），这一次重建了法王殿、韦陀殿、地藏殿、天王殿等17个建筑，全寺占地约20亩，寺僧一度多达500余人。重建完工不久后，恰逢慈禧太后生日，广州华林古寺方丈释勤安进京祝寿，陈述了塔坡寺的历史和佛山得名来历，慈禧随即下懿旨"赏《龙藏全经》暨珍物还镇山门，并赐寺名曰'万寿塔坡禅寺'"。得到了赐名和镇门珍宝，塔坡寺佛教地位直线上升，佛山这个远在岭南的蕞尔之地，也与

佛门真传

锅耳房、天井院、咏春拳……在佛山不难看到这样的民居小景。这座城市还是四海闻名的武术之乡，宗师辈出。佛山武术源出南少林，通过佛门传向民间，演绎出最强的岭南功夫。供图/东方IC





神明多多益善
佛山人精明，在信仰上也务实。为了得到更多护佑，他们拜佛也敬神，多种宗教，多元共存。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到“神”字店招，那是卖香火供品的小店，满足日常敬神的需要，这也成了佛城的一大特色。

中央政府直接发生了关联。

至道光年间，佛山共有佛庵28所，以塔坡寺、仁寿寺、德寿寺和三元寺“四大丛林”为首，大小寺庵林立，星布于不足20平方公里的面积里，可谓“家家如来佛，人人观世音”，时人称之为“禅城”和“佛地”。佛山这个地名也更加名副其实。

“佛”与商——神多以“生财”

在古塔坡寺藏身的小巷里，批八字、卖祭祀用品的铺子外，可以看到一幅红色的店招，上面用金黄的丝线绣了个大大的“神”字，底下是两排清晰的小字：神通广大，有求必应。塔坡寺里既供佛又供“塔坡公”，这塔坡公其实是位神仙。

据民国版《佛山忠义乡志》记载：“六月初六，普君神诞，凡列肆于普君墟者以次率钱演剧，几一月乃毕。”这里说的普君神诞也叫“塔坡诞”，每逢这个节庆，附近几条街都装饰成了花街，贺诞活动最长的延续整个月，可见其盛况。如今的佛山，也恢复了这项民俗庆典，塔坡诞最隆重的活动是“祭水”。主持塔坡诞的人在喊过“起水”号后，会用传统的木桶打起塔坡古井里的水，倒入古时传水专用的铜磬中，再汇入一只巨大的铜鼎，供众人沐手祈福，所谓“洗过塔坡水，顺风又顺水”。

对佛教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三宝——“佛、法、僧”，追求的是参悟佛学真谛，也重视清修。清修最喜佳山水，佛山虽然山水上佳，但其地理环境却又有特殊之处。

佛山位于西江和北江交汇之地，上溯湞水，可抵达陕西、湖南、湖北以及长江下游一带以至北京；西接肇庆、梧州，可通川桂云贵；下连顺德、新会通江门、澳门，东达番禺、东莞，又有汾江、东平河直通广州……八方通衢之地，自古便有浓厚的商贸意识。自宋代起，受海洋贸易的影响，佛山开始向商业社会转变，出现最早的墟市，塔坡冈一带也因塔坡寺香火旺盛之故，曾经形成商业交易中心——塔坡墟。至今塔坡社区一带的街道，仍保留着京果街、蓑衣街、线香街、卖箩巷等地名，足见当时佛山行业化和商业化的程度。明天启年间重建塔坡寺时，也是考虑塔坡墟影响佛门清修，才“迁地为良”。

塔坡寺迁走了，更加贴近红尘烟火的东岳庙来了。这还不是全部，外乡外省商贾纷纷前来佛山开店经商，江面之上货船往来络绎不绝，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和商会，也形成了各种行业神和信仰神的崇拜，北帝、盘



古、天后、城隍、财神、火神，甚至耶稣基督，不一而足。每逢各种神诞之时，均有对应的赛神祭祀活动，在虔诚求神、娱神娱人的同时，也抓紧一切机会进行买卖交易。

禅城区金鱼街通济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引人注目的现代雕塑——大棵生菜。生菜雕塑取材自佛山地区每年正月十六的“行通济”，每年正月十六正式开工开业之前，都会扶老携幼走一遍通济桥，俗语说“行通济，无闭翳”。行通济的时候，人们会购买一包两棵生菜，或敬神佛，或带回家祈福。向一棵生菜祈福，佛山的信仰之多元，可谓空前绝后。

就像塔坡寺三佛与塔坡公和谐共处一样，佛山的佛教也很自然地接纳了其他宗教，从未产生过任何宗教冲突。佛山是广东著名的商埠，至今仍是最富庶的城市，众神云集于此，护佑和见证着这一处人间烟火。

如今，佛山最负盛名的寺庙乃是一座“北帝庙”，也称佛山“祖庙”。既敬神、也敬祖，还敬佛。

祖庙的碑刻长廊里，存有《重修佛山塔坡古庙碑记》，诉说了三尊铜佛显灵的圣迹。一位老人牵着小孙子，用手点着上面的文字，娓娓讲述，小孙子脑袋一点一点，听得懵懵懂懂，最后总结性地问了一句:“爷爷，我们佛山是不是很威水（威风）呀？”“当然威啦！我们佛山人都好威的！”祖孙关于佛山之“佛”的对话，其实与宗教无关，那是历史已经渗透进佛山人的血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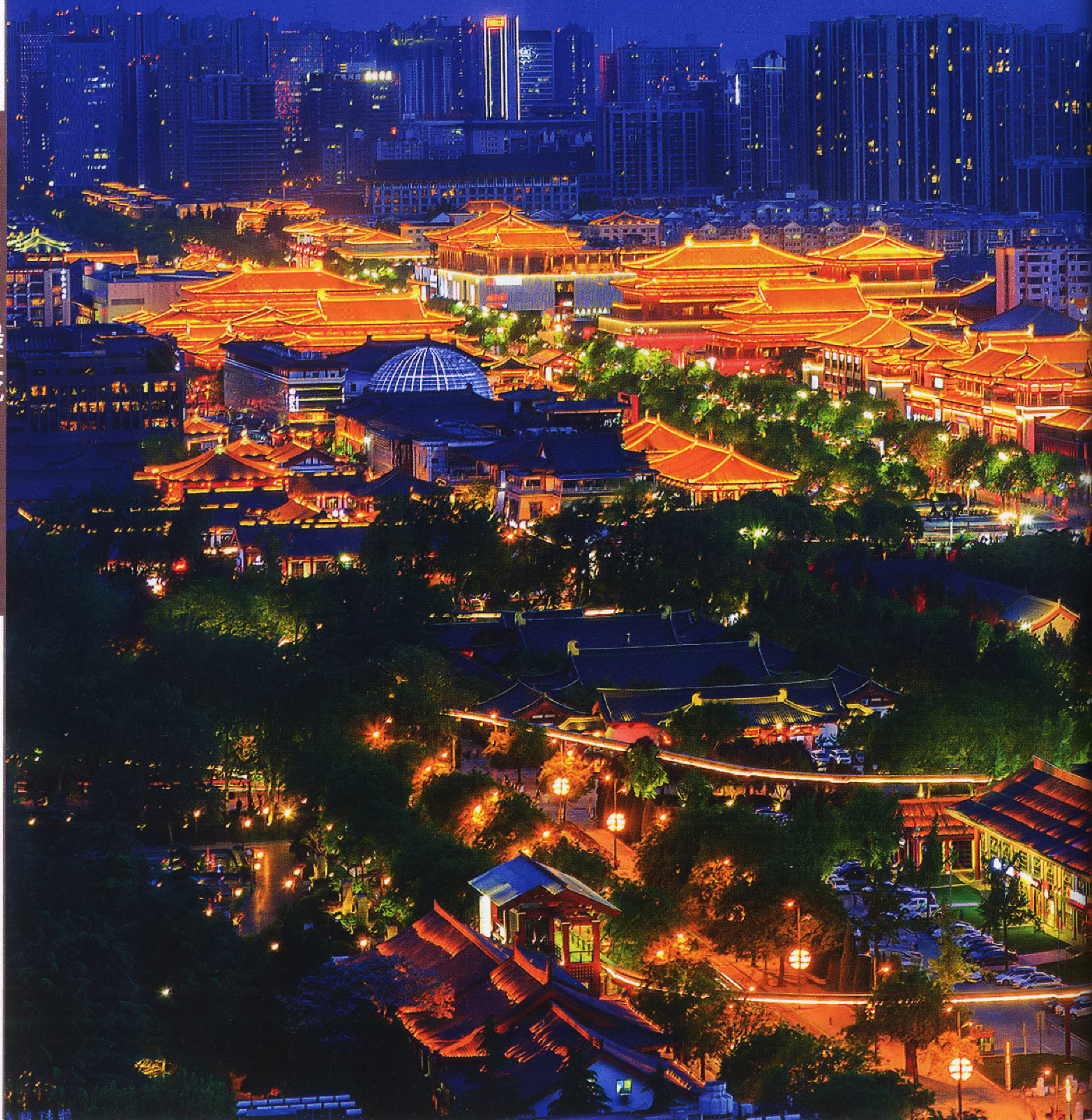
祖庙“三合一”
在佛山地区供祀祖先的“祖庙”中，依然可以看到众神的身影。上图为佛山三水区的胥江祖庙，它由北座观音庙（释）、中座武当行宫（道）以及南座文昌宫（儒）三座建筑合体，屋脊布满和谐瑰丽的装饰，屋檐下方悬挂串串盘香，共同描摹着佛山人的精神世界。
供图/东方IC

责任编辑/刘睿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杨东海

古都的诗意

撰文／迦陵千叶 李怡淙

一个人的名字重要，那是关于他的自我“预言”。一个地方的名字，似乎也一样。





盛唐的背影

“长安本秦之乡名，高祖作都”，传梁、陈间人所作《三辅黄图》中记载了“长安”二字的来历。高祖刘邦的本意为“欲其子孙长安都于此也”，刘氏子孙也没有辜负祖辈的愿望，在这里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盛世。然而风云变幻，汉室终将走向倾覆。几经易手后，都城最繁盛的时期，还是出现在唐王朝。如今的我们提起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更多的情感，还是对那个积极进取的民族与包容开放的时代的骄傲。图为陕西省西安市俯瞰夜景，大雁塔傲然伫立，远处的群山，仍然凝望着这座古老的城市。

供图／视觉中国

长安万象

历史上的都城有很多，却没有哪个能像唐长安城一样包罗万象，被人们以不同的视角来诠释。“绮殿千寻起”是执政于宫禁中的帝王李世民眼中的长安；“百千家似围棋局”是关注民生的白居易眼中的长安；而“宿空房，秋夜长”则是终老于深宫的女子眼中的长安。百官朝奏、万邦觐见、市井生息、流民悲叹……“长安”所传达出的意蕴，也由此古朴而凝重、繁盛而落寞。下图为《大明宫传奇》中3D制作的长安城。

供图/视觉中国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气质，城市也如此，却又不仅如此。

诗人尹丽川曾说，一下雪，北京就成了北平，皑皑白雪覆盖着紫禁城角楼的琉璃瓦顶，飘落在结了冰的护城河上。天地间苍茫寂静，仿佛也只有这座孤独的宫殿。仿佛这座宫殿，与这个城市，都回到了那业已远去的岁月里。你看，北京与北平，虽一字之差，给人留下的却是不同的记忆。

一个城市曾经的名字，盘桓在当下的城市上空，像是被施了法术，锁在了属于它的时代里。但只要念起它，就如同仙人捻了诀，诵起了召唤的经咒。时空交叠落错间，那个城市的旧灵魂，就带着满身回忆，从历史中挣脱出来。

比如，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

唐诗·长安记忆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在长安城里。

——王小波《万寿寺》

王小波说，长安是诗意的。可究竟什么算作诗意？

诗意，就是诗的意境。听起来有些缥缈的意味。《国语词典》中解释：那是“足以让人吟咏的情味”。这样的情味，有许多种，长安的诗意或许在强汉盛唐的宏大与繁华中，也在最终王朝覆灭后，乐游原的苍凉与沉郁里。几千年风沙吹拂，让它在人们心中足够古老，老得像是大雁塔后的沉沉欲坠的落日，但总归也是有着曾经辉煌四方的底气。那便是帝乡。

长庆元年（821年）的一天，夜色



苍苍，五十岁的白居易已坐在马上，等候在新昌里的坊门前。此刻的长安还在夜禁，除了在坊外巡视的左右街吏与金吾卫，无人能在外走动。夹道两侧的高大槐树，被稀薄的月光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街鼓隐约传来，在长安城上空回荡，这座当世最伟大的帝国中，最庞大、最繁华的城市，就要苏醒了。

如果从空中俯瞰，在中国大陆上，有一道将南北一分为二的山脉——秦岭。司马迁在《史记》中写“秦岭，天下之大阻”。而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又在这片大陆的中心地带。

它的南边，是逶迤千里秦岭，秦岭里有着李白的“终南捷径”与王维的“辋川别业”。仙乡与长安城交相辉映。在夜色中，秦岭有如青黑色的羽翼，揽住了关中平原。长安的东边则是滚滚黄河，西面是高耸入云的陇山，北面是泾渭水系的分水岭北山山系。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屏障，为长安阻隔了刀兵的威胁，得以雄踞关中，虎视中原。

但作为都城，这还不够。拱卫长安的秦岭，被《周易》称为龙脉，秦岭的王气令帝王们留恋，从西周到唐朝，已经做了13朝的王都。偏巧它又有着肥沃的土地和“八水绕长安”（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条河流）的丰富水系，使得这里农业发达。是当时真正的天府之国。

这座固若金汤的长安城，也有着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宏大与规整。

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外城郭组成，在它的南北中轴线上，是那条世上最宽阔的通衢大道。这条街在皇城之南，因风水星宿而定为朱雀大街。上百个里坊以朱雀大街为轴，分列两侧，呈棋盘式。“门巷修直，居室栉比。”白居易形容这一独特规整的布局为“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每个里坊间，则有街道相通。在郭城西城墙最北面的一座城门叫做开元门，这里便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中轴线左右各有东市和西市，大唐向来有着包罗天下的自信，唐太宗就曾说:“自古帝王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西市，是蕃商集中进行交易的地方，也是可窥见唐代开放的一个微小坐标。《太平广记》里提及，西市有胡店、波斯店等，主要做着珠宝与香药的生意。

白居易所住的新昌里，位于朱雀大街东四街东自北向南八坊，这里距离大明宫并不近。上朝的官员需在五更五点前进入宫门，但夜禁后人们不可出坊。为此，他需要早早在街鼓响起前准备，待坊门开启，一路疾行入宫。

晓鼓隆隆，坊正开启坊门，其后京城门、皇城门、宫殿门次第开启。上朝、赶路或有急务的人们鱼贯而出，像是锁链，在清晨里拉动着庞大帝国的转动。

山水的壮丽宫殿的宏伟，总能激发诗人的自豪感，只是此刻，经安史之乱，李白笔下的盛唐已经渐渐远去，不知白居易望见承天门的时候，是否还会怀念一百年前“承天门上宴”的富庶时代——那是先天二年（713年）九月十九日，初登帝位的唐玄宗，于承天门宴请王公百僚，并令左右侍从在楼下撒放金钱，中书省、门下省五品以上官员及各衙门三品以上官员争着拾取，此外，仍然按等级赐物。

承天门下的金钱、曲江池畔的丽人，曾经的盛况总叫人难以割舍，在笔下描画了又描画，勾勒出了亦真亦幻的盛唐。又将这盛世附身在了带着“长治久安”这一美好希冀的长安上。

宋词·临安春雨

我第一次感到西湖的柔媚，有一种体贴入微的姬妾式的温柔，略带着点小家气，不是叫人觉得难以消化的。中国士大夫两千年来的绮梦就在这里了。

——张爱玲《异乡记》

如果说长安的诗意总带有关中厚重的豪放气韵，那么临安（今江苏省杭州市）的诗意则是江南杏花春雨的婉约。而说到临安，绕不开的总是西湖。

不寻常的故事一定会发生在同样不凡的地方，很多作家都这样相信。张爱玲对于西湖就有着特别的执念。

在她7岁时写的第2本小说里，小小的张爱玲在书中安排一位失恋女郎在西湖自溺。对于这一情节，她的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而张爱玲却在18岁时写下散文《天才梦》回忆此事，解释道：“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年仅7岁的张爱玲，就意识到西湖的诗意。这种诗意，几乎无需出示太多证据。

与长治久安的长安不同，临安之名多少有些无奈的意味。

公元1127年，金人南下，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沦陷。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掳走，北宋就此灭亡。康王赵构登基，改号建炎，史称南宋。

赵构的日子过得并不安稳，内忧外患，一路似乎都在逃难。宋建炎三年（1129），升杭州为临安府，称之为行在。既是行在，那便是“临安”此地，并无久留之意。仍怀着收复失地北定中原的决心。而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终于定都临安。

临安这个名字，并不是到这时才有的，“临安”县名始于晋太康元年（280年）。

陆擎宇认为：“在杭州当时下辖的诸县中，恰有‘临安’这个县名具有巧合性的字面含义，可以彰显出高宗所希望表达的特定政治意义。所以说，‘临安’府名是当地已有地名与特定政治寓意的结合。”

也许是临安太过美丽富庶，西湖的水又总是泛着柔情。从帝王到百姓，都醉倒在这人间天堂里。市列珠玑，户盈罗绮，什么家仇国恨，都忘了罢。

这一切大概令诗人林升忧虑，便有了那首《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所以南宋走到最后，也没能北上。

宋高宗也许是继承了宋徽宗的艺术天分，他同样钟情于书画，宋室南迁后，很快恢复了皇家画院，而西湖的美景，更是给画师们提供了最精妙的素材。哪怕是没踏足过杭州的今人，也都可以历数西湖十景：断桥残雪、曲院风荷、雷峰夕照、南屏晚钟……

这诗意的名字，也出自南宋画师们的手笔。

按照画院的传统，画师将湖光山色落在纸上后，还要有个诗意的题名。这



些题名多凝练雅致，叫人难忘。于是，在“南宋四大家”马远等人的山水画卷上，就留下了这些贴切的题名。

但临安的风景，并非只是自然的鬼斧神工，更有人类造就的人工之美。位列西湖十景之首的苏堤春晓，便是其一。苏堤南起南屏山麓，北至栖霞岭下。寒冬过后，其上杨柳夹岸，桃花灼灼，令人心动。这里原本没有堤岸，最初是北宋诗人苏轼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挖出的湖泥葑草堆筑成的。浚治湖水，是出于实用功能的考量，而后来苏堤的春色，则是一代代人们，从审美出发，制造出来的。

仿佛是注定一般，八百多年后，南宋的画院早已不在，但杭州出现了国立艺术院。1928年春，六十岁的蔡元培专程赶赴杭州，出席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国立艺术院的开学典礼。并作题为《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开学演讲，他说:“自然美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爱美欲望，所以必定要于自然美外有人造美。艺术是创造美的，实现美的，西湖既有自然美，必定要再加上人造美，所以大学院在此地设立艺术院。”

是啊，既然是“中国士大夫两千年来的绮梦”，这里如何能不为文人寄托诗意的精神，又反过来，被文人的审美取向所影响呢?

只可惜，南宋临安的绮梦不过一百余年，就如平湖里的秋月，被竹篙轻轻一搅便碎了。

长安、临安，一南一北，遥遥相对。它们曾各自伴随大唐与南宋走过繁华，也见证了王朝最终的倾颓。这两个名字并未彻底消失，西安今有长安区，杭州亦有临安区。过去的记忆，与它们曾经的名字一起，永远居住在那里。

玉带晴虹

上图中的桥是西湖玉带桥，天朗气清的时候，桥身倒影在平静的湖面上，仿若彩虹，因而这一景叫做玉带晴虹。这一带，葬着南宋时的抗金名将岳飞。岳飞之死，似乎就已预示着南宋之死。

供图／视觉中国

责任编辑／黄鑫
图片编辑／陈敬哲
版式设计／杨东海

中山家乡名中山

以革命者和烈士为名的地名，在近现代中国非常常见。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为了纪念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故乡广东省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今中山市）。全国各大城市内的中山公园、中山路，也都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图为中山市南的孙文纪念公园，园内，中山先生威严的塑像俯视着整个城市。

摄影 / 张鉴来

人名地名为谁设?

撰文／李旭东

葭萌之邑，白帝之城。人名地名，是一份纪念，又不仅仅限于纪念。解读人名地名，解读的是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变迁。



古蜀有葭萌
四川省广元市的昭化古城，原是先秦时古蜀国苴侯的封地葭萌，因苴侯名叫“葭萌”而得名。这里是东汉末年刘备入川的第一站，《三国演义》中张飞夜战马超的战场。上图为昭化古城中的一座牌坊，“葭萌”这个古地名被镌刻在坊额之上，诉说着当地的悠久历史。
供图/视觉中国

东汉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刚刚率军入驻绵竹城（今四川绵竹），人马尚未休整，就接到了探子送来的紧急军情：“汉中的张鲁派大将马超与我军孟达和霍峻两位将军交战，两位抵挡不住，请求火速救援！”刘备于是派张飞前去助阵。张飞与马超都是英武善战之人，一见面，“两马齐出，两枪并举，约战百余合，不分胜负”。两位将军从白天打到了黑夜，从黑夜又打到第二天天明。马战、步战、刀枪箭弩，齐齐上阵，堪称《三国演义》里最让人血脉偾张的一场单挑。

这场单挑的战场在哪里？

葭萌关。此关设在蜀郡葭萌县（今四川广元西南），故而得名。葭（jiā）萌，一个奇特的名字，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呢？



“葭萌”不再属葭萌

葭萌其实是个人。据《华阳国志》记载，他是古蜀开明王朝末代蜀王的亲弟弟，被封为“苴（chá）侯”，葭萌既是他的名字，也是他的封邑。

时间回到公元前316年，以葭萌为目的地的一支军队，正行进在秦都咸阳通往蜀地的子午道上。挂帅者是秦相张仪，能征惯战的将军司马错也在队伍当中。他们前往葭萌，是来为苴侯和巴国助阵，与蜀王军队作战的。

苴侯和蜀王是兄弟，怎么打起来了？原来，苴侯和哥哥的关系并不亲密，反而和巴国的国君是好朋友。蜀国和巴国虽是邻居，却也是世仇。弟弟和仇家交往密切，蜀王当然无法容忍。于是，一场兄弟阋墙的大战在葭萌爆发。苴侯占据地利，但兵力不及蜀王，很快就无力抵抗了。他逃往巴国，和巴王一起向秦惠文王求救。

秦军一路势如破竹，不但大败驻扎在葭萌的蜀军。连蜀王都被秦军围困，惨死在了彭山（今四川眉山彭山区东北）。哥哥死了，苴侯可以放心回到葭萌了吧？非也。秦惠文王其实早就看中了巴蜀一带的富饶，苴侯的求救正好给了他机会。灭蜀之后，秦军马上掉头进攻巴国，引狼入室的苴侯和巴王，都成了秦惠文王的阶下囚。

本来，用苴侯的本名“葭萌”做地名，是周代封土建国制度下，体现土地所有权的方式之一。秦惠文王灭蜀后，苴侯的葭萌成为秦王的领土、秦国的属县。从葭萌邑到葭萌县，体现的是统治秩序、行政制度的改变。人名地名背后最初的封邑意义，随着古蜀国的灭亡，消失在历史当中，只能借着葭萌之名，略窥一二。

为卢仙设县

封建制崩溃后，不再需要以封主之名命名土地，宣示主权，那是否意味着人名地名就不再存在了呢？事实并非如此。新的统治秩序建立后，也会造就新的社会风尚，而这些改变，



因彭祖而彭城

传说中善于修身养性的彭祖，是上古帝王尧的名臣，他历经尧舜时期，一直活到商朝，是古代传说中著名的长寿老人。今江苏省徐州市古名“彭城”，因曾是彭祖封地而得名。上图为江苏徐州彭园景区的彭祖石像。

供图/视觉中国

也体现在了人名地名当中。

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将秦函谷关附近的土地划分成一个新的郡：弘农郡。新郡的设立，是汉武帝巩固并扩大关中区域的“广关”政策的一部分。而新郡的辖县中，有一个县的县名颇有意思：卢氏（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顾名思义，这个县名源自一位姓卢的人。卢氏是谁?

答案要从秦始皇访仙说起。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在碣石一带巡游，派方士卢生出海，“求羡门、高誓”。这位卢生是“燕人”，居于范阳涿郡（今河北涿州），在《淮南子》里名叫卢敖，他就是“卢氏县”名中的卢氏。

卢生奉旨遨游北海，回来之后上奏秦始皇，说自己访仙山、遇神仙，并在仙书中发现了关乎大秦帝国命运的秘密:“亡秦者胡也。”秦始皇认定，“胡”代表的是北方胡人。于是命蒙恬将军发兵三十万，北击胡人。而卢生带回的谶语本意，并非如此。“胡”是秦二世胡亥，在他在位时，天下大乱，秦王朝走向了尽头。

秦亡之后，卢生逃出咸阳，来到了秦岭东段的熊耳山隐居避世。传说中，卢生在熊耳山采药炼丹，并最终修成正果，位列仙班。按照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熊耳山一带“汉因卢敖得仙，始置卢氏县”。

传说中，卢敖曾在卢氏县当地救治瘟疫，活人无数。以他的名字为地名首先是出于当地百姓对他的爱戴与纪念。还有别的原因吗?有!卢氏县设县取名，在汉武帝时。而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也是一位热衷于长生不老、访药求仙的皇帝。见过神仙、自己也成为了神仙的卢敖，显然是汉武帝所憧憬与向往的。以卢氏为地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汉武帝乃至整个汉魏时代的热衷求仙的社会风气。

“白帝”究竟是谁?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社会历史的进程，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朝代的更迭，统治者变迁。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是否会体现在人名地名上呢?很难。中国地名与西方不同，帝王很少会出现在地名当中。即使出现，也只是以“某皇”“某帝”来称呼，而非姓名。所以俄罗斯有以女皇命名的叶卡捷琳堡，中国却没有武则天城。

为何?中国传统是靠“避讳”来体现帝王的崇高地位并表达尊敬之心的。“避讳”避开的就是名字，所以当通用的地名里出现了和皇帝名字相同的字时，要么干脆换掉，要么缺笔书写。怎么可能出现用皇帝真实姓名来命名的地方呢。

正因为不具实名，“某皇”“某帝”随着时间的推移，真正身份会逐渐变得模糊，甚至被人们混淆。位于重庆

奉节县瞿塘峡口的白帝山上，是著名的“白帝城”。白帝城内建有白帝庙，里面供着谁？主祀刘备，陪祀诸葛亮、关羽和张飞。难道“白帝”是刘备？这可就大错特错了。

新莽末年，蜀郡的太守公孙述以复兴汉室为名，割据一方。当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后，公孙述也不甘寂寞，自立为王，并在长江北岸的山上营建都城，城中有一口井，冒出如腾龙般的白气。公孙述认为这是吉兆，于是以白色为贵，自称“白帝”，都城也被命名为“白帝城”。

“白帝”公孙述的割据政权，在建武十二年（36年）走到了尽头。公孙述战死，但白帝城依旧在，像是用地名留住他曾有过的“帝王”之尊。白帝庙内的塑像，最初就是公孙述这位真白帝。当地人祭祀他，是为了纪念他在乱世保全蜀地居民的功绩。那为何如今白帝庙里会供奉刘关张呢？这出自明朝人的手笔。

正德五年（1510年），庙内公孙述的塑像被捣毁，嘉靖十一年（1532年），时任四川督抚的朱廷立在庙内改塑刘备和诸葛亮的塑像，以纪念刘备白帝城

白帝建此城

重庆奉节县瞿塘峡口长江北岸的白帝城，是西汉末年由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建造的。公孙述自立为王，以白色为贵，号称“白帝”。白帝城是三峡西口，入川的门户。下图为从空中俯瞰的白帝城。因三峡水库建立，长江水位上涨，白帝城已成为一个四面环水的江中孤岛。

供图／视觉中国

白帝城

托孤的历史。后来，关羽和张飞也被“请”入庙中，白帝庙的格局，从此成为定局。

白帝城白帝庙里的“白帝”，从公孙述变成刘备，反映的是社会风气、意识形态的转变。明代从朱元璋建国以后，一直致力于强化皇权和礼法，构建以理学为尊的社会秩序。而忠义正是这种社会秩序的核心。公孙述这位“白帝”，虽曾造福百姓，但割据称帝的行为在理学家眼里，无疑是“乱臣贼子”，不应得到祭祀。而刘备与关、张、诸葛，是“明君良臣，千古垂范”，符合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朱廷立是大儒王守仁的弟子，人称“朱夫子”，由他出面，在白帝庙改祀刘备，理所当然。

路牌上的纪念碑

当时间走到民国，因中西方思想的交流与碰撞，西方重视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并以此为英雄设地名的风尚，渐渐为国人所接受。近代中国多舛的命运造就了无数英烈，如何纪念那些为了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先驱和烈士？英烈地名，成了镌刻在人们心中的丰碑。

北京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里，有一封在1946年9月7日由时任北平市长的熊斌发出的信函，信中这样写道：

“接展大函，嘱将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三先烈，列入本市街道名称，冀作永久纪念。事关表彰忠烈，自应照办。兹将本市南沟沿改为麟阁路，北沟沿改为登禹路，铁狮子胡同改为自忠路。除交工务、警察两局照办外，相应函复，即希察照为荷。”

赵、佟、张均为抗日烈士，信中所说的“表彰忠烈”和“冀作永久纪念”，就是以英烈名字作为地名的意义所在。根据这封信函可知，最初准备以烈士命名北京市道路时，是没有冠姓的。这与中国传统较少使用三字地名有关。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其家乡香山县改名中山县，没有冠姓。1946年2月，蒙江县为纪念东北抗联的杨靖宇将军而改名为靖宇县，同样没有冠姓。

1946年11月，北平市临时参议会宣布决议：“查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三位将军为国成仁，忠勇可钦。拟将本市铁狮子胡同改称张自忠路，北沟沿改称佟麟阁路，南沟沿改称赵登禹路，以资纪念。”新更的街道名根据议员们的意见，保留了英烈姓氏，目的是避免发生“仅用其名而遗其姓，年代稍久，即不知为何人”的情况。最终更名后，佟路在南，赵路在北，格局保留至今。

英烈地名是近现代中国地名对西方地名命名方式的吸收借鉴，但同时也体现着中国人独有的文化价值取向。西方的英雄人物是否能为一地命名，看的是其个人奋斗所取得的成就，是否受到广泛认可。在拜金主义的影响下，百万富翁同样可以成为英雄。而英烈地名所纪念的，是为国家民族献身的崇高精神，这种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

以人名为地名，最初的目的无疑是纪念其人其地。但人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存在于历史大时代当中。不同时代的统治思想与社会风尚，决定了什么样的人会得到纪念，并成为一地之名。人名地名里，藏着社会与历史的变迁。

责任编辑／周玥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杨东海

靖宇县

青山埋忠骨

名人葬地以人名为名自古有之。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烈士牺牲的地方，都以烈士之名命名，以示缅怀。1946年2月，吉林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以纪念抗战时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图为靖宇县内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纪念塔高耸，苍松翠柏环绕，一派庄严肃穆。

供图 / 视觉中国

地名里的民族之声

撰文／郭晔旻

翻开地图，往往发现不少汉字地名无法用汉语解释，如门隅、阿勒泰、凯里等。仔细分析，不难看出这是汉语对其他民族语地名的音译。语言学界将中国的民族语言划分为五大语系，其中汉藏语系与阿尔泰语系包括的语言最多。本页以这两大语系所囊括的六大语族为线索，展示部分民族语地名，从中可略知少数民族的命名思路。



责任编辑／张舒羽
版式设计／刘扬



（参考资料：杨立权、张清华《中国少数民族语地名概说》）



一"战"成"名"

上古时代也是传说时代。地名是人们追寻、凭吊那段古史的线索之一。相传，黄帝大败蚩尤于中冀（河北中部）涿鹿之野，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如今的河北涿鹿县正式定名于汉代，也是传说中的古战场。图为涿鹿黄帝陵中的"合符坛"，九龙腾飞的巨形雕塑，是为了纪念涿鹿大战后黄帝与各部族首领会盟议事的传说。

摄影/董桂军

传说地名

“真”“神”“奇”

撰文／纵节

未至其地，先闻其名。许多“大名鼎鼎”的地名，都取自民间传说，半真半假，亦真亦幻，却一样可以记载一方历史。就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些地名的“真”“神”“奇”。

传说也能当“真”吗？

传说，大多虚无缥缈，难以“眼见为实”。不过，凡事总有例外。

四川资阳的安岳县，位于成都至重庆的古道上，古代称作普州。上世纪80年代，四川省文物鉴定组来到安岳县八庙乡，寻找流传于百姓口中的神秘的“卧佛沟”。相传在这偏僻的山沟里，藏着一座唐开元年间建造的卧佛院。可沟中哪有半点佛刹的影子？

八百多米长的山沟，草木茂盛，两面崖壁相距百米左右，被林木遮盖。当文物组的专家拨开北壁上的杂草时，一尊长达23米的卧佛露出真容。佛像静静躺卧着，曲眉丰颐，雍容慈祥，既巨大又与众不同。卧佛也称“释迦牟尼涅槃像”，大多遵循佛经记载，面向右方，而此处却因地制宜，使佛像面左而卧，十分特立独行。

在佛像下方，还围绕着大小不等的82个石刻龛窟，造像计有1000多尊，众佛拱卫着释迦像。原来真有“卧佛院”！在持续不断的搜寻下，双侧崖壁上又现出16座经洞，洞中三面刻有经文，有的是后世经典，有的是稀世绝版，共达40余万字。满壁整齐排列的石经，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装饰美，也只有北京云居寺藏经洞内的满经文石板，可与它比较。

一个传说的地名，揭开了一个大大的唐朝“佛”世界。由地名去寻找古迹，去印证传说的真与伪，安岳“卧佛沟”并不是先河。

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关于夏的开国君王——大禹的传说家喻户晓。考古学者寻找夏朝的努力，在上世纪中期得到重要的机遇，这也是地名的贡献。

1959年4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爬梳先秦史料，对七十多条关于地名的记载进行比较，以探寻“夏墟”的踪迹，最终两片区域吸引了徐老的视线：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登封、禹县附近；第二是山西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

《汉书·地理志》注引《世本》、《纪年》都说禹居阳城，《孟子·万章》也有“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的说法，所以“阳城”可算夏禹之都了。

这个阳城在哪里？史籍上总把它与“颍川（颍河）”联系在一起。而今登封县东南的告成镇即在颍水河畔，附近还有标志地——箕山和五渡河，无不与文献相符。

汉朝的阳城县经历魏、晋、南北朝、隋，直到唐代才更名为“告成县”。今天的告城镇北门外百余步，即有一座周公测景台，附近采集的战国陶器上有“阳城仓器”的字样，如此看来，此城在战国初年即被称为“阳城”了。那么，这里会是夏都“阳城”吗？

地不爱宝。告成镇的西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有片被当地人称作“王城岗”的地方，这里发掘出了

在王城岗寻找“夏朝”

河南的登封市告成镇古称阳城，这恰好与传说中夏朝开创者大禹的都城名称相符，因而吸引了考古学者的探索。从古镇附近的王城岗一带发掘出城墙遗址和大量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文物，迈出了寻找夏朝的重要一步。下图即为王城岗遗址出土的灰陶鼎。

供图/FOTOE





大量印着绳纹、方格纹的古朴陶片和遗迹，分别属于距今五千至七千年的仰韶文化，以及距今四千年多年的龙山文化。其中一段长20余米的夯土墙，尤其引人注目，它约有四千多岁的高龄，和传说中的“夏时代”比较接近，这让考古学者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此后，面积万余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古城也显露出来，城中一处高地上的夯土建筑遗址中，挖出骇人的13处祭奠坑，这被认为是祭祀建筑的象征，也是高级城市的标志。

古城里的居民还会使用金属器：在一处灰坑中，除了一件由锡铅青铜铸造的铜鬶残片，不仅构造复杂，而且是用复杂的“合范法”铸造的，有内范，有外范，经过了套合和榫接的工艺，器壁薄处仅仅3毫米……

更有趣的是，此城又分为两城，东城修筑得早，但可能被五渡河西移而冲毁，住民又利用东城的西墙，作为西城的东墙另起新城。大禹治水的传说我们耳熟能详，这失而复建的古城和那场著名的大洪水，也冥冥中存在着某种联系吧?

发掘者认为，这座“有内涵”的古城应该就是夏都阳城。这处遗址的发现，不仅是登封“告成”的古地名

卧佛沟的宝藏

相传，四川资阳安岳县境内的卧佛沟里，有座宏伟的卧佛院。人们在寻找它的踪迹时，意外发现一尊巨大的卧佛，以及刻有数十万字经文的石经洞，才知道卧佛沟的地名“名不虚传”。2015年，四川省政府决定将其所在的八庙乡撤改为卧佛镇。摄影/袁蓉荪

帮了忙，“王城岗”这显赫的名字也不是白叫的。从地名当中，不仅可以追寻到有形的文物，还能发掘未知的真相。

宝鸡宝鸡，我的“神”

“八百里秦川”西端的著名工业城市——宝鸡，在历史上的地位虽不及东邻西安显赫，但也颇为辉煌，是周、秦两大王朝的初兴之地、祖庙所在。与这一身份不太相称的是“宝鸡”这个地名，缺了几分古雅，少了几分庄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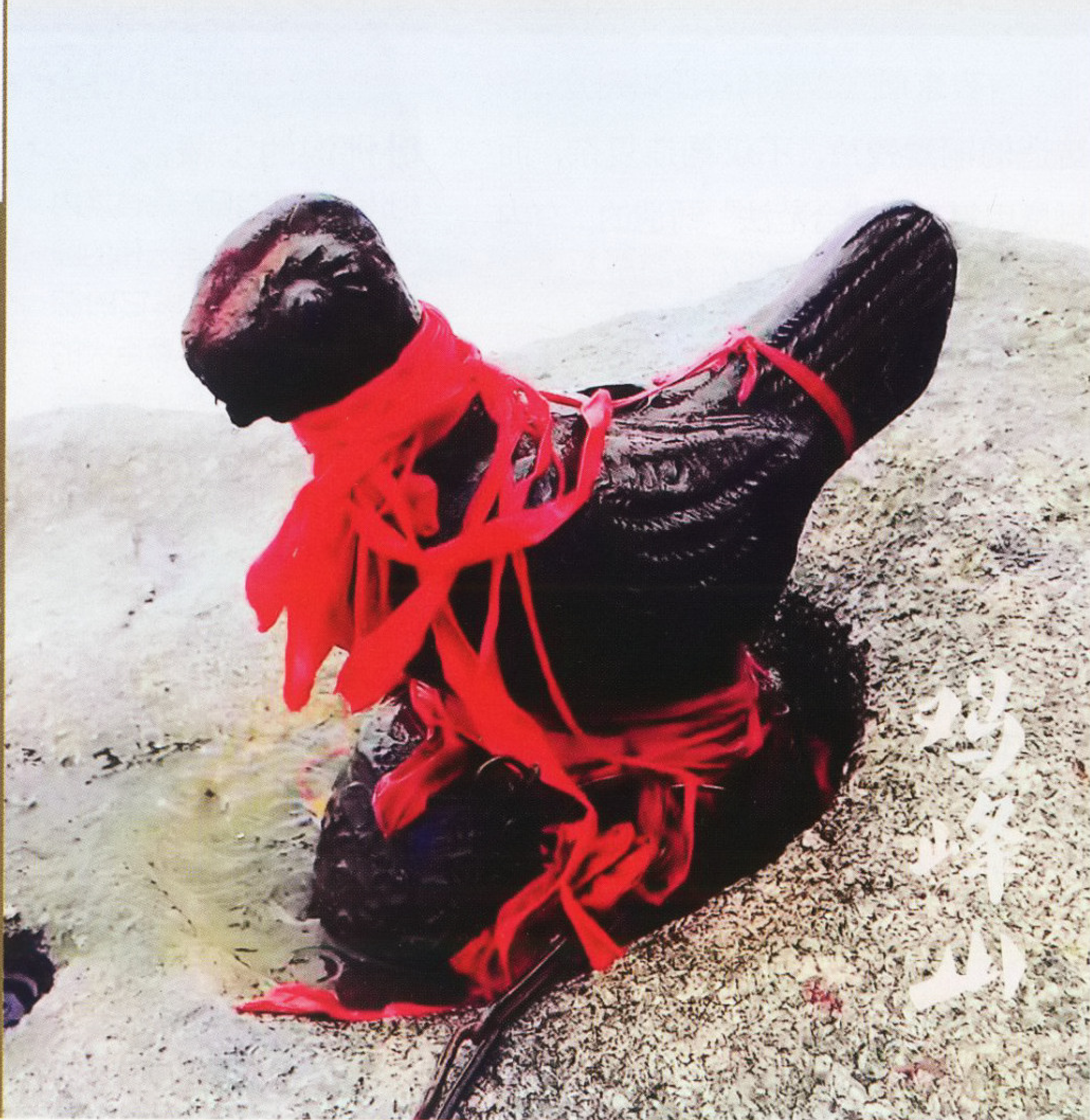
其实，宝鸡旧称为“陈仓”，公元前 762 年（秦文公四年），秦国第八任国君秦文公为自己治下的诸侯国选都于陈仓，准确地址即在如今的宝鸡市眉县一带。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当时陈仓发生了一件奇事——秦文公“十九年得陈宝”。《史记·封禅书》则描述得更详细：文公得到了一块质似石头的东西，在陈仓山北坡的城邑中祭祀它。它的神灵有时经岁不至，有时一年之中数次降临，降临常在夜晚，有光辉似流星，从东南方来，汇集在祠城中，像雄鸡一样，鸣叫声殷殷然，引得野鸡纷纷夜啼。这个东西，名为“陈宝”。

这件事听起来神奇，但解读起来并不难。据现代学者研究，这很可能是一块随着流星或彗星降落地面的陨石。陨石从天而降，且石中含有可以供冶炼提取的铁元素，在古人眼中被视为“神”物、“宝”物也很自然。何况先秦时期，人们敬天礼神，天降之物几乎就是天道的使者。

这样一个被纳入史册的事件，后来却被成书于西晋年间的《太康地纪》演绎成了魔幻版。故事是这样的：秦国早年间，有人抓到了一头像猪又不是猪，没人认得出的野兽，遂当作宝贝向国君进献。进献途中遇到两个小童，向路人指认说，这头看起来像猪的野兽，其实是一种名叫“媦”的妖怪，应当杀死。“媦”为保命，也向路人揭发，这两个小童是比自己更罕见的宝物“陈宝”，如果得到，可以奠定霸业。路人闻言，丢下“媦”去追赶小童，果然两个小童都化成了雉鸡飞走，其中雌的那只飞上陈仓北阪，变成了石头。秦国国君得知后，下令建一座祠庙，专门来侍奉这块神石。

这则记载篇幅虽短，情节却颇为曲折，更难得的是得雌鸡可称霸诸侯的预言，与秦国后来不断兴旺发达，最



铁鸡，也是宝鸡

图为铸造于清道光年间的铁鸡像，重达七八十斤，被置于陕西宝鸡鸡峰山的南峰顶上。这只脖系红绳的铁鸡，是当地善男信女的崇拜之物，传说将鸡头扳向哪一方，哪一方就万事如意，五谷丰登。相传，鸡峰山是秦文公得“陈宝”——神鸡而称霸的地方，是“宝鸡”地名的由来所在，因而有着许多神迹。
摄影／金碧辉



终称霸诸侯一统天下的伟业相映成辉，给本已十分离奇的故事，又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因而广为流传。

从“若石”到“雉鸡”，这则神话传说的华丽转身，最迟发生在魏晋时期，魏晋时人好谈玄怪鬼神，东晋人干宝编撰《搜神记》即是一证。

若石之神，鸣若雄鸡，这是秦人畏天、敬天的表现，而西晋才子潘岳，在《西征赋》中，将宝鸡地区的兴起史和环境特点概括为“宝鸡前鸣，甘泉后涌”，显然已经将鸡鸣视为祥瑞吉兆了。而《太康地纪》所记载的怪谈，更是脑洞大开，演绎、渲染，“宝鸡”的形态、特点和为秦人所得的过程无不生动，“秦人得宝鸡而祠之”的故事遂成。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该地还叫陈仓。

时光流转，转眼千年。755年（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叛，兵临长安城下。唐玄宗取道陈仓南下四川避难，太子李亨北上灵武称帝，史称唐肃宗。次年，李亨在统率唐、回纥联军收复长安的途中，友军部队驻军陈仓，他突然下令将陈仓县改为“凤翔县”，取意“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显然，这位患难中即位的大唐天子，是想以吉祥的地名来祝愿自己一飞冲天，君临天下。

不过，李亨很快得知，他自己的驻军地——天兴县，古称雍城，才是历代传说中的凤翔之地。认真的唐肃宗决定纠正这个错误，他了解了陈仓的历史，尤其对《太康地纪》记载的

金鸡鸣瑞

一只身高20米的金色雄鸡引颈展翅，似欲腾飞，这是陕西宝鸡市矗立的一座地标式的雕塑。“宝鸡”之名始自唐代，肃宗皇帝采信了“昔有鸡鸣之瑞”的传说，以此名替代古称陈仓。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盖过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历史典故，一举夺得了命名权。

摄影/金碧辉

传说产生了兴趣。仅仅 3 天后，便决定将陈仓改名为宝鸡。秦人得“宝鸡”兴国的故事，正可以表达对大唐中兴的祈愿。

关于宝鸡的传说到此为止了吗？还没有。在当地老人的口中，居然另有一个版本。

在李亨杀回陕西之前，玄宗李隆基曾逃难经过陈仓，尾随的叛军步步紧逼。李隆基慌不择路，只带几名近侍钻入深山中，被悬崖峭壁挡住去路，正绝望时，忽有两只花羽长尾的山鸡飞来引路，将他们带到山顶庙宇中休息，叛军则完全找不到上山的路。突然，朔风紧起，天上冰雹倾泻而下，砸得山下叛军四处逃散。虚惊过后。众人再找那两只山鸡，已化为石鸡，昂首屹立。玄宗手抚石鸡，感叹道：“陈仓，宝地也，山鸟，神鸡也。”宝鸡因而得名，陈仓山始称鸡峰山。

从“文公获若石”这一天人感应的历史事件，到玄幻的志怪演义，再到神乎其神的民间故事……宝鸡的传说，一再变身，离百姓也越来越近。如今，鸡峰山每年还会举办庙会，向“神鸡”祈福。

孝感传“奇”
竟来自皇帝的心理阴影

地名取于传说，除了为祈求“祥瑞”，也会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自然与神怪的力量渐渐退居其次，“人”的色彩总是越来越重，并成为主角。

湖北省有个“孝感市”，盛产米酒，孝感有个醉人的传说，也和地名有关。

当地大量的地方文史资料和文化宣传，都提到董永卖身葬父的典故。按光绪八年（1882 年）版《孝感县志》之《孝子传》的记载，董永本是青州千乘（今山东博兴）人，早年丧母，在汉末灵帝时期因黄巾起义，生计无着，不得不带着年迈的父亲背井离乡外出逃荒。

父子二人流落到孝感一带时，发现此地水土清旷、人情和美，遂定居于此。不久董永的父亲不幸染病过世，一贫如洗的董永无钱为父亲买棺置墓、操办丧事，但又不忍父亲不得安葬，无奈之下，只得卖身给当地富户裴氏为奴，用卖身钱来安葬父亲。这便是著名的“董永葬父”的故事，后被元人郭居敬编入“二十四孝”，成为最著名的孝行典范之一。而董永定居的这片土地，也自此更名为“孝感”，取“孝心感动天地神灵”之意，既为纪念董永，也为表彰孝子，劝勉后人行善。

后来，民间传说再出“彩蛋”，诉说“孝能感天”的奇事：董永的这份孝心不仅令世人感动，还上达于天，让天帝的小女儿也为之动容，化身美丽民女，与董永婚配，并以仙术助其劳作、补贴家用，董永得以积攒出足够的赎身钱，恢复了自由身。夫妻二人度过了一段非常幸福美满的日子。

这一富于浪漫情调和田园理想的佳话，十分契合农耕时代大众的心理需求，传说飞快地传播开来，“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变得家喻户晓，“孝感”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以至于人们完全忽略了这个地名诞生的真正历史。

其实，“孝感”之名的由来，并非仅仅来源于对董永孝行的赞美，而是

孝感

与发生在南朝时期的一场权力斗争有关。南朝宋孝武帝刘骏（454-464 年在位），本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第三子，虽然从小聪颖机敏，“神明爽发，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决爱武，长于骑射”，但却并不为父亲喜爱，自幼被立为武王，封于距离国都千里之外的西阳（今湖北黄冈东南）；长大成人后又长年率军在外征战，与太子之位无缘，更是没什么机会染指皇位。

元嘉三十年（453 年），刘劭（宋文帝长子）弑父篡位，素得军心的刘骏遂与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和雍州刺史臧质“并举义兵”，讨伐刘劭，最终在江宁（今南京市）得大将军、江夏王刘义恭之助，成功击败刘劭，登上皇帝宝座，成为南朝刘宋的第五位皇帝。

然而，他这个皇帝始终当得有些理亏。按照古代的皇位继承制度，“立嫡以长”才是第一原则，被刘骏诛杀的刘劭，毕竟是刘骏的同胞兄弟，民间很快就起了各种“风言风语”，孤家寡人的皇帝成了被流言攻击的弱势群体。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会因为继位方式有悖伦常而受到削弱吗？刘骏的心中泛起了阴影。

刘骏称帝即位后，很快开始在“孝”字上大作文章，既彰显刘劭的“款逆”，又表明自己师出有名、众望所归：他以“孝建”作为自己登基后的第一个年号，并在孝建元年（454 年）“赐……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粟、帛各有差”；到大明三年（459 年），又继续下诏令“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赐粟、帛各有差”；大明四年（460 年）“正月，孝佛、义顺，赐爵一级”；大明六年（462 年）“正月，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赐粟、帛各有差”……

不仅要不断表彰封赏孝子顺孙，刘骏还让自己的 28 个儿子一律起带有“孝”字的名字，如“孝师”、“孝德”、“孝良”等等。最后，刘骏更在自己的旧日封地新设立一县，取名“孝昌”，意在进一步强调刘劭之所以被诛灭，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父亲忤逆不孝；而自己之所以能得国，则是因为对孝道恪守力行，故而神明助之。孝昌县即如今的孝感一带。五代时，因后唐庄宗李存勖为避祖父李国昌之讳，又将其改为“孝感”。真实的历史与神话传说看起来相去甚远。



孝心感天
一棵自然脱皮的大槐树上，被绘制了一幅“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画，这则关于“孝义”的神话传说，千百来被人津津乐道。经过专家论证，董永乃是东汉末年的真实历史人物，随父徙居湖北，父亲病逝，遂以身葬父，因此留下了中国唯一一座以孝命名的地级城市——孝感。
供图 / 视觉中国

龙渊剑，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神兵利器之一

频繁出现在史书中
欧冶子和干将为铸此剑，尽采龙泉山的精华
剑由此地而生，地因宝剑而荣，结果二者一同垂名史册

不过，早在刘骏即位前，董永葬父故事已经在当地流传了二百多年。应该说，“孝昌（孝感）”地名的创设，离不开民间传说提供的契机和灵感。但真正令这一地名得以确立的，还是当时的现实政治事件，尤其是刘骏自己的统治需要。

龙泉，被传说笼罩的地方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浙江省龙泉市，此地位于浙江西南浙闽赣三省交界处，在东晋时期为乡级建制，乡名曰“龙渊”。

龙渊剑，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神兵利器之一，频繁出现在史书中。据成书至晚于东汉时期的《越绝书》卷十一《外传记·宝剑第十三》中记载：春秋末期，楚王因仰慕吴国铸剑大师干将和越国铸剑大师欧冶子的高超技艺，请著名的“相剑师”风胡子为“中介”，聘请两位铸剑大师联手为自己铸造宝剑。

最终出炉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宝剑不凡，是福也是祸。剑刚献给楚王，晋、郑两个中原大国就因“闻而求之，不得”而“兴师围楚之城，三年不解”。而楚王则引利剑，登城而麾之，结果敌军溃败，流血千里。这都是宝剑的威势所致。

剑由此地而生，地因宝剑而荣，结果二者一同垂名史册。该地从此即名龙渊了。奇怪的是，宝剑共有三把，为何独取“龙渊”作地名？

这还要从龙渊剑的得名说起。相传欧冶子和干将为铸此剑，凿开茨山，放出山中溪水，引至铸剑炉旁成北斗七星环列的七个池中，剑成，“观其状，如登高山，如临深渊”，深不可测，仿佛潜有神龙之相，故名“龙渊”。而当年的龙泉乡，恰恰地处深山之中，周遭既有群山连绵，又有深谷幽泉，俯瞰其貌，正合“龙渊”的意境，地名也有了着落。

建安七子曹植曾写诗赞叹龙渊剑说：“美玉生磐石，宝剑出龙渊。帝王临朝服，秉此威百蛮。”唐代大诗人李白也爱剑，作有“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的诗句，不过“龙渊”为何变成了“龙泉”？这是因为唐武德三年（620年），龙渊乡为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而被改名。唐乾元二年（759年），龙泉由乡升为县，“龙泉”也正式晋升为县级地名。

数百年后，北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此地改名风波又起。当时在位的宋徽宗赵佶诏命天下县镇，凡有“龙”字者皆须避讳，龙泉县变成了剑川县。不过这个避讳要求实在过于荒唐，发布这一诏令的徽宗皇帝，也很快不敌金军入侵，失位破国被掳到北方。新建立的南宋朝廷不知出自何种

责任编辑／刘睿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刘扬



考虑,竟决定对被改易的地名做出纠正。绍兴元年（1131年）,“剑川县”复名为龙泉县。

没有一个龙泉人，不知道龙泉剑。每个龙泉人也都能讲出三两个关于“龙泉剑”的故事。龙泉剑不但削铁如泥，还代表“诚信高洁”。相传，当年楚国名将伍子胥得祖传“龙渊宝剑”，驰骋沙场，却遭奸臣陷害，遭到重金通缉。他在友人的帮助下逃到长江之滨，被一位渔翁搭救。伍子胥拜谢辞别后，忽然有所顾忌，返回准备以祖传宝剑为酬，以求渔人为其行踪保密，不想渔翁却持剑自刎，以死明其高洁之志,令伍子胥悲悔莫名。至今，龙泉人仍用这个故事来教育孩子讲信义，诚以待人。

至于那把传说中的宝剑，据传为李渊所得，可能随高祖葬于献陵，也有传说李渊将此剑传于太宗李世民，后随其葬于昭陵。不过，对龙泉人而言，龙泉剑并不止一把。甚至从欧冶子时代开始，剑乡龙泉，就从未辜负它的名字，龙泉剑的铸造一直也未停止过。2006年，龙泉市的龙泉宝剑锻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三军仪仗队的指挥刀，也都出自龙泉。

在中国百姓朴素的观念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地名就是浓缩一方文化的最直观标志。

在琳琅满目的地名大观中，那些由传说而来的地名，往往最为亲切，最为荣耀，也最容易成为人们的精神倚靠和寄托情怀的对象。

宝剑出奇山

在古人眼里，铸一把好剑，是日月山川精华蕴育的结果。浙江丽水龙泉市的龙泉山，乃天造地设之地：山溪中蕴藏着含铁量极高的铁砂；林木可以提供优质的染料；北斗七井水质特异，可以淬剑；特产“亮石”乃是磨砺宝剑的上好磨石……春秋时期的名剑“龙渊”即从此出。剑成，观其剑，恰如龙潜山渊，剑与地俱得此名。后因避讳皇帝的名字，“龙渊”改为“龙泉”。

供图/视觉中国

水生济南

撰文／白马

镌刻在甲骨上的一个“泺”字，勾连出济南的前世今生。泺水和济水，两道三千年前的古老河流，无数喷涌不息的泉水，造就了一座以水成名的北方泉城。



趵突泉涌

济南有“泉城”之称，位于老城区西南的趵突泉是诸泉之首，被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为古泺水源头，商周时代就有文字记载，如今历经三千年时光，仍喷涌不息。图中，趵突泉池水清澈见底，三股泉水不断冒出，翻滚升腾，充满生机。泉畔垂柳依依，游人如织。

摄影/吴学文

趵突泉是济南的名泉，三眼喷吐的泉水，每日都会引来无数观赏者。泉西观澜亭后立有一座碑，上刻“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luò)”。碑铭和碑旁的“齐鲁二君会泺图”，说的是一段春秋时代齐鲁两国在济南举行“封疆会”的往事。

泺：纣王曾驻兵

碑铭上的文字,记载在《春秋》里。公元前694年正月，鲁桓公与齐襄公在齐地泺见面，商量齐鲁两国结盟的大事。

鲁桓公和美丽的妻子文姜一同奔赴齐地“泺”。鲁桓公不知道，齐襄公不止是妻子同父异母的兄长，还是她乱伦私通的情人！随着文姜和齐襄公旧情复炽，鲁桓公在泺逗留的日子，被无限期拖延下去。情人间的幽会越来越肆无忌惮，鲁桓公终于发现了妻子的奸情，他打算马上回转鲁国。但一切已经太迟。齐襄公假惺惺地举办了一场送行宴会，并让公子彭生扶着喝醉了的鲁桓公上车。当同车的鲁国侍者想要唤醒国君时，才发现，鲁桓公早已一命呜呼了。

令鲁桓公有去无回的“泺”在哪儿呢?

东汉学者许慎说，“泺”是流淌于齐鲁两国之间的一条河。西晋人杜预则明确指出，泺水就在济南。齐国国都临淄，属于今山东淄博，鲁国国都则在今山东曲阜，济南的确位于齐鲁之间。在济南，也可以见到许多和“泺”字有关的地名:泺口、泺源大街、泺文路……泺水是源于济南、流于济南的古水名，那“泺”是否也是济南的古称?

很有可能。“泺”的出现，比齐鲁两国的会盟，还要早得多。清末民初，刻有殷商时代卜辞文字的甲骨出土，造就了一批识读、研究甲骨文的专家，罗振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罗氏《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中，“泺”字从一片商王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被识读出来。当代古文字学者王恩田又进一步考证“泺”与济南的关系，发现商纣王东征夷方曾途经的地点——“乐”，就是“泺”的异形，指的都是济南。

与传说故事中荒淫无道、无心朝政的形象不同，历史上的商纣王是个颇有政治野心的君主。他即位后的第十年，东方的攸族和夷方两个部族发生了纠纷。战败的攸侯喜逃到商都向纣王求救。攸族是商人的分支，他们被夷方“欺负”，纣王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他马上秣马厉兵，占卜吉凶，在九月甲午日从“大邑商”(殷都安阳)出发，前去征服夷方。

三十天后，商朝军队到达了“雇”，据郭沫若考证，“雇”位于今山东河南交界的范县东南顾城。随后，军队一路前行，来到“乐”，也就是济南的泺水，当时是十月乙丑日。商军在济南经过休整,继续前往“商”(今山东泰安)、“攸”、“淮”等地，在年末与夷方大战，生擒了夷方首领。回程路上，纣王又再次经过“泺”，返回黄河岸边。

这场东征真正花费在战斗中的时间并不多，根据卜辞推断，只有短短的29天。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往返途中，特别是去程，比回程要多了十多天。按说前线战事紧急,理应急行军奔赴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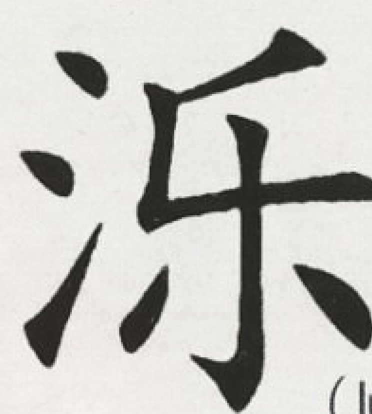




甲骨文



小篆



(luò)

甲骨上的“泺”

《春秋》记载，鲁桓公和齐襄公曾在“泺”会盟，“泺”指古泺水，位于济南。而早在商代，甲骨文上就已经出现过“泺”字。经考证，商纣王东征夷方途径的“乐”是“泺”字变体，亦指济南。上图即为济南趵突泉泺源堂泉水博物馆所藏甲骨残片，上面的“泺”字清晰可见。

供图/FOTOE

纣王为何会这样不紧不慢呢？原来他亲自东征的目的，是为了联络和经营东方部落，加强商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力量。有了东方部落的助阵，商军才能在和夷方正面交锋时，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纣王一来一往，都经过“泺”，并在当地停留驻扎，为下一站行程举行占卜仪式。可见当时的济南，已经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要地了。这样一片土地，经过商周两代的经营，最终成为齐襄公为齐鲁会盟选择的地点，顺理成章。

历：舜耕在此山

三点水是河流，河流边加一个“乐”字，仿佛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河水潺潺，河畔古树下，有人席地而坐，抚弄五弦琴，放声歌唱。琴声悦耳，歌声悠扬，与流水声浑然一体，令人心驰神醉。抚琴而歌者，就是大舜。《礼记》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济南人说：泺水正是舜歌《南风》处，因在水边奏乐，故名为“泺”。这样的解释，似乎有点望文生义。却也是因为济南人深信，这片土地与大舜有着不解之缘。

传说，舜被父亲和继母逐出家门后，一路流浪：“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做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耕种、渔猎、制作陶器、贩售货物，这些经历令舜得到锻炼，并最终成为尧帝最合格的继承人。舜这段流浪路上每一个落脚点的具体位置，历来众说纷纭。比如“历山”，据统计全国共有27处之多。山西中条山、浙江余姚、河南、湖南等都有传说中的舜耕之所。

济南也有一座“历山”——千佛山。

哪座“历山”更正宗？“唐宋八大家”之一，曾担任过齐州（今济南）知州的曾巩写过一篇《齐州二堂记》，一开篇就是对历山位置的考证：“历山在齐，皆东方之地，合于《孟子》。”他以《孟子》的记载为依据，确定历山在齐地。接着，曾巩又驳斥了历山在妫水源头河东雷首山（即中条山）的说法，指出

最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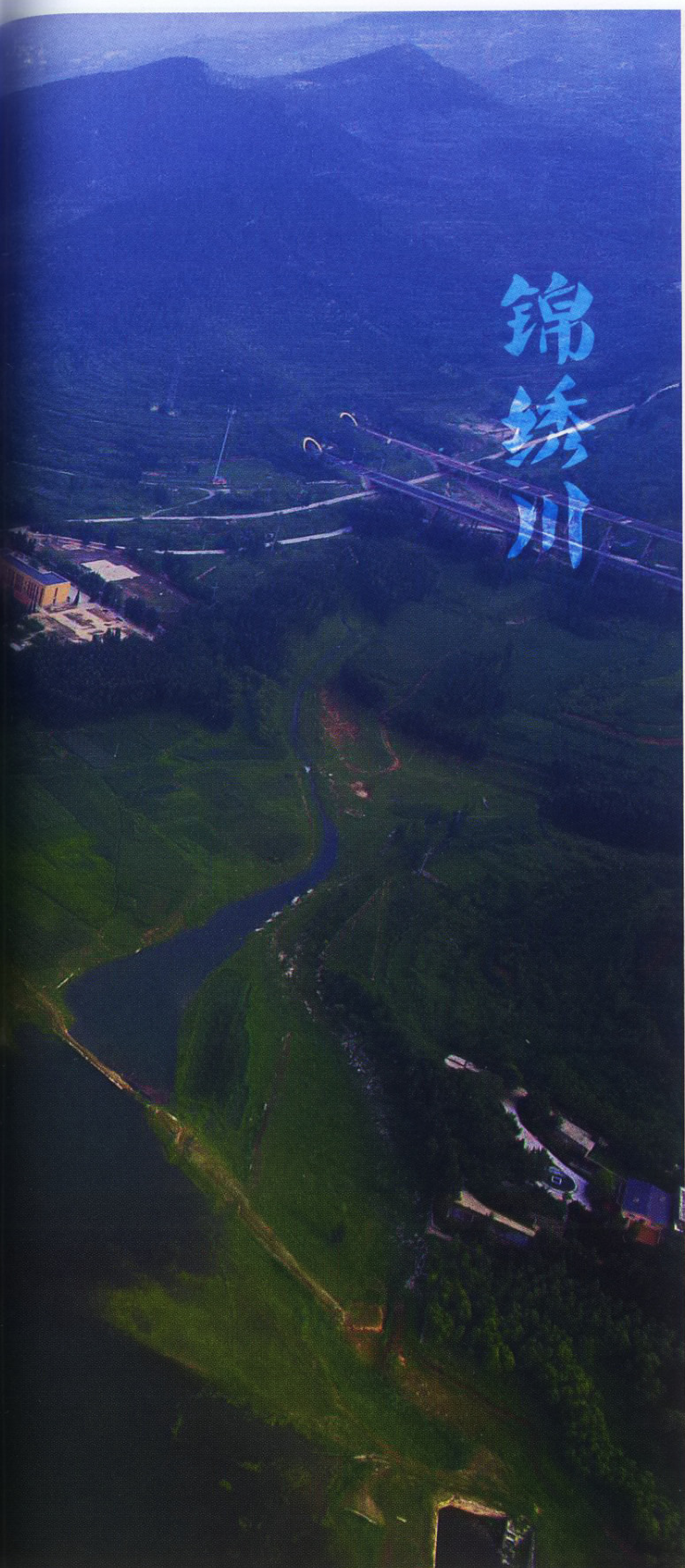
泉自南部山区来

济南南部地处泰山余脉，群山环抱。南部山区以“前震旦系变质岩”为基底，上布可溶性灰岩，经构造运动和长期溶蚀而发育为岩溶地貌，形成能够储存和输送地下水的地下网道。雨水渗入地下，顺单斜岩层北流，在老城区受到不透水的火成岩阻挡，涌出地面，造就了济南的泉水。上图为济南南部山区的锦绣川水库。供图／视觉中国

舜开始流浪、在历山耕种，和舜在妫水迎娶娥皇女英，并非同时。“盖不同时，而地亦当异。”主张“河东说”的人，不过是“迁就附益”“不考其实矣”。舜离开历山继续流浪后到过的雷泽、河滨等地，经过汉代经学家考证，均在济水南岸。由此看来，同在济水南岸的齐州历山，就可靠得多了。

历山也给济南带来了延续数千年的地名——“历下”“历城”。历山之下，是为“历下”；历下之城，是为“历城”。根据明代地名专著《郡县释名》记载，春秋时晋平公（前557-前532年在位）伐齐，即战于历下城。到了楚汉战争时，历下（今济南）仍是割据一方的田姓齐国重要的军事据点。

汉高祖二年（前205年），齐王田广派华无伤、田解带领军队驻扎在历下，抗拒汉军。如何应对田广政权，刘邦有所顾虑：要打，对方兵强马壮，将大大消耗汉军的力量；劝降，又没有合适的人选，十足的把握。这时，儒生



郦食其站了出来，表示愿意去游说齐国，不费一兵一卒，令齐地归汉。

“大王知道天下人心之所向吗？”这是郦食其见到齐王田广的开场白。他口若悬河，剖析厉害，竟真的说服了田广和丞相田横。他们解除了历下城的防御，决定和汉军讲和。但郦食其的胜利却刺激到了一个人：韩信。韩信花费了一年多时间，才平定了赵国，不过攻取了五十余座城池。而郦食其不费一兵一卒，就赢得了齐国七十多座城池，韩信怎么可能甘心！于是他先下手为强，不顾刘邦与齐王的盟约，派兵突袭历下城。

因和平而歌舞升平的历下城，瞬间成为血海。临淄城内，得到消息的田广悲愤交加，一怒之下，烹杀了郦食其。但韩信的大军也已杀来，齐国终究不免覆灭的命运。历下城见证了大喜与大悲，还是成为了汉王朝的属县，是为历城县。

在如今济南历下区内，千佛山上建有舜祠，又有舜耕路、舜井街等地名。舜文化与历山、济南，延续着数千年的缘分。

济：古水入海流

历城县见证了韩信灭齐后，又迎来了刘邦分封的几位齐王。首先是当年攻克历下的韩信；接着是刘邦的庶长子刘肥；然后是发兵攻诸吕，希望能在皇位争夺中分一杯羹的刘襄……齐国在汉初诸侯国中，势力一直很强，足以威胁到皇权，而且齐王刘襄还曾是汉文帝争夺皇位的对手。所以，当汉

历下此亭古

济南的千佛山是传说中舜耕之历山，因而济南又称历下、历城。大明湖中湖心岛上有一座历下亭，因南临历山而得名。下图即为历下亭，红底金字的匾额上，“历下亭”三字为南巡停驻于此的乾隆所题写。亭前对联“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出自杜甫《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一诗。

供图/视觉中国



最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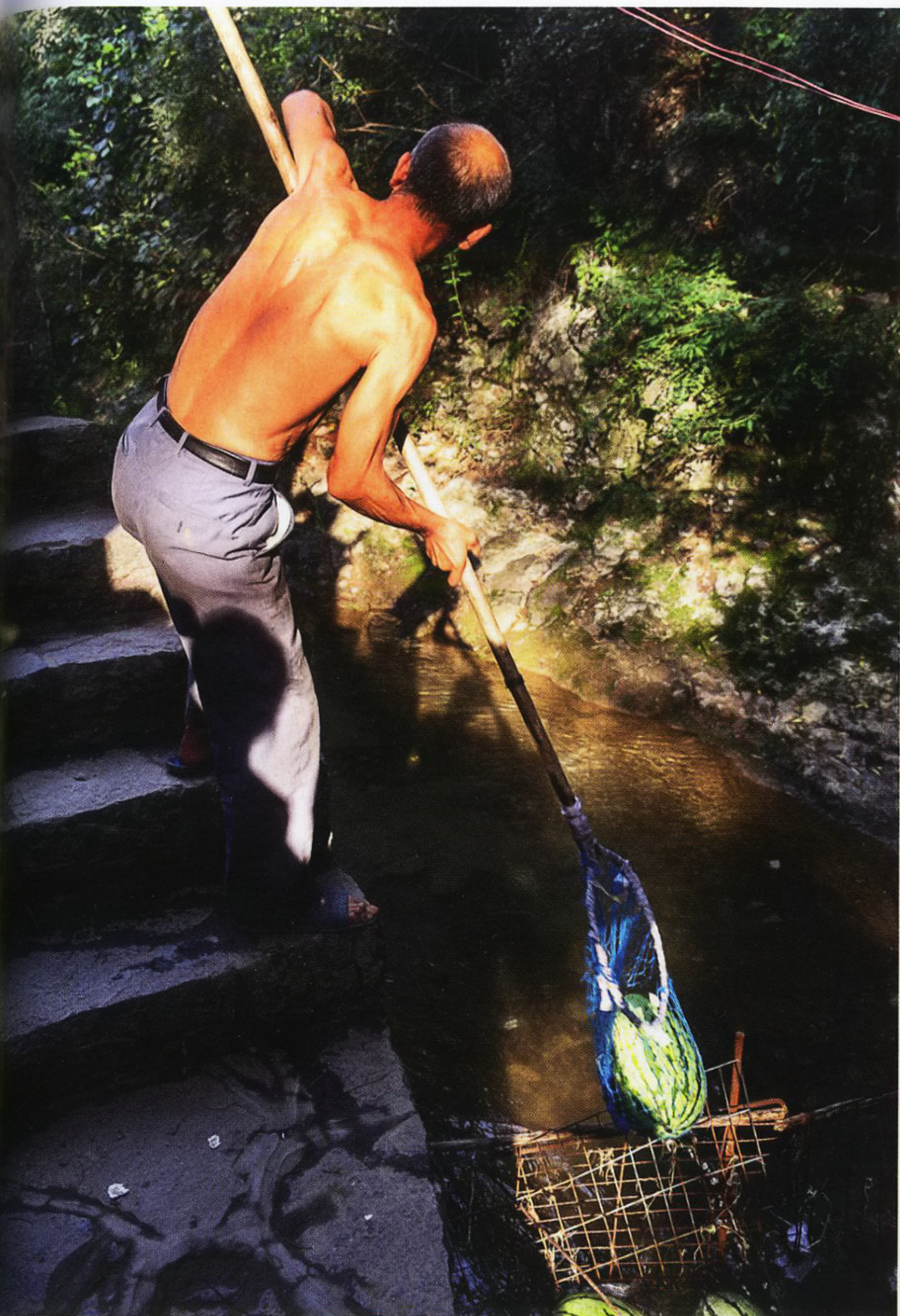


文帝决心削藩时，齐国首当其中，被分为了几个小的侯国：城阳、济北、济南、菑川、胶西、胶东。“济南”作为地名，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历城县，则是济南国的辖县。

济南，顾名思义，在济水之南。济水是古四渎之一。根据地理著作《禹贡》记载，济水“导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邱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济水发源于今河南济源市的王屋山，向东流淌，时而潜流地下，时而浮出地面。济水流入山东后，在梁山、东平一带与汶水汇合，经济南东入渤海。据说这条古济水三隐三现，“以清为名”，穿黄河而不浑。

济水和长江、黄河、淮河这三渎相比，水浅流细，在汉唐时曾几度干涸消失。东封泰山的唐高宗李治就曾提出过疑问：“天下那么多洪流巨谷，都不在四渎之列，偏偏要祭祀这么纤细的济水，究竟是为什么呢？”大臣许敬宗给出了答案：“渎是‘独’的意思，能够独立流淌、奔流入海的水，才能称为‘渎’。济水虽然多次潜行，时常断流，但因为它的独立，所以尊贵。”正是这条独立而尊贵的济水，为济南冠了名。

曾经在山东居住过的北魏地理学者郦道元指出：“济水又东北，泺水入焉，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历城县（即济南）城西南有喷涌而出的泉水，水流成河，便是先秦时就已涓涓流淌的泺水了。济水在济南城中向东北而行，和泺水汇合，交汇点就是“泺口”。泺水和济水这两条给了济南地名生命的水，也在济南合





而为一。

可惜，时过境迁，曾努力为入海而奋斗的济水还是彻底消失了。从北宋熙宁年间以来，黄河不断改道，多次经济南入海，黄河河道逐渐宽广，终于夺取了济水在济南的河道。而泺水也在刘豫伪齐政权统治济南时，被引导东行，成为了至今流淌的小清河。

泉：趵突三千年

济水消逝，泺水改道，舜帝的传说更遥不可及，除了那些地名上的古老字眼，还有什么可以见证济南数千年历史？

泉！

“泉源上奋，水涌若轮”的泺水源头，就是济南人最引以为豪的“天下第一泉”——趵突泉。郦道元见到的趵突泉，“觱涌三窟，突出雪涛数尺，声如隐雷”，三股水喷涌的样子，如今日所见。郦道元说，这三股水当时因为舜的故事而被叫做“娥姜（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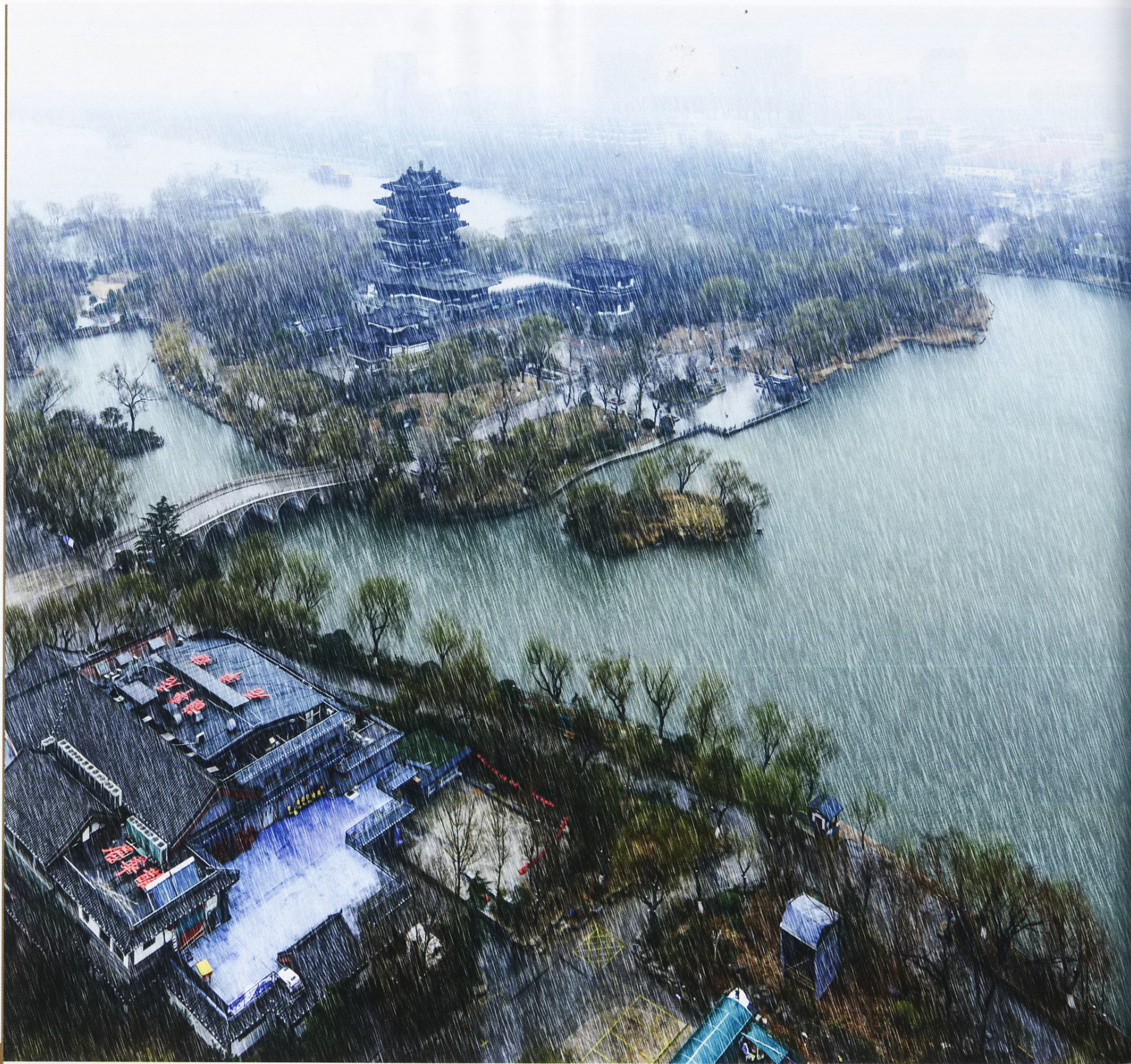
从北魏的“娥姜水”到北宋的“趵突泉”，泉名的变更经过了五百多年时间。曾巩作《齐州二堂记》时，曾探访泺水源头，他了解到，这涌出“高或至数尺”的泉水，被居住在旁边的人称作“趵突”之泉。趵（bào），是跳跃的样子；而“趵突”，又如同泉水涌起时“卜突卜突”的声音。有动态有声音，故名。

趵突泉的泉水是如何喷涌跳跃的？老舍笔下的文字最为贴切：

“泉太好了。泉池差不多见方，三个泉口偏西，北边便是条小溪流向西门去。看那三个大泉，一年四季，昼夜不停，

泉城泉生活

济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与泉水相关的街巷、宅院、园林、寺庙更是遍布城区各处。泉水文化已成为济南的一大文化特色。左页图为护城河南岸的黑虎泉，早晚到泉边打水的济南人络绎不绝，是老城区一道特有的景观（摄影／栾胜伟）。泉水可以直接饮用，也可泡茶煮饭，上左图中，济南人正在用泉水冰西瓜（摄影／吴学文）。上右图是老城区内的曲水亭街，路面由青石板铺就，泉水在临街人家的住宅前缓缓流淌，颇有江南水乡的韵味（供图／视觉中国）。



老那么翻滚。你立定呆呆的看三分钟，你便觉出自然的伟大，使你不敢再正眼去看，永远那么纯洁，永远那么活泼，永远那么鲜明，冒，冒，冒，永不疲乏，永不退缩，只是自然有这样的力量！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使你不由的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

老舍说，趵突泉流出来的河流是“一溪活水，清浅，鲜洁”，或许鲁桓公见到的那条古泺水，也是同样模样。

北宋时的济南，就已经是一座泉城了。曾巩记载：“齐多甘泉，冠于天下，其显名者以十数。”而元代于钦编纂的山东地方志《齐乘》中转录金人《名泉碑》，列出了当时的“历下名泉”，有趵突泉、金线泉、皇华泉、柳絮泉、卧牛泉等等，“总七十二”。此后明代诗人晏璧作《济南七十二泉诗》，清代郝植恭又撰《济南七十二泉记》，前后提到的名泉，共有一百多处。

曾巩看来，济南的泉：“色味皆同，

以予验之，盖皆泺水之旁出者也。”似乎都和泺水、和趵突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话也没说错。济南市区几大泉群：黑虎泉群、珍珠泉群和五龙潭泉群，如众星捧月一般，围绕在趵突泉群的周围。

济南城内自商周喷涌至今的泉，到底从何而来？当曾巩探访趵突泉源时，恰好听到有人在跟伙伴讲诉自己的经历：“当年我在城南的黑水湾丢了一袋米糠，没想到后来居然在趵突泉找到了，你们说稀奇不稀奇？”听到这番话，曾巩产生了一个念头：黑水湾在城南，如果那里的水和趵突泉的水是相通连的，那趵突泉源，是否就藏在南城的群山之中？经过实地考察，曾巩做出结论：“盖泉自渴马之崖，潜流地中，而至此复出也。”

“黑水湾”是济南历城区的锦阳川，而“渴马之崖”在今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东。两地都位于济南南部，属于泰山余脉。现代地质研究和曾巩的记载不谋而合：济南的地下水源来自南部山区。

从事济南地下水研究的科研人员，是通过泉水示踪实验来寻找泉水源头的。他们在济南东南龙洞山附近的老君井、南郊兴隆山等可能泉源投下示踪剂钼酸铵，数小时之后，在市内黑虎泉、珍珠泉等地取样，检测到较高的钼离子含量。这证明了泉水正是从投下示踪剂的地方流过来的。那个米糠丢在黑水湾、又在趵突泉被捡到的故事，和泉水示踪实验，可谓异曲同工。

“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颇不寂寞。到了济南府，进得城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这是清末文人刘鹗在小说《老残游记》中描绘的济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八个字，写尽了济南风貌。从先秦到魏晋，从两宋到明清，济南地名或有变更，但泉水仍旧。

在济南，读地名，读到的是历史的踪迹；寻泉水，寻到的是生命的力量。这座古城的生命力，必将如趵突泉水一般，永不疲乏地：“冒！冒！冒！”



烟雨大明湖
大明湖位于济南旧城区北部，是由城区内泉水汇流而成的天然湖泊。济南的泉水由大明湖南岸流入，水满时从北岸的北水门流出。湖水“恒雨不涨，久旱不涸”，既是古城的水源地，也是多雨时节重要的排蓄湖泊。大明湖水质清冽，风景秀丽，大雨之中更添一份美丽动人。
摄影／许立民

责任编辑／周玥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刘扬

与泉相伴相生的老城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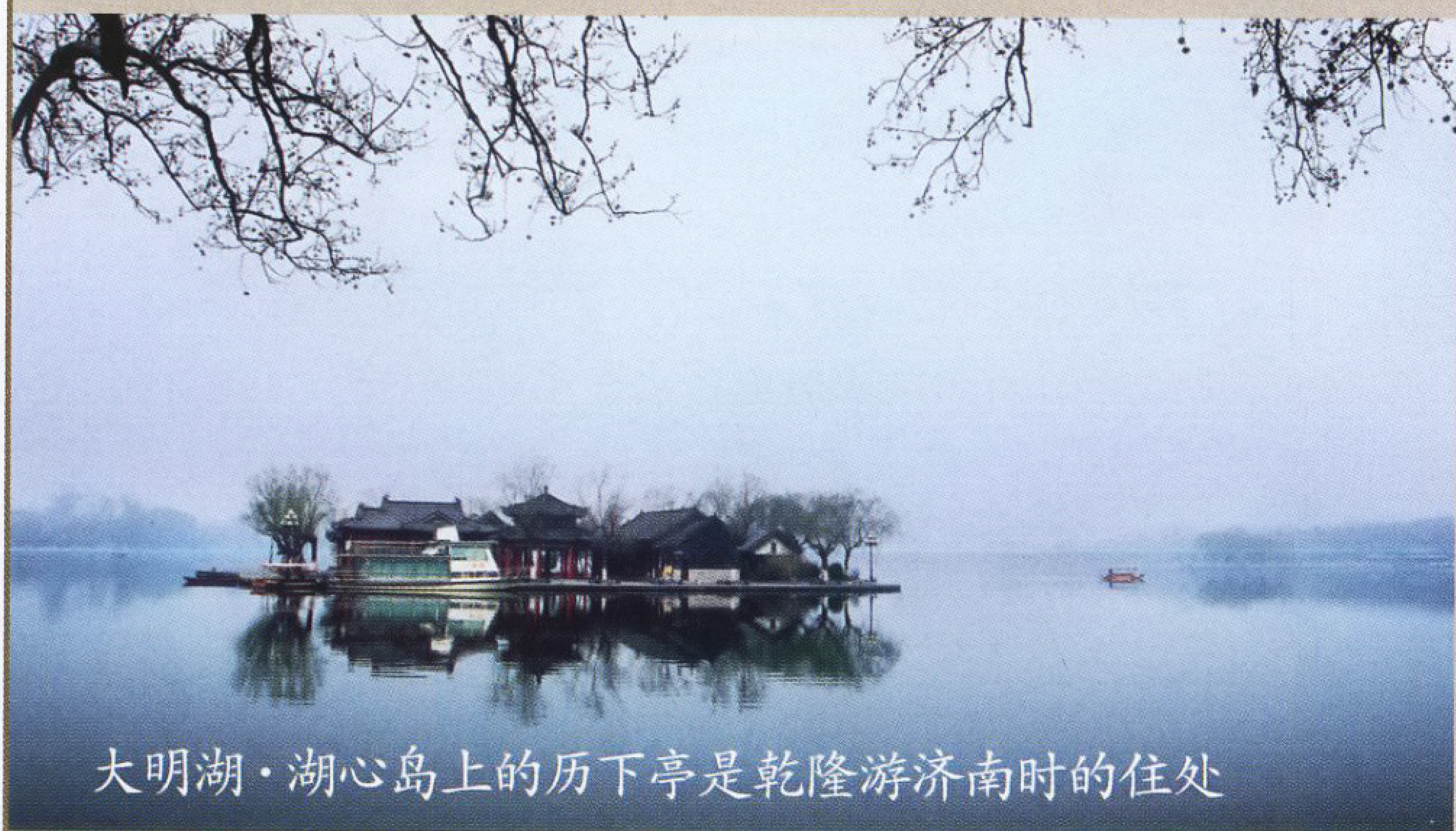
从南部山区潜入地下的水，在济南市内喷涌而出，形成747处泉眼，著名的有位于老城区内的趵突泉、五龙潭、黑虎泉和珍珠泉四大泉群。泉水既流入护城河，又汇成大明湖，形成一个泉水循环系统。泉之多，令老城内家家有泉眼，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泉水文化。老城区的宅院、园林、寺庙等，与泉水错落交织，而与泉水河湖有关的街巷地名，也比比皆是，从地图上可窥其一貌。

摄影／王保国





五龙潭泉群位于济南西护城河西岸。五龙潭又名乌龙潭、龙居泉，金代称灰湾泉，是传说中唐初大将秦琼府邸的所在地。五龙潭在北魏时曾是大明湖之一隅，元代以后水面缩小，仅剩泉池和周边溪流。泉群中有回马泉、月牙泉等名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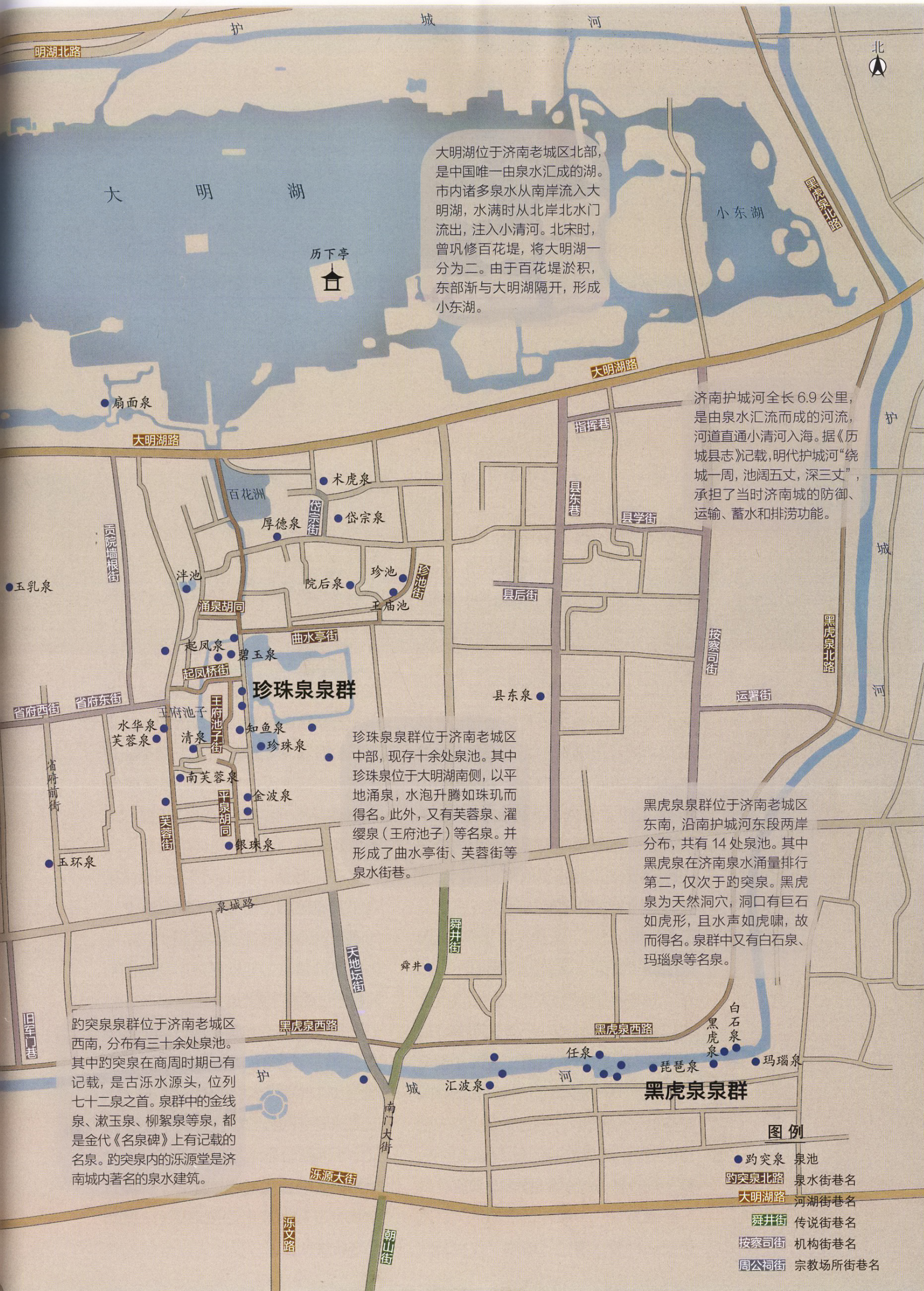
大明湖·湖心岛上的历下亭是乾隆游济南时的住处



无忧泉·用不规则自然石砌成的泉池别有一番情趣



护城河·雾河行船成为护城河通航后的独有景观


大明湖位于济南老城区北部，是中国唯一由泉水汇成的湖。市内诸多泉水从南岸流入大明湖，水满时从北岸北水门流出，注入小清河。北宋时，曾巩修百花堤，将大明湖一分为二。由于百花堤淤积，东部渐与大明湖隔开，形成小东湖。
济南护城河全长6.9公里，是由泉水汇流而成的河流，河道直通小清河入海。据《历城县志》记载，明代护城河“绕城一周，池阔五丈，深三丈”，承担了当时济南城的防御、运输、蓄水和排涝功能。
珍珠泉泉群位于济南老城区中部，现存十余处泉池。其中珍珠泉位于大明湖南侧，以平地涌泉，水泡升腾如珠玑而得名。此外，又有芙蓉泉、濯缨泉（王府池子）等名泉。并形成了曲水亭街、芙蓉街等泉水街巷。
黑虎泉泉群位于济南老城区东南，沿南护城河东段两岸分布，共有14处泉池。其中黑虎泉在济南泉水涌量排行第二，仅次于趵突泉。黑虎泉为天然洞穴，洞口有巨石如虎形，且水声如虎啸，故而得名。泉群中又有白石泉、玛瑙泉等名泉。
趵突泉泉群位于济南老城区西南，分布有三十余处泉池。其中趵突泉在商周时期已有记载，是古泺水源头，位列七十二泉之首。泉群中的金线泉、漱玉泉、柳絮泉等泉，都是金代《名泉碑》上有记载的名泉。趵突泉内的泺源堂是济南城内著名的泉水建筑。
大明湖
小东湖
历下亭
北
护城河
明湖北路
大明湖路
黑虎泉北路
扇面泉
指挥巷
县东巷
县学街
县后街
按察司街
运署街
百花洲
术虎泉
岱宗街
岱宗泉
厚德泉
贡院墙根街
泮池
玉乳泉
珍池
珍池街
濯缨泉
王庙池
涌泉胡同
曲水亭街
起凤泉
碧玉泉
起凤桥街
珍珠泉泉群
县东泉
省府西街
省府东街
王府池子
王府池子街
水华泉
芙蓉泉
清泉
知鱼泉
珍珠泉
省府前街
南芙蓉泉
金波泉
芙蓉街
平泉胡同
银珠泉
玉环泉
泉城路
舜井街
天地坛街
舜井
旧军门巷
黑虎泉西路
白石泉
黑虎泉
任泉
琵琶泉
玛瑙泉
汇波泉
黑虎泉泉群
南门大街
泺源大街
泺文路
朝山街
图例
趵突泉 泉池
趵突泉北路 泉水街巷名
大明湖路 河湖街巷名
舜井街 传说街巷名
按察司街 机构街巷名
周公祠街 宗教场所街巷名

天下“琅琊”何其多

撰文／南朝游侠

琅琊，有如珠似玉之意。电视剧《琅琊榜》中的琅琊，历史上真有其地。不过天南地北，世间琅琊不止一处。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萧梁国境内有座琅琊山，山顶有个神秘的琅琊阁，每年都会发布各大排行榜单，备受天下推崇，是为“琅琊榜”。“一卷风云琅琊榜，囊尽天下奇英才。”几年前的架空历史剧《琅琊榜》，把“琅琊”这个地名推上热搜，以至于山东、江苏、安徽纷纷争抢“琅琊”地。

其实“琅琊”在历史上早已享有大名。秦始皇多次登上的琅琊台、刻石记功的《琅琊刻石》；后来当了东晋开国皇帝的琅琊王司马睿；刘禹锡诗中“旧时王谢堂前燕”中的琅琊王氏；宋代文豪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琅琊山……只不过，这些“琅琊”天南海北，并非一地。它们之间有何关系？

勾践的故都，始皇的宝郡

琅琊一词颇惹人遐想。首先，它的“质感”很好——带有王字旁，应与玉有关。综合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众多解读分析可知，琅，是像珠子般的美石；而琊通玡，据宋代音韵学著作《集韵》解释，是似玉的骨。两个词合在一起，就是如珠似玉。

琅琊，一个如珠似玉的地方。难怪受人钟爱。不过“琅琊”仅主要写法就有四种。在历史典籍如《山海经》《国语》《史记》《越绝书》等中，均写作琅邪，后来又有琅琊、琅耶、琅玡等写法，今则多作琅琊。所以关于它的内涵，存在诸多疑义。相对得到公认的，是它的缘起，即原本是座山的名字。

《山海经·海内东经》云：“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也说道：“盖海畔有山，形如台，在琅邪，故曰琅邪台。”琅琊山位于海畔，古人以山体为基，夯土成台，是为琅琊台。而琅琊台的修建，据说与一个人有关。

春秋时期，东方大国齐国境内就有了叫做琅琊邑的城。而随后这个人的到来，则第一次把琅琊这个地方，变为天下的焦点。他就是以卧薪尝胆而闻名于世的越王勾践。

据《吴越春秋》记载，为了方便北上争霸，勾践由会稽“徙都琅琊，立观台以望东海，遂号令秦、晋、齐、楚，以尊辅周室，歃血盟”，终成一时霸业。文中所提到的观台，就是琅琊台。在经年累月的铁血生涯中，想必一代霸主勾践会不时地登上这座琅琊台，眺望南方的故乡吧。



勾践的琅琊都城在哪里？今人众说纷纭。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今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这里断壁残垣依稀可见，周边还有越国兵器出土。如果说勾践是琅琊的第一个名人，那么秦始皇要算第二个，而且是更耀眼的一个。

秦始皇一统天下，废除周代的分封制，行郡县制，琅琊郡即为三十六郡之一，郡的治所就在越都故地琅琊之上，郡范围大概囊括了今天青岛市的胶南、日照、潍坊东南部及临沂市东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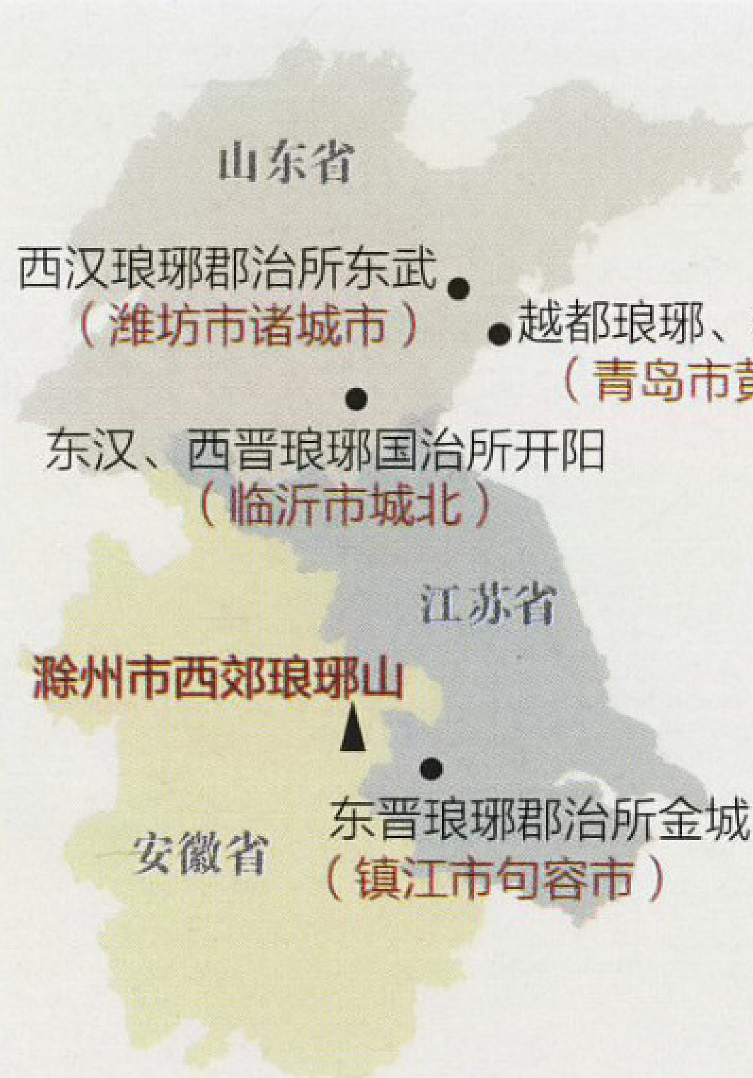
不过，设郡不是琅琊命运的关键，关键在于皇帝对它的钟爱——五次东巡，三次来到琅琊，重修琅琊台，并在此处刻石记功，这就是后世著名的琅琊刻石。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齐人徐福启奏始皇，东渡求仙的出发之处，就是在琅琊古港。于是此地不仅有了“帝王气”，也似乎沾上了一点缥缈的“仙气”。

琅琊王氏何处在

除了有勾践、嬴政等帝王的光环外，琅琊还以世家大族之多闻名于世，比如琅琊颜氏，属于孔子弟子颜回的后人；琅琊诸葛氏，出了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等三国厉害人物。而论家族影响力之大，则首推琅琊王氏。从东汉到明清，这个家族孕育出以王吉、王导、王羲之等为代表的重要人物，共计35个宰相、36个皇后，有“华夏首望”之称。

不过琅琊王氏的故乡，并非在秦始皇东巡的琅琊故地。从汉代起，琅琊郡的范围及郡治所在，就逐渐起了变化。

琅琊台
徐福“下海”之地？
这是徐福上书启奏秦始皇的雕像，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琅琊镇的琅琊台。琅琊台位于越都琅琊城、秦琅琊郡的郡治琅琊县内，是中国最早的“琅琊”所在。有专家推测，这里也是传说中徐福启奏始皇、入海求仙的始发之地。
供图／视觉中国



何处觅"琅琊"

今天有多处地方以"琅琊"自居，这是因为古代琅琊郡的范围不断变化，郡治也一再迁移。再加上琅琊山的存在，以"琅琊"为名的地方就更多了。可以说，最早的"琅琊"在今天的青岛境内，而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琅琊"，则位于今天的临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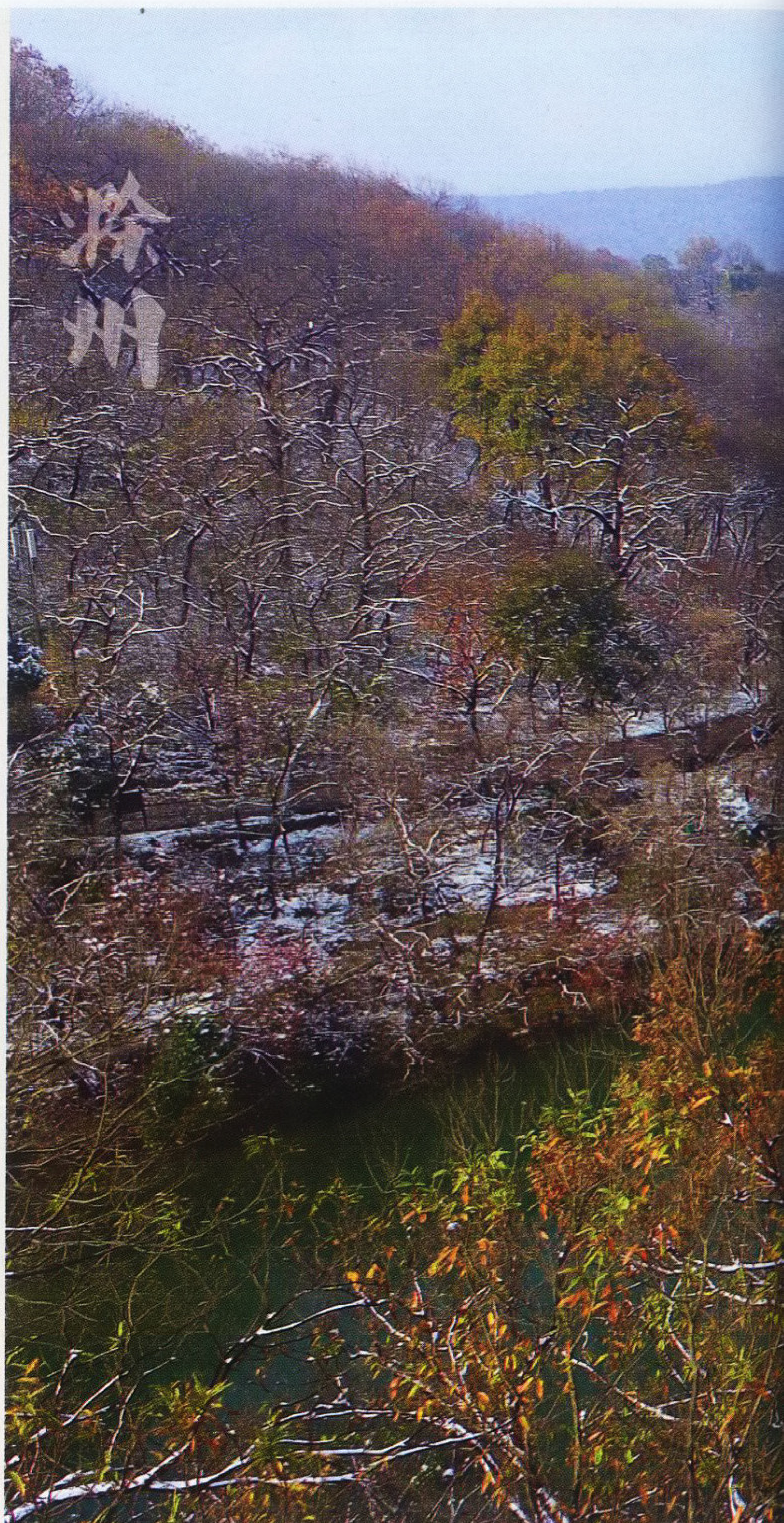
西汉的琅琊郡，以东武县城（今山东诸城）作为新治所，大致囊括了今胶南、日照、诸城以及临沂的东北大部。东汉时，琅琊郡改为与郡同级的琅琊国，治所又逐渐移至开阳（今山东临沂境内），包括胶南、日照和临沂的大部。以今日临沂为治所的这个琅琊郡，才是琅琊王氏的故乡。而越都秦郡的旧琅琊，此时则仅以一个县的身份存在于琅琊郡中，并逐渐被世人所遗忘。到了三国时期，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琅琊国降为二级行政区，统治范围也不再包含秦琅琊郡治。

琅琊国的降级和"缩水"，并未掩盖住它如珠似玉的光芒。相反，这里成为东晋王朝的"龙兴之地"。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衣冠纷纷南渡，琅琊王司马睿在琅琊王氏等世家大族的支持下，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建立偏安东南的东晋王朝。自此，琅琊王氏进入鼎盛阶段，其势力几与皇室相媲美。时称：王与马，共天下。

琅琊王与琅琊王氏等被迫搬家江南，还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把故乡也"搬"到了南方。这就是东晋的侨置政策。

为了招徕流民，安抚世族，稳定人心，东晋政府在侨人集中区，暂置原籍州郡县，并沿用北方故土的名字，琅琊郡当然包括在内。

琅琊郡原本没有实土，寄居在今天江苏省的句容县境内。到了咸康元年（335年）方才分江乘县地（今南京栖霞山附近江边）为琅琊郡实土，以桓温为琅琊内史（即太守），以金城（今江苏句容北金城）为治所。这便是南方



朝廷的琅琊郡。不过江南政权更迭变化，甚至一度北伐，收复不少故土，故琅琊郡的设置与范围也变化繁复，在此不一一细表。值得指出的是，琅琊王氏等大族虽南迁了，但北方的琅琊一直都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相继占据过山东的诸政权，都会在原琅琊国区域内设置琅琊郡，治所大多在开阳。

于是大江南北，琅琊不止一处，风流也不止一处了。

琅琊榜的琅琊山呢？

经历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大乱，天下再度一统。"琅琊"却在久违的太平盛世中，迎来了命运的



终结。

琅琊的失落，与“郡”一级行政区划的消失相关。隋一统天下后，文帝将地方行政区划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因此琅琊郡被废，属县直属沂州。此后，“郡”这一行政区时存时废，琅琊郡也随之生生死死。有唐一代，地方行政区划逐渐稳定为道、州、县三级。乾元元年（758年），短暂恢复设置的琅琊郡再度被废，又一次改为沂州。从此，天下再无琅琊郡县的设置。

不过，世间并非没有琅琊。比如除了山东的琅琊山外，在今天安徽滁州市西郊，也有一座琅琊山。据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它的得名，与东晋元帝司马睿曾寓居于此有关。司马睿曾为琅琊王，其王号得名于山东的琅琊国，所以说滁州的琅琊山，也与山东的琅琊国（郡）遥相呼应，一脉相承。后来，这个地方还迎来了北宋文豪欧阳修，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从此，滁州的琅琊山更是声名远播了。

电视剧《琅琊榜》的历史背景，带有一点南北朝的影子，剧中南方萧梁国境内的琅琊山，当与南方滁州的琅琊山更为接近。不过，这毕竟是一部架空历史的作品，如要与真实历史一一对应，反倒是过于较真了。

《琅琊榜》的琅琊山？

雪后的琅琊山俊逸不凡。再配上一池碧水，更是如诗如画。安徽滁州市琅琊山，因琅琊王（即后来的晋元帝）司马睿曾驻于此而得名。也有人认为，电视剧《琅琊榜》中的琅琊山，就是以它为原型的。

供图/视觉中国

责任编辑/马赛屏
图片编辑/陈敬哲
版式设计/杨东海



运城

一座因盐而生的城

撰文／杨沔

因盛产食盐，中国与盐有关的地名不知凡几，但唯独运城这个名称内不含有盐字的地方，是独一无二的“盐务专城”。“运”从何来？

盐池色彩

盐池，因地名解州而又名解池，因地处黄河以东而称河东盐池。位于山西西南部的运城盆地，中条山下，涑水河畔。历史上，盐池出产的食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经济、生活有莫大的影响力。盐池中含有大量的嗜盐微生物，如嗜盐紫色硫细菌、嗜盐外硫红螺菌、嗜盐杆菌、嗜盐球菌等。夏季高温，是它们生长最适宜的环境。当这些细菌大量繁殖时，细胞内的红色素等，就使得盐池呈现光怪陆离之状。从空中俯瞰，甚是奇特。

供图／视觉中国

传说，有一天，五帝之一的舜帝四处巡游视察，来到了盐池的边上，恰好，一阵人们期盼已久的风从南方吹来，吹去了他们心头的焦躁与忧愁，吹出了盐池上白花花的食盐。熏沐着南风，舜帝席地而坐，取出五弦琴，一边操琴，一边吟咏道：

南风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

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史记》里说道："舜歌《南风》而天下治，《南风》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一曲《南风歌》，被视为舜帝天下大治的象征。其实，南风只是个点缀，真正的功劳应该归给盐池。

这座盐池位于今天山西运城市盐湖区，而舜帝的国都蒲坂，在运城永济市蒲州镇，相距不远。在这个因处于黄河以东而被称作河东的地区，盐池，凭借着特产的盐，与华夏早期文明史密不可分：历史学家钱穆等人认为，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就是因争夺盐池而起，涿鹿也并非河北涿鹿县，而是盐池上源一带。后来，黄帝与炎帝之间爆发阪泉之战，阪泉就是盐池。

这些或许还存在争议，但可确信的是，在汉唐蒙元等强大帝国的发家史中，盐池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而围绕着盐池，一座城市逐渐发展起来，它的名字也因盐池输运而造就。它就是运城。

池生瑞盐

一个名为"盬宗"的神灵为人供奉，以祈求护佑盐池生产。唐代大历十二年（777年），盐池连降暴雨，但似赖池神庇佑，盐池红盐自生，盈掬倾筐，俨然盛世之气象。于是唐代宗敕封池神为"宝应灵庆公"，并建造池神庙供养之。图为池神庙今景，庙内现存建筑为明代嘉靖年间重修。

摄影／薛俊



早期文字记录上，有“卤”而无“盐”
两个字有着明显的区分
《说文解字》解释道：“天生曰卤，人生曰盐。”
前者自然形成，后者人工制作

河东盐池是最早的盐

鲁成公六年（前585年），晋国境内的梁山忽然崩塌，晋景公恐怕因此影响了国运，便图谋迁都，令大臣们献计献策。诸位大夫说道：“郇、瑕氏之地，土地富饶，靠近‘盬’（gǔ），可使国家富饶，君主安乐，不可错过。”虽然最终晋景公听从韩献子的意见，迁都新田（今山西新绛），但郇、瑕氏之地确实有优越性：“沃饶而近盬”。“盬”，就是盐池。

盐池特色何在？东晋文学家王廙（yì）在《洛都赋》中赞美河东盐池道：“玉洁冰鲜，不劳煮泼，成之自然。”自然，就是全凭天然之力，不用人工煎煮。舜帝吟诵的南风，让盐池沿岸的水分迅速蒸发，析出晶体，“朝取暮生”“暮取朝复”，取之不尽，源源不绝。在生产力远远落后的时代，自然自生的盐池，无异一笔珍贵的物产。

然而，自然盐不只有河东盐池，单说盐池，在西北陕甘等广大地区就分布广泛，此外还有岩盐等。何以河东盐池地位罕有匹敌？原因无他：地理位置。黄河以东地区是华夏早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还与以关中、河洛为中心的王朝腹地只咫尺之近。

也因此，河东盐池之盐，堪称中国最早的盐。其实，早期的盐，并不叫盐，而是卤。早期文字记录上，有“卤”而无“盐”。今天，我们用盐水或酱油调制卤汁并制作的菜肴，称为卤制品，卤和盐没有本质差异。但最初两个字有着明显的区分，《说文解字》解释道：“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前者自然形成，后者人工制作。

东周初年，齐国宗室女姜氏出嫁晋国，号为晋姜。后人在她的墓地中发现了若干青铜器，其中一件名为晋姜鼎，上面铸有一句铭文：“锡卤责（积）千两”，是有关食盐较早的记录。

历史学家唐兰认为，盬与卤是一声之转（因某些原因而音有转变的词汇），先有自然形成的盐，即盬，后有海水煎成的盐，盬味微苦而盐味微咸。同时，河东之地位于黄河下游，在统治中心位于河南中部以东的商人看来，地处西方，因此，金文里的“卤”与“西”为同一个字，更加证明了卤专指河东盐池出产的盐。

人们以盐池为生，吃盐，也敬重盐，或许他们相信冥冥之中盐池有神灵在护佑着斯土斯民。这位主宰盐池的神灵因盬之名，叫作盬宗，广为百姓们供奉祈祷，只是起初尚未进入国家的正式祀典。



河东盐池之图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河东巡盐御史吴楷视察盐池，将盐丁的捞采活动和盐官监视情形、当时盐池的地理形势、建筑布局等详细信息绘制成图，给后人留下了这通《河东盐池之图》碑。上面的局部图展示了其中的部分场景。

供图/池神庙文管所

唐代大历十二年（777年），盐池一带连降暴雨，按理说，水量过大，会稀释盐溶液，难以析出晶体，导致产量下降。不料，待天气放晴，盐池里“红盐自生，盈掬倾筐。或茧或栗，形攒伏虎，色沏丹砂，古之未有”。好似神灵眷顾发威，一夜之间扭转了乾坤。当地官员把这一派“池生瑞盐”的盛世之象上报中央，户部侍郎韩滉请求唐代宗封神嘉赏。于是，皇帝诏赐池神为“宝应灵庆公”，第二年，盐池北畔的卧云岗上，一座恢弘庙宇拔地而起。

今天你若去池神庙，会看到建筑群逐级升高，在后面的三座大殿里，供奉着池神、日神、风神等关系盐池生产的诸神。这已是明代建筑了，早期的唐代建筑早就消失不见。但人们对池神的信仰，仍旧可以追溯向前，迈过唐代，到舜帝，甚至在先民掬起盐池的第一把盐之时，信仰便在心里扎下了根。

盐务这块肥肉必在官家口中！

有一个成语“猗顿之富”，被用来形容一个人十分富有。猗顿是东周时人，家境富裕，与陶朱公并称。他靠什么发家的？《史记》说：“猗顿用盬盐

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liè）富。”正是凭靠着贩卖河东盐池的盬盐，猗顿在当时的“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牢牢地名列前位。

限于史料的匮乏，我们无法得知猗顿经营盐池的具体方法，是私营？还是受官府辖制？可能是后者。《周礼·盐人》记载，当时周王室设置“盐人”一职，掌管“盐之政令”，各个诸侯国进贡的物品里，就包括各种盐：苦盐（即盬盐）、散盐（即海盐）、形盐（池盐岩盐等自然盐），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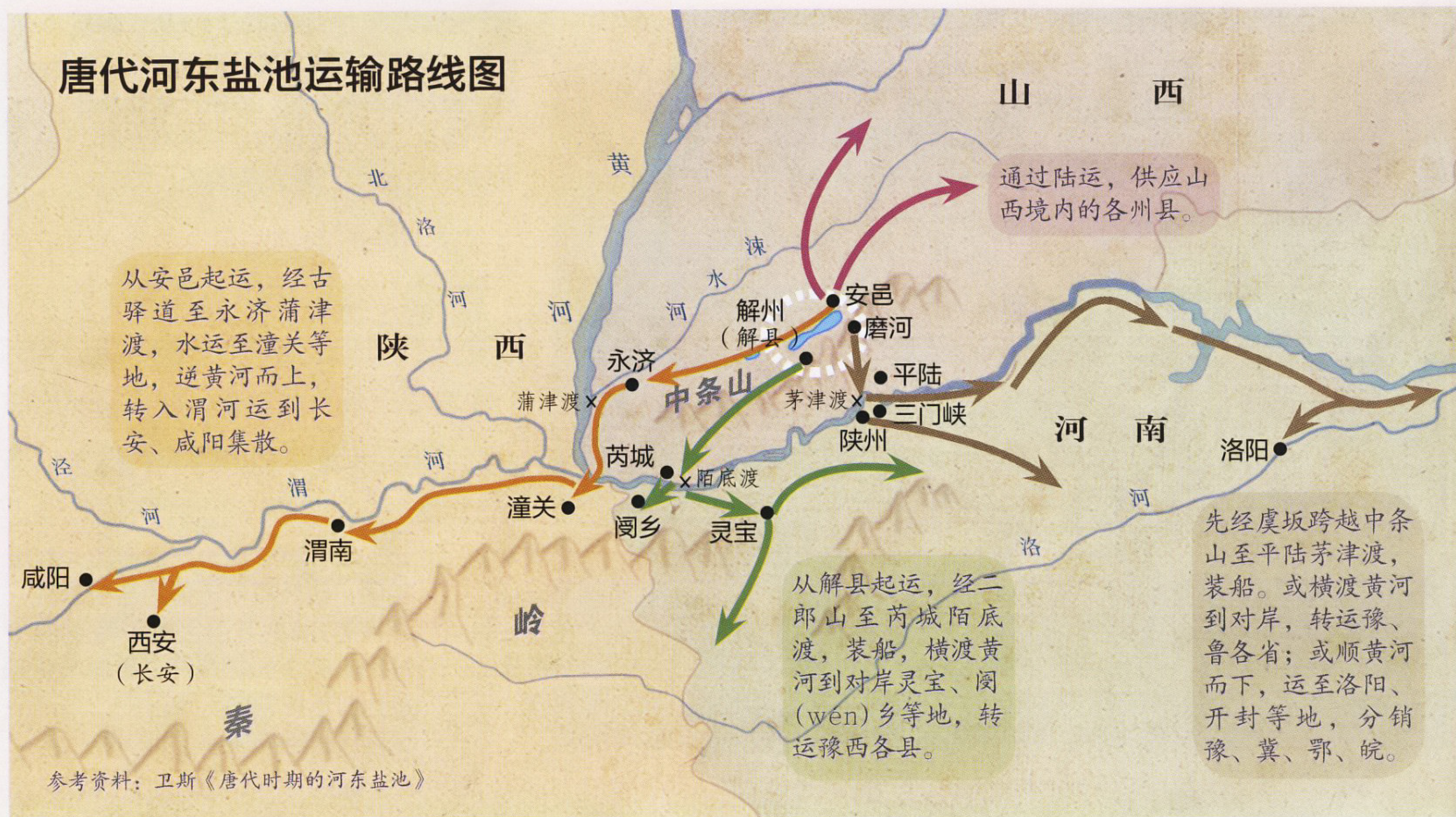
或许我们可以根据记录春秋齐国管仲事迹的《管子》一书，想象河东盐池的管理。辅佐齐桓公登上春秋霸主之位的管仲，创立了一项制度：食盐官营——食盐民产、官收、官运、官销。《管子·轻重甲篇》载：“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zū）薪，煮沸（jǐ）水为盐，正而积之。”齐桓公命民众生产渠展的食盐，砍柴煮盐，而后官府负责征收并积聚食盐。正因此，齐国民间出现了一些集中资源的大盐业主，他们雇佣大批劳动力，从事生产，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猗顿便是这样的盐业主。

不过，猗顿这样的富豪，只是食盐官营制度下小小的衍生品。而河东盐池这笔巨大物产，为春秋晋国持续数代的宏图霸业，支撑起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辉煌。在韩赵魏三国瓜分晋土后，盐池转为魏国所有，其后，盐池所处的安邑之地被秦国割据，魏国不复强大。只是，盐池依旧不断令后来的所有者从中获益。

汉武开边，令此前文景之治积蓄的国库顿时耗费一空，为了筹措钱财，财务大臣桑弘羊便决策变汉初的“弛山泽之禁”为“笼天下盐铁”，将盐铁等事务统归官营，以此充实国库，收效巨大。这个时候，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产盐区已遍布全国各地，《汉书·地

唐代盐池运盐之路

唐代是河东盐池发展极盛的时期，运销区域扩大到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大部分地区，甚至远及甘肃。范围之广，是其他盐类（海盐、井盐）所远远不能相比的。据研究，以河东盐池为中心，向外运输食盐的路线主要有四条，分别销往不同方向和地区。其中，以翻越中条山脉尤其是平陆界内的路途，最是艰难。



中国古代产盐区与地名关系图

元人叙述盐的种类时，分成了自凝结而取的池盐、煮海而后成的海盐、汲水煮之的井盐三大类。暂且不考虑产量较少的岩盐，这三类食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军事中，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产盐治盐，许多地名便与盐牢牢绑定在了一起。

池盐

盐池基本分布于河东、关内、陇右等西北地区，历史上北方王朝财政多有赖盐池支持，尤以河东盐池最为重要。在海水制盐技术尚未发达之前，能够天然结晶生成的池盐，是食盐的主要来源。

气候干燥，蒸发量大，湖水中的盐分可自然析出，古称盐泽、盐泊。——罗布泊

在藏语中，茶卡是盐池的意思，青海、西藏地区颇多此名。——茶卡盐湖

遍布20余天然盐池，西魏时置盐州。——盐池

取自流井（井下压力高，卤水自行涌出）和贡井（所产之盐曾作贡品）二者首字。——自贡

清雍正六年设盐源县。县南有盐井河，故名。——盐源

有盐井并设渡口，民国初年设县定名。——盐津

汉置盐渎，东晋改名盐城，环城皆盐场。——盐城

秦时置县，因海滨广斥盐田相望得名。——海盐

池盐区　井盐区　海盐区

河东盐池　运城盐湖　盐山　盐亭　盐边　盐都　盐官　盐田

黄河　长江　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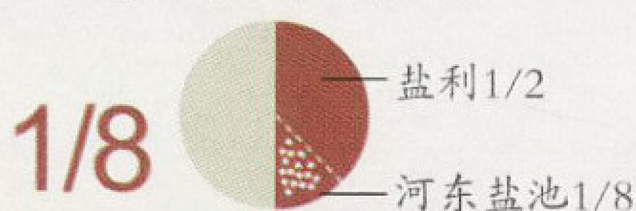
井盐

晋代左思《蜀都赋》有言：“家有盐泉之井。”可见井盐开采之早。隋唐以后，井盐产区扩大，涵盖了今甘肃东南、四川大部、云贵等地。但相对池盐、海盐而言，开采难，产量低，价格也比二者为贵。

海盐

绵延广袤的海岸线，源源不绝，易于开采，是海盐相对其他盐类的优势。春秋时期，齐国有渠展之盐，燕国有辽东之煮，吴楚煮海水为盐，海盐产区北及辽东，南达江浙。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元代以后，海盐产量更是超过了池盐。

河东盐池的几个数据



1/8

唐大历年间（766—779年），河东盐池年税高达150万缗，占了全国盐利的四分之一，全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强。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年），盐利甚至高达200万缗，朝廷为之减天下大半之租。

20,669,750 两

元代“盐为诸赋之首，解之盐泽又诸鹾之首”，统治者对盐池的征税远迈前代。1307年，岁办河东盐102,000引（每引400斤），折算课银6,884,000两。到了1329年，这个数字陡增为20,669,750两。

145,000,000 斤

清代，河东盐池产量增加，乾隆年间，盐商每年运销的盐引总额，最高有60余万引之多（每引240斤），约合1.45亿斤，平均年贸易额达到了167万两。据统计，乾隆一朝累计达到9000多万两。

理志》记载的盐官多达36处，分布在27个郡国，管理河东盐池的安邑盐官更是诸官之首。

不过，盐铁到底要不要官营这个议题，“意外”地激发出一场史称“盐铁会议”的大讨论。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各地贤良文学60余人齐聚京城长安，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坐镇中央。双方各执一词：前者贵义贱利，重义轻财，反对政府与民争利，主张废除盐铁官营等政策；后者曾凭借制定这些政策，为汉武帝的赫赫武功奠定经济基础，充实国库，自然是拥护者，更何况还可借此打击豪强大族。

然而，盐务这块肥肉，统治者怎能轻易松口呢？盐铁会议后，朝廷仅罢去了部分榷酒（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其他政策依旧维持不变。纵观历史，除了少数几次短暂的“弛山泽之禁”外，盐税始终是国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筹措抗击叛军的军费，负责财政的盐铁使第五琦创立盐法，史称“榷盐法”，“榷天下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其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刘晏对其进行改进，使之财政效益更为突出。榷盐法下，盐业生产户被官府编入专门的户籍，专事生产，于是再也不会产生猗顿这样的盐业主了。不过倒是形成了另一个群体：官盐批发商。盐政机构统购食盐后，以榷价卖给商人，由这个商人群体运销各地。

榷盐法颇具成效，征收上来的盐税甚至占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新唐书》有云：“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在其中，河东盐池起到了多大作用？史料记载，唐代有18座盐池，蒲州安邑、解县占了5座，总称为“两池”，即河东盐池。此时生产方式改进，不再局限于纯粹依靠天然的集工捞采法，出现了“垦畦浇晒法”：即人工垦地为畦，将卤水灌入，利用日光、风力蒸发晒制，并在卤水中搭配淡水，加快盐的结晶过程。唐代宗时，河东盐池年税高达150万缗，占了全国盐利的四分之一，全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强！

因此，唐代兴建池神庙，敕封池神，不只是“池生瑞盐”这么简单，而是实实在在从盐池获得了无比好处。贞元十三年（797年），河东盐池的盐利甚至一度高达200万缗，朝廷为之“减天下大半之租”，唐德宗李适亲往盐池，祭祀池神。

链接

盐池是怎样产生的？

数千万年前的造山运动和地壳断裂，造就了山西运城盆地，而古汾河携带大量含盐物质流入盆地，同时岩类中易溶解的钾钠盐类被水溶解后，随径流转移至盆地，蒸发浓缩，为盐类矿床的形成打下了物质基础。20万年前，盆地局部下降，形成水湖，湖水和早期盐类矿层融合，结成厚盐层，遂为盐池。根据勘探，盐池的盐储量为4413万吨，芒硝（硫酸钠）2000万吨，硫酸镁550—600万吨。

参考资料：《运城市志》

中国以“盐”为名的县市为数不少
如江苏盐城市、浙江海盐县、宁夏盐池县、四川盐源县等
而运城是最为特殊的一个“盐务专城”
即因以转运盐使司为中心建设而成

“盐务专城”的诞生

细心的读者大概会注意到，前面提到盐池所在的行政区域，是安邑、解县两地。安邑，乃战国时期魏国的早期都城，是秦汉时期河东郡的郡治所在，北魏时分为南北二县，北安邑东迁，即现在的夏县；解县，是三国名将关羽的故乡，唐初改虞乡县为解县，五代时升为解州。然而，在现行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上，已找不到它们的名字，检索地图发现，前者是运城市盐湖区东北的街道办事处，后者是盐湖区西南的解州镇。“运城”仿佛突然出现，夺去了本属于安邑、解州两地尤其是后者的荣光。

运城何来？故事还要从河东盐池发展史的另一个巅峰开始。

1231年，蒙古铁骑攻伐金朝，占领河东盐池，掐断了维系金室苟延残喘的命脉。战争中受到破坏的盐池，急需修复整治，以供应蒙元庞大的军费开支。于是，元太宗命令姚行简担任解盐使，董理此事。

姚行简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在什么地方创立盐司治所？他先是整修盐池壕篱、拦马墙，又将盐池概况描绘成图，而后选定了一个最佳地址：盐池北边的路村（或称潞村）。或许是因为产量关系，北宋以后，河东盐务偏重于西南，设机构于解州，称“提举解盐司”“解州榷盐院”等，管理解州、安邑两池。姚行简的选址，既非此前的重心所在解州，也非传统的地区安邑，却是两地中间的路村，是何用意？

有学者推断其中缘由有三：一，姚行简机构草创，人手缺少，不能两地置司，但一地立司不能同时满足解州和安邑，干脆选个别的，两家不得罪；二，解州偏西，安邑偏东，但路村地居高阜，正处南北、东西通衢，又有池神庙信仰加持；三，元初生产方式退化为原始的集工捞采法，造成东池产量大而西池产量小，综合两池盐务，故立司于中间。

不过，盐司设立带来的巨大利益，解州怎可轻易放弃？为此，双方展开了一番持续数十年、盐司数次易手的较量。至元七年（1270年），解州申请迁移盐司，首次争夺即告负；至元二十年（1283年），解州州尹再度上表，此时以盐池为封地的安西王不孚众望，又兼解盐司新官上任，解州方面终于得偿所愿，抢回盐司；1285年，就在解州为庆贺盐司重驻立碑不久，路村便发起反击，三夺盐司，财大气粗的盐商们迫使盐场东移；司场分离，殊为不便，1287年，盐司再回迁路村。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朝廷罢解盐司，在路村设置陕西都转运盐使司（后改河东解盐等处都转运盐



使司），彻底为这场争斗画上了句号。围绕着“转运盐使司”，路村逐渐发展繁荣起来，成为被黄河、汾河、中条山、太行山脉包裹的晋西南地区的中心地带。延祐年间，改称圣惠镇；至正十六年（1356年），筑凤凰城，为建城之始。这座新兴的城，也因为这个机构官职而有了“运城”之名。清代乾隆《运城志》云：“因运司驻扎，故名运城。”

中国以“盐”为名的县市为数不少，如江苏盐城市、浙江海盐县、宁夏盐池县、四川盐源县等，而运城是最为特殊的一个“盐务专城”，原因也正在于此。后来，1947年设县级运城市，1949年为运城专区，1967年置运城地区，2000年改为地级运城市，转运盐使司把“运”永久地铭刻在这片土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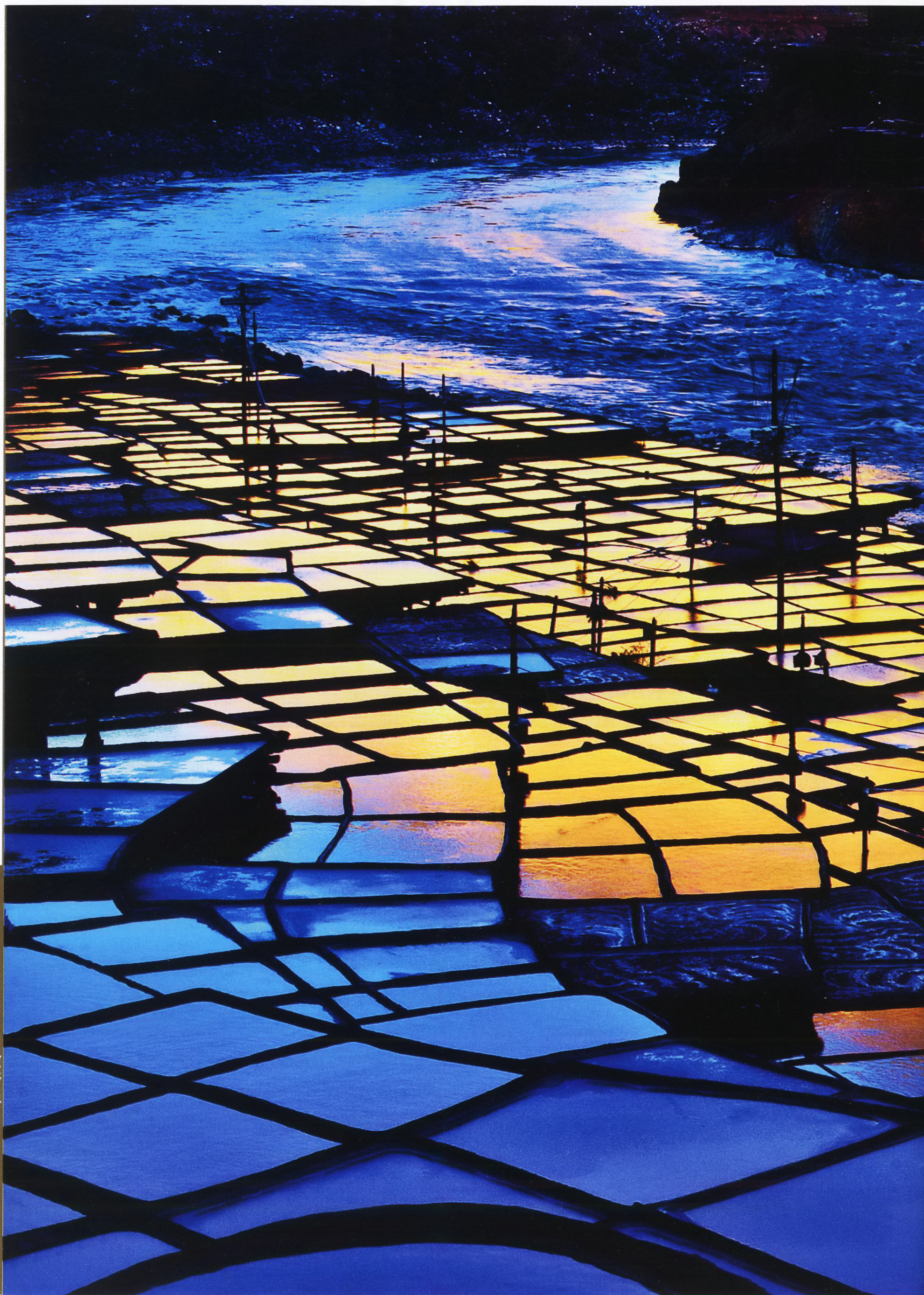
在解州争夺盐司的告表中，有这样一句话：“置司于路村，以致闾井萧条，居民鲜少，于今五纪矣。”后世，明人袁翱也曾感慨道，（人们）“纷纷然皆都于路村，而居解之民浸以凋落”。真着实令人唏嘘，由于一个盐司治所的迁变，解州从州级行政单位一步步退化成乡镇街道一级，而本来名不见经传的路村，却一跃而上，成为今天的地级运城市。在这此消彼长中，或许我们感受最深的，便是地名的魅力吧。

运输不绝

转运使之职起于唐代，主管粮食、盐铁等物资的运输事务。元代在解州与安邑之间的路村设置河东解盐等处都转运盐使司，造就了今天运城的城市中心和地名。图中盐池呈现不同色彩，一侧绿色，一侧玫瑰红。在切割它们的平坦道路上，运城的内核“转运”格外突出。

供图／视觉中国

责任编辑／安洋
图片编辑／陈敬哲
版式设计／杨东海



盐井乡

以盐为名还有它

地处今西藏自治区东南端的芒康县盐井纳西民族乡，因出产食盐，被称为茶马古道上的一颗明珠。奔腾不息的澜沧江在盐井乡拐了一个弯，因河流侧蚀作用，形成了一片高出水面的台地。台地上，参差排列着数千块大小不一的盐田。这片土地下，深层的地下热水溶解了部分盐层，沿断裂带涌出地表，造就了一些盐泉。人们在泉眼处垒石固水，形成盐井，再取盐水倾覆在盐田中，日晒风干下，水尽盐出。据考证，盐田晒盐源于唐朝时期，而且与一千多年以前相比，生产方式仍旧相同。今天这门古老的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因为处于茶马古道的交通要道上，更兼有盐这笔珍贵的物资，盐井的战略地位格外重要。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记载，公元11世纪，格萨尔王和纳西王羌巴为争夺盐井，展开一番激战，史称“羌岭之战”，以格萨尔王的胜利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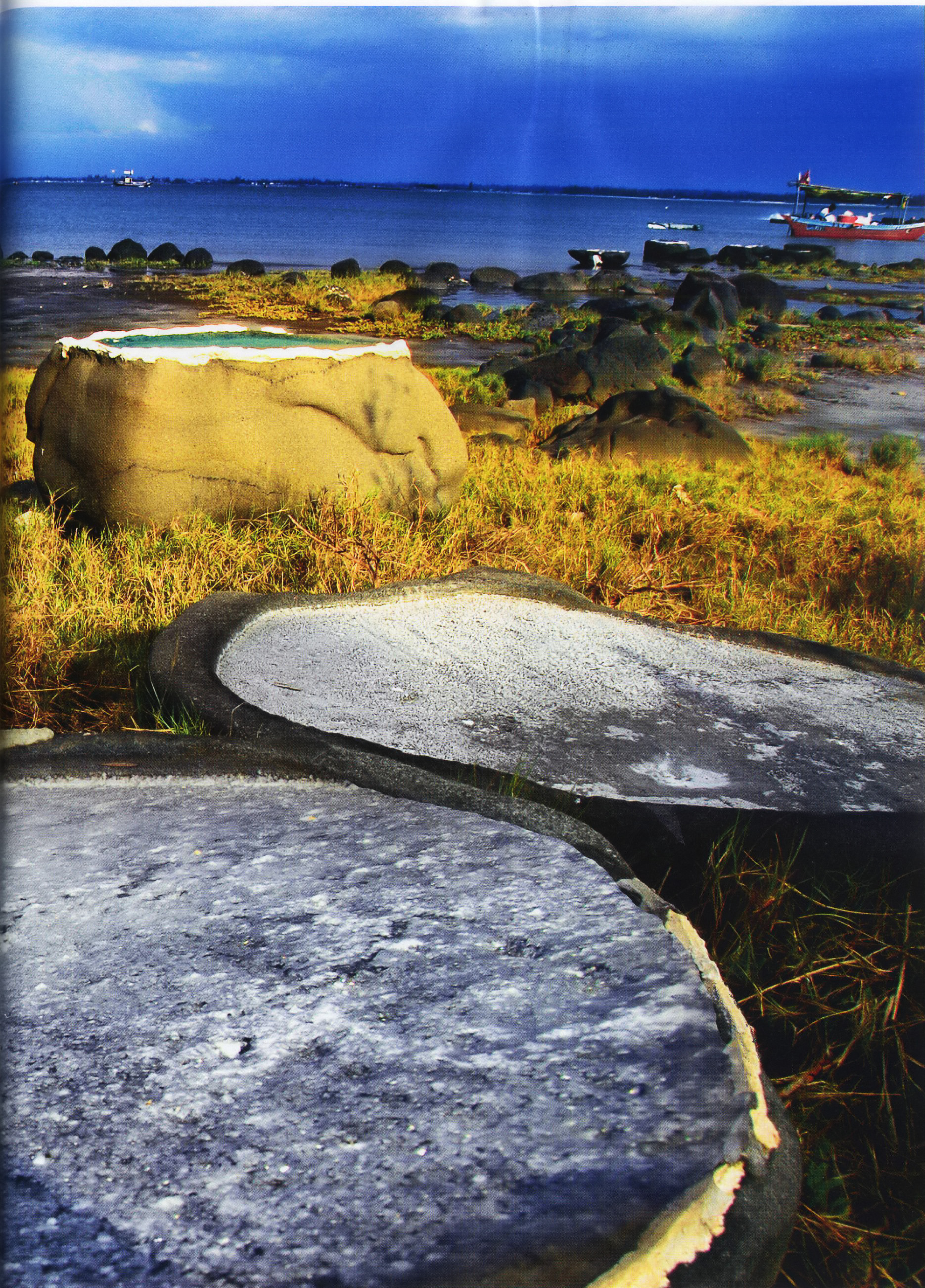
供图／视觉中国

盐田村

以盐为名还有它

“洋浦盐田，朝水夕钱。”这是海南省儋州市洋浦经济开发区盐田村流传已久的一句古话，意思是早晨还是卤水，傍晚便可收获食盐换取金钱。来到洋浦盐场，只见许多表面平整的石头错落地分布着，倘若不了解的话，还容易误以为这是乱石阵。实际上，这些石头不简单，却是远古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被人们修理为砚台状的晒盐槽。先以海滩泥沙过滤海水，制成含盐量较高的卤水，再将卤水倒入晒盐槽内，以槽为炉，以日为火，晒干水分，结晶成盐。这是盐田村日晒制盐的独到之法。一般认为，明朝永乐年间，海盐的制造工艺告别煮海为盐方式，改为修造盐田，日晒取盐。而盐田村已然领先了6个多世纪：805年，来自福建莆田的青年谭正德远涉重洋，在洋浦盐田村外的海湾里，发现了这种方法。有人说，盐田村是“用黑色火山岩堆砌成的村落”，或许可以修改一下，“用黑色火山岩与白色海盐堆砌成的村落”。

供图／视觉中国



龙首山
龙角镇
老龙头
龙须沟
龙口市
龙须沟
龙心村
龙抓寨

龙的传人 依龙而居

撰文／向衡

在国人心中，龙是能腾云潜渊、呼风唤雨、赐福降祸的神兽，是中华民族的图腾，炎黄子孙向来以“龙的传人”自诩，对龙怀有深切的敬畏和喜爱之情。但凡以龙状物比事者，大多包含吉祥之意。于是，龙的传说、龙的纹饰图案、龙的成语、龙的节日层出不穷，自然也少不了与龙相关的地名了。

龙字地名最先出现在北方，之后随着汉人南迁，逐渐遍及全国。根据1986年出版的《全国乡镇地名录》统计，云南省乡镇龙字地名最多，其次是两广、川渝贵等地。总的来说，南方的龙字乡镇地名已超过北方。

（参考资料：吴光泛《中国龙字地名的转化、发展和保护考》）

龙之居所

龙岩市 龙陵县 龙门镇 龙亭镇 龙潭乡 龙窟村 龙穴村

龙既可上天下海，那么无论陆地还是水中，都可作为它停留的居所。我国的传统风水勘舆术中，将连绵起伏的山脉地形称为“龙”，而山的气脉所结处称“龙穴”，所以一般叫龙穴的地方，乃是风水学中灵气积聚的宝地。

龙字地名当中，最负盛名的大概非“龙门”莫属，太史公司马迁生于山西河津龙门，这里也是鲤鱼跃龙门故事的发祥地；古时科举试场的正门叫龙门；洛阳有鼎鼎大名的龙门石窟；四川人爱“摆龙门阵”；《新龙门客栈》是华语武侠电影经典之作……

地名龙门者，通常因所处地形两山夹峙如门而得名。一般来说，呈现两山夹一水的形势，浩阔江水流经山间狭窄通道，波涛汹涌激荡，气势难挡。这些地方历来是所属区域的交通要冲，时常处在剑拔弩张的状态，却又因为景观震撼，留下不少吟诵佳句。

龙之躯体部位

龙口市 龙尾镇 龙角镇 龙心村 龙抓寨 龙首山 龙脐山 龙须沟 龙颈沟 老龙头 龙腰

以龙之躯体部位作地名，通常取用该部位所处位置或形状，比如位于秦皇岛市山海关东海岸的老龙头，宛如万里长城之首探入海中。老舍笔下老北京南城的龙须沟曲折狭窄等等。

龙之姿态

盘龙镇 缠龙村 卷龙埔 卧龙山 游龙山 回龙观 斗龙坝

传说中的龙，是一种身形颀长的神兽，我们常用"矫若游龙"来形容书法作品或是某人的动作变化多端、连绵流畅。其实龙的姿态还常被拟作山水之势，成为地名。不过当"龙"作为帝王象征时，就另当别论了。北京有一处地名叫回龙观，明代本是玄福宫所在，这玄福宫既是皇家道观，还是皇帝拜谒皇陵往来休息的行宫，天子回京时会在此居住，因此在民间俗称回龙观。清代时，回龙观附近形成了村落，人称回龙观村。

龙腰

龙尾镇

龙脐山

龙之颜色

黑龙江省 白龙镇 火龙岗镇 黄龙乡 蓝龙村 东紫龙村 翠龙街 青龙峡 苍龙岭 赤龙山 白龙江

龙与颜色的地名组合，以五色龙地名居多，这与我国传统的五行学说中，五行对应的色彩有关，其中又以"青龙"最为常见，五行说认为青龙代表东方和春季，所以我国一些带青龙的地名，往往位于某一区域的东方。

摄影／动脉影

责任编辑／张舒羽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杨东海



2019年

台历图片征集

中国国家地理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IMAGES HU BEI

寻象荆楚

本次图片征集旨在筛选优秀作品，将其用于《中国国家地理》2019年的会员礼品台历的制作。优秀作品一经确认入选2019年台历，拍摄者将获得《中国国家地理》颁发的图片使用荣誉证书和相应稿酬。


图片征集详情
请扫描二维码

征集时间： 2018年9月25日—11月11日
优秀作品公示时间： 2018年11月16—19日
征集方式： 邮箱投稿 hyb@cng.com.cn，邮件标题："寻象荆楚"图片征集
征集图片内容： 需以湖北为主题，内容可以选择但不限于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动植物生态等主题的摄影和绘画作品。

2019年杂志会员礼品



续订《中华遗产》杂志，还将获赠"寻象荆楚"台历。
（《博物》杂志礼品另有准备）
礼品赠送截止时间：2018年12月31日

2019 会员招募

杂志会员价

	1年（12期）	3年（36期）
《中国国家地理》	360元	980元（原价1080元）
《中华遗产》	360元	980元（原价1080元）
《博物》	180元	510元（原价540元）
《中国国家地理》+《博物》	480元（原价540元）	
《中国国家地理》+《中华遗产》	640元（原价720元）	
《中国国家地理》+《中华遗产》+《博物》	810元（原价900元）	

付款方式

方式一：网购（支付宝/网银/微信）
1. 地理商城
http://store.dili360.com
2. 淘宝旗舰店
http://zhongguoguojiadili.tmall.com
3：中国国家地理微店
https://h5.youzan.com/v2/tag/sqa8z452
方式二：银行转账
账号：110060210018170104758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分行亚运村支行
开户名：北京翰林英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为便于我们更好地为您服务，请把转账凭证及收件人的联系方式和所购产品信息一起传真至010-64859755

方式三：邮政商务汇款
商户客户号：111310100
商户客户名称：
北京翰林英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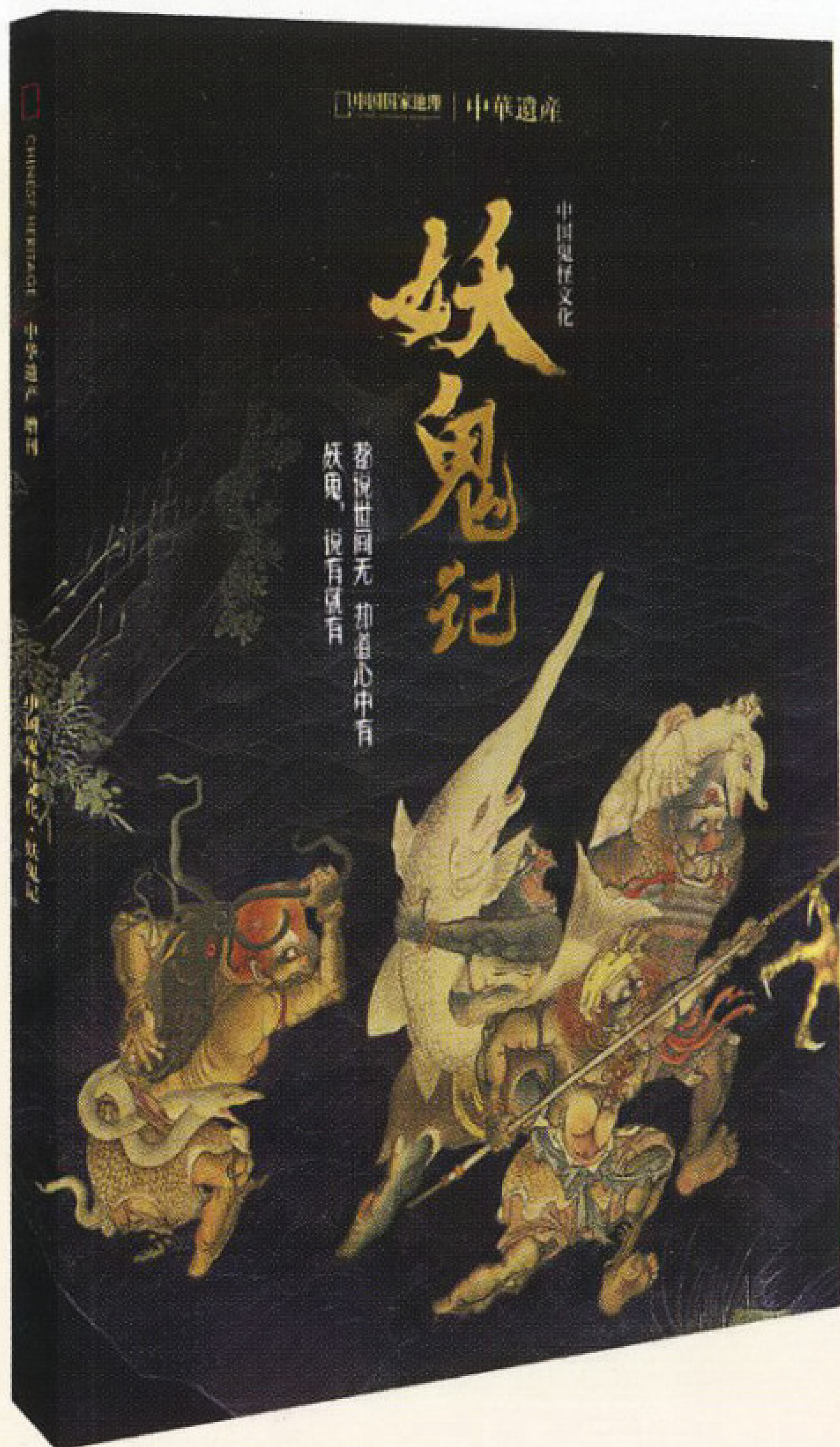

手机淘宝扫描


微信扫描

注意 杂志社接到读者反映：有不法商贩电话推销本刊，在支付刊款后却收不到书刊，造成财产损失。故此提醒读者，请到杂志社认证发行渠道购买，或致电杂志社服务热线4006-521-360确认。

热线：4006-521-360

中国国家地理天猫旗舰店 | **旅行书店**



《中华遗产》2018 隆重推出



《中华遗产》杂志“鬼文化专辑”“妖怪专辑”系列新编合辑，绝版重现。《阎罗》、《城隍》、《僵尸》、《最怕妖怪“有文化”》等新增文章，倾力奉献。全册共 296 页，附精美插画。

装帧 ※16 开 ◎软精装 ◎ 296 页 定价 ※68.00 元 会员价 ※61.20 元

淘宝扫码购买

《时间的力量：改革开放40年影像记》



时间都去哪了？时间都在这里。以平凡的视角展现改革开放 40 年的生活巨变和城乡变迁，从中寻找岁月的痕迹，寻找父辈的记忆。国内摄影师云集，同时展现 NG、新闻周刊、GETTY、LIFE、路透社、法新社等国外媒体摄影师眼中的中国巨变。

主编 ※ 柴继军

装帧 ※8 开 ◎精装 ◎ 344 页 定价 ※268.00 元 会员价 ※201.00 元

《中国海洋与湿地鸟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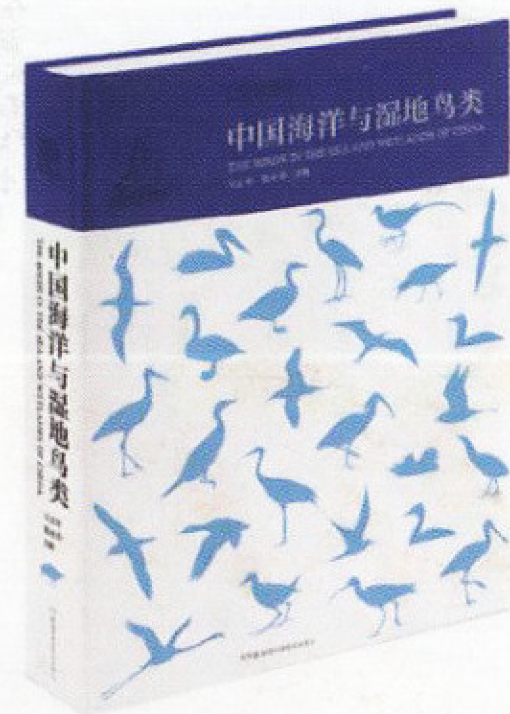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汇集鸟类学前沿科研成果，郑光美院士总主编，鸟类学专家撰文，600 余幅自然艺术手绘作品和千张照片，全面描绘和展现中国海洋与湿地生态系统及其中的 330 余种鸟类特征。

总主编 ※ 郑光美 主编 ※ 马志军 陈水华

装帧 ※ 精装 定价 ※600.00 元 会员价 ※450.00 元

《风物子城》



这可能是中国版图上文化密度最高的 8 平方公里——位于苏州市中心姑苏区的葑门历史文化片区，曾是春秋时代吴国“子城”及其周边地区所在地。这里有历千年犹存的学府与园林、经百年风雨仍在的古桥与街巷，说不尽的风骨与风雅、道不完的风情与风物。它们随着苏州城东南缓缓流淌千年的葑溪，一起继续讲述着古城的传奇。

主编 ※ 范烨 周晓红

装帧 ※24 开 ◎精装 ◎ 204 页 定价 ※88.00 元 会员价 ※66.00 元

《博物少年百科·了不起的科学（第 3 辑）》



专为 7-12 岁中国孩子定制，精选《博物》杂志 14 年专栏内容，涵盖《博物》微博 900 万粉丝最关心的主题，激发孩子们对自然与科学的兴趣。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通晓天地万物的“博物君”！

作者 ※ 许秋汉

装帧 ※ 平装 定价 ※196.80 元（全六册） 会员价 ※148.00 元



海错图笔记贰

开本 ※16 开 装帧 ※ 精装
定价 ※78.00 元
会员价 ※58.50 元

伴月共生

开本 ※32 开 装帧 ※ 平装
定价 ※39.80 元
会员价 ※29.80 元

中国国家地理诗画系列（4 册套装）

开本 ※12 开 装帧 ※ 精装
定价 ※352.00 元
会员价 ※264.00 元

内蒙古专辑

开本 ※16 开 装帧 ※ 精装
定价 ※88.00 元
会员价 ※79.00 元

选美中国系列合集

中国最美的地方排行榜
新疆、西藏、内蒙古、东北

开本 ※16 开 装帧 ※ 精装
定价 ※299.00 元
会员价 ※269.00 元

冰川专辑（上、下）

开本 ※16 开 装帧 ※ 平装
定价 / 会员价 ※40.00 元

销售排行榜

清
—— 金胎绿珐琅嵌红宝石高足盖碗 ——

故宫博物院 藏



摄影 / 陈楠